

# 餐桌上的經濟學

식탁 위의 경제학자들

세계경제와 내 지갑을 움직이는 22가지 경제이론

我們被食衣住行的費用追著跑，  
錢都到哪裡去了？

趙源敬조원경——著 宋佩芬——譯

改變你吃的東西、穿的衣服、買的地方的經濟學

凱因斯「每週只需工作15小時」的夢想離我們越來越遠，  
高失業率、薪資凍漲、貧富差距擴大成為世界共通的問題。  
身處這種越活越辛苦的社會，我們該如何應對？



# 餐桌上的經濟學

식탁 위의 경제학자들

세계경제와 내 지갑을 움직이는 22가지 경제이론

我們被食衣住行的費用追著跑，  
錢都到哪裡去了？

趙源敬조원경——著 宋佩芬——譯

改變你吃的東西、穿的衣服、買的地方的經濟學

凱因斯「每週只需工作15小時」的夢想離我們越來越遠，  
高失業率、薪資凍漲、貧富差距擴大成為世界共通的問題。  
身處這種越活越辛苦的社會，我們該如何應對？

# 序言——我因為錢而殺了凱因斯

我們正活在一個混亂不定已經成常態的世界裡。我看到一則外電報導，上面說英國人在工業革命之後，子孫世代擔心自己可能成為比父母世代活得更辛苦的第一個世代。

這麼說也對。剛好前幾天有一位見過幾次面的年輕人來找我，他那時正在找工作，並憤怒地指責著一名經濟學家——誕生於英國，偉大的名家約翰．凱因斯（John M. Keynes）——的錯誤。

凱因斯的錯誤預測讓這位年輕人相當忿恨不平，他一臉嚴肅地說：「我因為錢而殺了凱因斯。」

他前一晚上夢到了和凱因斯爭吵，過程中他一氣之下，就拿槍射殺了凱因斯，這是個很荒唐的故事。他說自己像是在怪罪凱因斯似地痛罵凱因斯一頓。

「你曾說我們一週工作十五個小時？我們現在可是非正職工作，加上不是一週，而是有許多天要單日工作十五個小時。我們被高額的食衣住行費用追著跑，生活得很辛苦。你說一百年後會迎來豐年，卻根本沒有出現，我的口袋依然空盪盪的！到底這世界上的錢都跑到哪裡去了？」

在本書出版之際，我想起了這位年輕人說的話，露出了苦澀的笑容。這讓我忽然想起與凱因斯同個時代的女性主義小說家維吉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然後我再次閱讀了韓國詩人朴寅煥的作品〈木馬與淑女〉。

我們喝了一杯酒，

聊著維吉妮亞．吳爾芙的一生，

以及淑女騎著木馬離開時的衣襬。

木馬拋棄主人，與鈴鐺聲消失在秋天之中。

一顆星星跌落在酒瓶之中了。

英國女性主義小說家維吉妮亞·吳爾芙，是號稱知性寶庫的私人俱樂部「布倫斯博理文團」（Bloomsbury Group）之成員。這群年輕知識份子對當時蔓延在歐洲社會的自由放任主義抱持懷疑態度，他們在布倫斯博理文團裡與凱因斯討論著自己的煩惱。

凱因斯是強調政府角色、致力於克服經濟大恐慌的偉大經濟學家。他在自己的文章〈我們子孫後代的經濟可能〉（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談到，「二〇三〇年人類會因『技術進步』、『資本累積』（Capital Accumulation）而極大地提高產量。」

我認為某種程度上來說，凱因斯的推測也算說中了。但是他提到「多存錢的話，『複利魔法』便能給我們大把大把的錢。」這是意指人類會持續高成長的預言，卻與受困於低利率的現實相反。

凱因斯在這篇文章中又談到，「人類一週只要工作十五個小時，可以享有悠閒又幸福的生活。」這正是那位年輕人在夢中批判的部份。凱因斯預言在解決人們需要的最基本食衣住行的狀況下，人們能享有追求美麗、真理與愛的生活。但是現代人依舊身陷繁忙工作之中，貧富兩極化在全世界漸趨惡化。我們雖然已從資本的時代跨越到了消費的時代，人們的生活卻與凱因斯夢想的悠閒時代相差甚遠。許多人抱怨著沒有錢、沒時間，前景感到一片黯淡。

為什麼世界變得如此辛苦呢？有人曾說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帶有不好的一面，導致今時今日社會中的團結心消失，也讓人幾乎沒留下多少追求公益的精神。主張現實的市場，扭曲了人類複雜的欲望。

凱因斯在那篇文章之中，是這麼談到人類的欲望。「人類擁有想滿足基本衣食住行的絕對需求，還有想比別人看起來更優越的相對需



求。當人類過度沉迷於相對需求時，就無法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存活下去。對人類而言，因為擁有想比他人優秀、想與他人比較的欲望，所以當社會體制不公正時，他們內心會充斥著相對的剝奪感及憤怒。若是往這樣的社會發展，我們會過得更不安穩。」

這話像是訴說出了我們的現實一樣，令人非常害怕。

凱因斯提出上述預言後，不知不覺過了八十多年。他原本希望人們能超然地面對金錢，事實卻並非如此。我如果說累積財富反而成為當今的最高品德，這算是說得太過頭嗎？凱因斯曾將「崇拜以錢為生活目標的現象」視為虛偽道德觀，而該現象依舊存在。如果他還活著的話，我想這會是他感到最遺憾的部份。

在所得與經濟成長的層面上，凱因斯的預測並沒有錯。他預計若沒有大型戰爭或是人口大幅增加，世界經濟會成長到四到八倍。全球在過去七十年間，每一個人平均所得提高了四倍。一九三〇年工業界人口勞動時間是平均一週五十個小時，而現今勞工平均一週工作四十個小時。曾說未來是每週工作十五個小時的凱因斯預言，也只是他依照常識推斷而出。根據邊際報酬遞減法則，我們賺到的所得越是一點一點變多，附加的滿意度越是下滑。社會整體越是富裕，所得帶來的滿意度越是減少，而閒暇時間的相對價值會增加。所以凱因斯應該是認為，選擇享受更多休閒時間的人，會比選擇工作的人還要更多。

我邊想著這些，邊走到玄關拿起早報。報紙的經濟版像是在嘲笑凱因斯的預言，充滿人類對財富無盡的欲望與勞動市場黑暗的故事。人類的產生力發展到了這個地步，到底為什麼我們還不滿足呢？我們究竟要再擁有多少才會變幸福呢？

我希望透過本書，能踏上尋找我們欲望與實際現實間差距的旅行。以從一九六九年開始頒發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為基礎，我計畫以多樣的角度來審視得獎者們的主張對現今經濟與生活有何意義。我抱著一絲的希望，期望世界知名學者可以縮減現實與凱因斯之夢的距離，也希望能讓讀者一起思考可以解決經濟問題、撫慰漸趨冷感之現今生

活的方案，因此我提起了筆。在與我們生活密切相關的餐桌上，我邀請了世界知名的經濟學家們，希望能藉此輕鬆又有趣地照明出現在的現實。一想到讀者們安心地坐下，閱讀著他們流傳下來的生活智慧，我便已內心澎湃。

我嘗試品味著凱因斯文章中我最喜歡的一段話。

「當現在財富的累積再也無法擁有很高的社會價值時，道德觀也會發生巨大的變化，我們便能驅趕過去兩百年間支配著我們社會的虛偽道德觀。這些虛偽的道德觀原本使人類最醜陋的心性轉變成最高潔的品德。不過，現在我們可以好好地評價金錢的價值了。」

# Chapter1

## 生活與經濟的精髓

Soul of Life & Economy

# 01 幸福方程式

## ——如何測量幸福

### 經濟成果以外的幸福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將二〇一六年世界貿易成長率（以物流量為準）的期望值調降為二．八％。如果繼續這樣下去，世界貿易成長率已連續五年交出三％以下的成績單。二〇一五年因美元走強和原物料價格下跌，所以全球交易額（以美金為準）減少了十三％，創下了一九八〇年以來最糟糕的紀錄。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眺望著世界，像是減少了許多人口數一樣，人們感受到這個世界越來冷漠、殺氣騰騰。

我覺得最近這種社會景象，與韓劇《回答吧一九八八》中住在首爾雙門洞的主角們的生活非常不同。現在的所得分明比一九八八年時增加許多，為何人們卻感覺過得比那個時代還辛苦？是因為未達到期望的經濟成長率數值嗎？我不認為是這樣。是因為靠自己雙腳走到現今地位，觀看世界的角度與心靈都變了，所以才這樣的嗎？我們所站的地位，其景象在這段期間內究竟改變了多少呢？

在《回答吧一九八八》內由Noel樂團演唱的歌曲〈一起〉，這首歌裡現在蘊涵著某位無名氏詩人的鄉愁，歌詞富有哲學的氣息。

「即便說沒有辦法解決這複雜的世界，不管怎樣，美好的一天總會到來的。但不是就這樣活下去的吧？想要一起休息的心情。」

歌詞看似輕鬆，實際上意義很沉重。細究歌詞，雖然生活在這世界上並不輕鬆，但是「一起」的話還生活得下去，他們唱著這樣的內容安慰人們。不知從幾何時開始，比起用溫暖的視線看世界，我們變得在用「自生自滅」的恐怖視線看待著這個世界。很可惜，現實是老



人的嘮叨被諷刺成「老不死的吹牛哲學」，年輕人的吶喊不是「希望事項」而是「希望幻滅」。所以，「一起」這個詞彙更加刺痛人心。

兩極化、青年失業、低成長與高齡化現象，是世界各國正承受著的精神性萎靡不振。如果有經濟學家提出用「矛盾與憤怒」來解決這些問題，他一定能成為最被看好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但這並不是解決成熟問題的態度。如同「一起」的歌詞，建造出為彼此著想、安撫人心的「溫暖的資本主義」，才是正確的方法，不是嗎？

韓國國民所得朝著三萬美金前進，如今卻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二〇〇六年首次突破二萬美金，二〇一五年卻倒退了。經濟停滯與韓幣下跌嚴重影響國民所得，這是一個成長率很難突破三%的情況。我們無法用全球景氣不好的說詞將情況合理化，但也不用太過悲觀。二〇一五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和經濟成長率比韓國高的國家，共有瑞典、愛爾蘭、冰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卡達與盧森堡等六國，共同點都是小國。在全球貿易額衰退的情況下，靠輸出生活的國家還能期望有經濟高成長嗎？

越是懷念過去的高成長，我們就越遠離幸福。不丹的國民幸福指數、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簡稱經合組織）的「美好生活指數」等，都有個國際共通的特點，那就是克服量化的GDP概念中的侷限。GDP在上個世紀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可是它現在正站在分岔路前。國際組職和法國、美國、加拿大等強國的政府，皆跳脫經濟成果論，為了測量、增進生活品質與幸福而努力開發可取代的指標。

## 世間萬物皆有「明」與「暗」

就算經濟成長很困難，但是國民生活真的無法變得更好嗎？當我看到物質不富足卻能笑嘻嘻生活的中南美洲人民時，便會覺得所得與幸福之間好像沒有存在絕對的比例關係。在艱難的環境之中，許多人

正對著世界大喊：「回答吧！經濟學家們！」這時，你想要請哪位經濟學家來治療全球經濟的萎靡不振，並從中獲得安慰呢？可以讓人從這樣的生活之中，感受到成熟地協調與節制的保羅．薩姆爾遜，你認為如何呢？

保羅．薩姆爾遜雖然就讀於重視市場的芝加哥大學，但他又支持強調政府介入市場的凱因斯，使得他集新古典綜合學派理論之大成，不偏向單方理念，並且總是傾聽著世界上各種聲音。他是一名經濟學家，但他為了人民的福利而收集各種聲音，並將之演奏成美妙旋律，該說他是管弦樂指揮家嗎？當他指揮的時候，他是個徹底瞭解右手（保守）角色和左手（進步）角色的經濟學家。

他強調市場與國家的健全角色，那麼貫通保羅．薩姆爾遜生活的哲學是什麼呢？他就像是在解方程式，試圖把世間萬事單純化。在經濟學界中，他是能讓人領悟到在解決問題的方式上存有各式各樣看法差異的學者，從他身上能聞到可讓人聰明地融會各種問題的香氣。

試著端詳世界上各種現象，會發現它總是存有兩種相反面貌，有些人稱之為「明與暗」。多虧了全球化現象，中國、印度等開發中國家達到驚人的經濟成長；而直至不久前因原物料價格高漲與中國經濟成長，所以經濟景氣很好的中南美國家，現在卻遭逢經濟困難。

薩姆爾遜很早就看出全球化除了「明」之外，也有著成為「暗」的兩極化一面。他指出資本家或資深專家會以全球化的贏家之姿獲得利益，而不夠資深的勞工、藍領階層勞工們相對則會面臨失業或是實質工資很難調漲的困境。他警告連美國也不會例外，因為全球化將導致利益與損失不會公平分，美國社會也會漸漸經歷到更多的不平等。正向來看，全球化與技術進步為人類發展付出很大貢獻，但也映照出掠奪人類工作、助長低薪的財富兩極化負面效應。

## 所有的不幸始於比較

薩姆爾遜簡單地定義出「幸福是擁有除以慾望」（幸福＝擁有÷慾望）。決定幸福的兩樣要素是擁有與慾望，如果慾望值固定，擁有得越多就越幸福；如果擁有值固定，慾望越小越幸福。可是我有個疑問。當我第一次翻開經濟學課本，看到了一段話：「人類的慾望無限，而滿足這慾望的財富有限，所以才會產生經濟問題。」

若是人類的慾望無限，數學上薩姆爾遜所說的幸福不得不成為零。因此他並不認為人類的慾望無限，搞不好是資本主義的本能在鼓吹人類慾望。同時很難否認的是，人類想要滿足這種慾望的努力，也是達到現今物質進步的原因之一。那麼，薩姆爾遜究竟在對我們說什麼呢？

那正是對貪欲的警告。他要告訴我們，不管個人擁有的更多，只要當慾望違反道義、成了貪慾之時，便會變得不幸福。只要多吃幾個麵包就會填飽肚子，無法再繼續吃，但錢不是這樣，不然叔本華怎麼會闡揚著人類對金錢慾望無限呢？他曾說：「錢像海水一樣，喝多的話會越喝越渴。」在美國有個結合富饒與流感的詞彙「富貴病」（*affluenza*），光是看到這詞就足以證明。購物成癮的人們、因為太有錢而什麼事都討厭做；精神萎靡不振的人們，換個角度來看也是因為不懂生活的真正價值，所以才產生這些問題。從富貴病便可得知，決定幸福的原因未必只用所得作為標準。

所有的不幸福始自於比較。當人類過度貪求比較彼此的時候，自己與社會都會變得不幸。因正當的努力代價而享有財富，卻因此被人指指點點，這在有著補償作用的資本主義體制中不是正確的行為。爽快地承認彼此不同的事實有益於精神健康，只是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或經合組織所主張的一樣，我們有必要去傾聽一部份人們的聲音——那些強調財富兩極化和分配不平等會阻礙經濟成長的聲音。撼動世界的基本原理並不公正，而少數人過度擁有基本需求以上，撇開合理性，這並不是過去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憧憬追求的健全世界。

人认知上最大的竞争，其实是信息输入量的竞争

松鼠信息精选付费群为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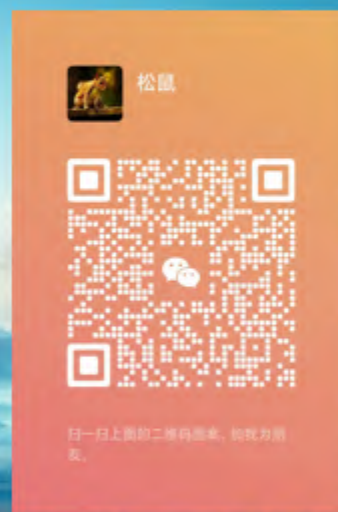
每日输出有价值的文字，提高信息含金量，提升信息能量密度，取精华、去糟粕为大家节约时间，你的10分钟=我的3小时。

关于赚钱:小生意、副业、自媒体、引流、网赚

关于投资:核心城市房产投资、优质企业股权投资

关于升阶:认知提升、成长、家传

欢迎添加松鼠微信进付费社群:



(备注: 信息)

可能會有人批判薩姆爾遜「幸福的前提條件是擁有」的主張為拜物主義，但是在現代社會之中，實際上要過一個不擁有任何事物的生活非常困難。我們為了變幸福而去擁有，為了獲得能擁有任何事物的經濟所得而去工作。大多數人因為金錢而悲歡離合，所以為了維持人類基本生活，創造工作與建構社會安全網成為國家必須解決的重要社會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看重預期壽命兩極化的程度不亞於財富的兩極化。實際上住在倫敦、芝加哥、紐約等富翁們的預期壽命，比住在同地區的窮人預期壽命高很多。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富裕階層與出生於貧民窟的男孩相比，兩者的平均預期壽命相差二十年左右。需要注意的是，都市貧民窟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是五十二．二歲，比貧窮國家盧安達的五十五歲還短；在決定壽命長短上，定期醫療檢查所需費用也是不可忽視的決定性因素。所以金錢的沉重壓力會啃蝕低收入者的精神健康，甚至會讓人自尊感低落，還有人主張實際上會使身體的免疫系統崩潰。

## 錢包薄薄，心情沉重

我們來看看研究幸福、需求、所得關係的美國經濟學家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的悖論吧！「所得增加而滿足基本需求的話，所得就再也不會成為左右幸福的重要變數」，這是「伊斯特林悖論」的核心概念，此學說至今依舊爭論不休。伊斯特林主張現今自己的想法仍然有效，雖然過去七十年間美國人的個人所得增加了，幸福卻停滯不前，甚至變得更低。

可是，幸福為什麼會停滯不前呢？隨著所得增加，人們因「絕對需求」而可能會增加更多想要擁有的東西，期望過得比別人好的「相對需求」也自然會增加——若要過得好，就想買一輛大家都有的車子，智慧型手機也要拿最酷炫的款式才行，人們陷入比較的深淵。當然，比這個更大的問題，是出現無法滿足基本需求、感受不到幸福的人。全球大都市的居住消費水準很高，一般人很難生活。有人說，一



般民眾和社會新鮮人們一輩子受困於抵押貸款、債務生活之中，感到疲累厭煩，幸福才會跑得很遠，這句話確實也有道理。

也有別的反論主張幸福與其說是取決於像所得這樣的外部條件，倒不如說幸福是受到像天性樂觀或是想努力變幸福的巨大影響。有些人說必須練習如何追求幸福，所以才會出現幸福取決於自己的決心、取決於自我滿足等的話。不過，歌德說過：「錢包薄薄，心情沉重。」這句話對沒錢的人來說該有多麼感同身受？孟子也曾說過類似的話：「沒有固定財產的話，也不會有固定的心性。」不論古今中外，他們的言詞都說出了被錢追著跑的平民心聲。

最近經合組織的包容型成長（Inclusive Growth）理論正受到各界矚目，是否正是基於上述原因呢？所謂的包容型成長，是指支援國家中的開發中國家、企業中的中小企業、性別中的女性，以及有僱傭問題的青年等相對弱勢族群，並與之共同成長。重視成長才能提升社會構成員的生活品質，消除社會各種不平等，追求階層間公平分配。討論的框架裡，包含了「所得、工作、健康」三個判讀標準，以及附加條件「教育、環境」。在討論幸福這件事上，當然必須包括這些基礎，才能朝向提高生活價值的方向前進。

在金融海嘯之後，G 2 0 高峰會議也提出了解決持續性經濟低成長、高失業問題、提高經濟成長潛力的辦法。他們提出了三項『I』的實踐方法看起來很明智。各國聚焦於經濟成長策略設計出的「組織結構變革的事業計畫」（Implementation）上，準備著對應需求不振的「投資活絡化策略」（Investment）。另一方面，請各國投入解決青年失業、輔助中小企業、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Inclusiveness）。

## 調整期待，跳脫傳統思維

我們試著改變一點保羅．薩姆爾遜說的幸福方程式吧！改成「幸福是實現除以期待」（幸福＝實現÷期待）如何？如果期待值固定，越是實現目標與夢想就越幸福；如果實現值固定，期待越少越幸福。

可能會有人抱怨，自己曾在低成長時代嘗試過儲蓄，卻很難獲得期待中的高報酬率。也會有人說就算大學畢業出來，也找不到工作，上大學反而成了損己之事。這些話都沒錯，現今世界很難保障有高額淨利息收益率，也很難充份提供符合年輕人眼光的工作。

但是，聰明地解出幸福方程式的人們不會被傳統思維侷限。儘管社會準備出人們期望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事，可是如果還像以往只助長人們的期望，我們便會漸漸遠離幸福。現在正是需要改變的時候。經濟上的報酬率下降，人們卻過度競爭，以社會角度來看這並不正確。

例如，你突破了激烈的競爭，考上大學、付出高昂學費，畢業後卻找不到符合你眼光的工作時，自然就會想到自己付出的本錢。若是對期待很高的人說「請你們放低眼光」，只會收到「我為什麼要？」的反應。因為眼光與期待產生差距，而發生一方徵才難，另一方求職難，造成工作與人才互不匹配，浪費青年資源，這不是個人、社會、國家立場上所期望的事。

韓國高速經濟成長期的僱傭系統已與全球化、科技發達相結合，很難在現今存留；在過去的僱傭系統中獲得的期望報酬率不可能再實現，父母與學生都必須要知道這點。在高速經濟成長期，大學的錄取率不高，所以大學畢業有利於就業。但最近人人多半是大學畢業，很難再像當時大學畢業就能挑選好的職場就業。比起過度期待、花心思在找工作上，現在更應該要放低眼光，將視線轉移到符合現實情況的就業、創業、海外就職上才對。

中國也一樣拋棄了過去的高度經濟成長策略，而全球經濟都配合著中國的經濟高度成長，大大地歌頌著其帶來的繁榮景氣。現在個人、企業與政府都應當努力朝尋找符合企業需求與自己興趣的工作前進，不該再一味地糾結著必須上大學的想法。企業必須致力提高僱傭的價值，政府必須為了擴大就業而好好運用預算與稅制。父母們必須體悟到自身只愛自己小孩的病有多可怕，也絕不可強求孩子一定要



「拼死努力」。孩子們因父母盲目的愛而被過度保護，所以為了在社會上失去就業保護柵欄的年輕人們，社會必須調和父母世代對孩子的關懷與特殊關照以達到平衡。最重要的是，越是困難之時，越要下定決心。如果大家能相互腦力激盪，思考著該以何種姿態去面對未來的話，就能改變我們的現今與未來。

### 【理論提出者】

保羅．薩姆爾遜 Paul A. Samuelson, 1915.5～2009.12

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是新古典綜合學派大師，將古典學派的個體市場均衡理論與新古典經濟派的凱因斯總體經濟政策論連結在一起。他出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一九三五年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於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擔任經濟學教授。他將微積分等數學運用在經濟學上，使動態分析、靜態分析系統化。因為公共財產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所以他以數學證明了必須由政府生產而非民間。這對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的開發有所貢獻，也在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上留下很大的指標。他主張比起完全自由的市場，有著理性規範的市場更有益。他和米爾頓．傅利曼的主張在學問上有著矛盾。

## 02 配對理論

——市場是可以設計出來的

### 經濟學家也能拯救生命

最近有一名做什麼事都看起來很俊美的男人，有一陣子他曾是「世上哪裡都找不到的善良男人」，<sup>1</sup>他退伍後變身成真正的男人回到觀眾面前了。對女人來說，在KBS電視劇《太陽的後裔》中飾演「劉時鎮」的演員宋仲基，正是養眼又療癒的主角；不僅是韓國，他的超人氣襲捲了中國等亞洲各國，電視劇結束後熱潮仍持續發酵。

我們來看看這部男主角名為「劉時鎮」的男女愛情電視劇吧！韓國男人們做了句短詩貶低劉時鎮，說他是「幼稚／無聊／哪裡都找不到的虛幻角色」。不過，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童話人物始終是女人們的幻想。對於看一小時多的電視劇，就能聊上三個小時的女人們而言，劉時鎮是個光是用看的就可以從中獲得安慰的替代滿足對象。她們雙手合掌，對著劉時鎮朗頌短詩，讚揚他「英語流暢／個性率直又充滿男子氣概／真是英俊又令人尊敬的上尉大人」。

儘管各人想法不一，不過至少在令人領悟到愛國心與生命尊貴的層面上，我們應該要認同這部電視劇的藝術價值；即便是編劇獨特的肉麻台詞，也讓人覺得可口不油膩。劇中與宋仲基談戀愛的宋慧喬，她做為震災區的醫生不斷地拯救人們。在陌生的土地、糟糕的環境之中，講述懷抱著愛情與夢想人生成功的年輕軍人與醫生的故事，好久沒有這種探索生活價值、富有人性又令人心動不已的愛情喜劇了。

雖然丈夫們必須承受自己被另一半拿來與男主角相比、視為醜八怪的淒涼感，但是因為這給經濟條件不佳的婦女們帶來了幸福，男人們應該要滿足才對。飾演醫生姜慕妍的宋慧喬，以及飾演她戀人兼軍人劉時鎮的宋仲基，兩人的共同點是都在拯救他人生命的角色。每天

都在搶救瀕臨死亡的女人，以及賭上人的死亡來拯救生命的男人，觀眾藉著這兩人的故事再次思考著生命的珍貴。

並非只有醫生與軍人在守護生命，如果我說有守護生命的經濟學家，你可能會感到很驚訝。法國重農主義經濟學家法蘭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原是醫生出身，他以醫生的經驗為基礎，模仿血管的流向設計出《經濟表》，藉此窺探經濟的全面走向。但他將影響附加價值走向的階級侷限在農民，而以農業來看未來的產業動力並無法分析出確切的經濟走向，因此他犯下了致命的錯誤。這經常被人稱之為「魁奈之誤」。

過了三百年，至此誕生出真正救了許多性命的經濟學家。艾文．羅斯將應用數學的賽局理論運用在腎臟移植上，擴大了配對成功的機會，他正是拯救性命的經濟學家。他主張我們應該要多加關注被世人以像是器官交易般的負面眼光所看待的「厭惡市場」（Repugnant Market）。我想起了《太陽的後裔》中沒人想去的虛構災難城市「烏魯克」，身為經濟學家的羅斯，又是如何去做能救更多人的事情呢？讓我們一起來看吧！

## 配對理論的依據

羅斯所說的厭惡市場，是像腎臟買賣、同性結婚、毒品交易等在社會上抱以負面觀感，但確實有人需要的市場。以腎臟買賣為例，全球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國家皆視為非法。人們不反對為生病的人移植腎臟，卻否定花錢買腎臟一事。羅斯認為經濟學家們必須積極研究如何順利完成任何人都急需的交易。在《太陽的後裔》裡，即便是在可怕的震災之中，醫療人員們仍捨命照顧病患，超越國境無私奉獻。我若是將羅斯在經濟領域達到的功績，比喻成上述醫療人員的奉獻，會很誇張嗎？抱著要設計出充滿「拯救人類的溫暖人情味」市場的他，我們先來看他的理論依據。

先前已談了腎臟移植問題，我們現在試著用簡單的數學來分析男女間的穩定「配對問題」(Matching)。羅斯的配對例子是以合作賽局理論(Cooperative Game Theory)為基礎，其特點是在共同利益的觀點上，來觀察什麼樣的結果才正確。我們試著以理論的方式來解答下列例子。當有著同樣人數的男人與女人兩個集團時，在不發生任何問題為前提下，怎樣才能讓每個人都配對到穩定的對象呢？世界上有許多對情侶，卻沒人能保障日後還會對現在的伴侶感到滿足。因為有時候別人的蛋糕看起來更好吃，所以我們無法肯定情侶間一定是穩定的關係，也因此男女配對市場成為容易與人搞曖昧的市場。

簡單地以人氣非常高的劉時鎮(A)和姜慕妍(B)，以及人氣不怎麼樣的男人(a)和女人(b)為例。這四個人要怎麼配對，才能形成一個最穩定的社會呢？有人氣高的人(A|B)、沒人氣的人(a|b)各成一組的方法，也有混搭(A|b、a|B)的可能性。在電視劇中當然是A|B，但現實中人人都期待出現不一樣的結果吧？尤其是許多亞洲女性們得了「劉時鎮病」，要是劉時鎮向她們求婚的話，她們一定會開心的要飛上天了。先說結論，為了建立一個最安穩的社會，A|B、a|b各自配對才是最正確的。你失望了嗎？

理論上會有四種配對組合。劉時鎮與b湊成對的話，劉時鎮會每天想念著姜慕妍。恰好也不滿意自己伴侶a的姜慕妍，不知不覺也期望著與劉時鎮復合；與電視劇唯美的狀況不同，若是兩人婚後各自結識新的朋友，可能會發展成不倫關係。以結果來看，兩對情侶都分手的可能性很高，會產生不必要的社會費用。如果一開始就是A|B、a|b配對，a和b雖然不太滿意彼此，但不會搞外遇；滿足於現狀況的A和B，也不會跟別人曖昧不清。這個賽局理論被稱為「傳統婚姻演算法(以具體流程或方法來解決問題)」，讓羅斯在二〇一二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所謂的穩定婚姻狀態，是指不會發生與非配偶的人看對眼的糟糕情形。

## 用賽局理論解決腎臟移植問題

現在我們用這個配對理論來思考腎臟移植吧！羅斯想到了腎臟捐贈者與受患者間的配對問題。接下來的舉例可能會讓劇迷們很生氣，但是我們假設時光飛逝，姜慕妍不幸必須接受腎臟移植。當然，我們的偶像、萬人老公劉時鎮會哭喊著說要捐贈自己的腎臟，可是天可憐見，兩人的血型不同，姜慕妍必須尋找別的腎臟捐贈者。醫學上，捐贈者與受患者在許多方面上有著差異，因此羅斯考慮到捐贈者與受患者間條件不同的情況，研究出能接受移植手術的最有效配對方法。

羅斯在美國運用了經濟演算法，開發出能將腎臟捐贈者與受移植者連結配對的系統，達成莫大成就。他將配對理論擴大運用在腎臟移植理論上。比起只有姜慕妍與劉時鎮兩個人的情況，當有更多病患與捐贈者的時候，這個理論能救活更多的人。與金錢往來的商品市場不同，羅斯認為必須為器官交易市場設計出「無須金錢往來市場的演算法」。

我們以韓國與美國的腎臟移植市場為假設，韓國從二〇〇五年開始透過網際網路進行腎臟移植交換計畫，這也是韓國領先全球的領域。可是韓國的血型分布與美國相比，在器官移植上是相當不利的結構。美國O型血的人占了近全體人口的一半，但是韓國有七十%是A型、B型、AB型。O型的人能將腎臟捐贈給任何人，可是A型、B型只能捐給相同血型的人。因此如果將美國與韓國的捐贈者與受患者全部加起來，可以促成更多的配對，需要器官移植的韓國病患也更有機會獲得捐贈。

韓國與美國的腎臟交換計畫準備完畢之後，就會產生國際腎臟交換市場，使得器官市場的設計出現可行性。搭機往來紐約與首爾需要十四個小時，所以姜慕妍可以待在韓國，請美國的腎臟捐贈者來韓國便成了。藉由整合散落美國各地的腎臟移植中心，羅斯讓許多的人獲得重生的機會；電腦與網路的發達，也算是在拯救人命上貢獻了一份力。

## 研究現實市場的經濟學家

於《太陽的後裔》劇情中段，尹明珠中尉感染了死亡率很高的病毒，觀眾們看得很是心疼。她的男友徐大英上士即便知道自己可能也會受到感染，仍毫不在乎地衝上前去抱住她，觀眾們看到這一幕再度哭紅了雙眼。

既然提到了病毒的故事，我們就來仔細觀察一下醫生和經濟學家的角色。我們無法預知禽流感那樣的傳染病何時發生，所以也無法因為醫生無法治好患者的病而要解雇醫生。疾病越是蔓延開來，醫生越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不能因為經濟學家無法預知嚴重的經濟危機，或是他們無法提出妙計來改善失業率、通貨膨脹等情況，而主張他們沒有用，這樣缺乏建設性。劇中因有受感染風險而遭到隔離的宋尚賢醫生，他在隔離期間繼續研究治療方法；同樣的道理，每當經濟狀況越困難，更是迫切需要經濟學家。羅斯忠實貫徹著這樣的經濟學家角色，他的經濟觀是我們必須深深烙印下來的東西。

羅斯強調在貧富差距的社會中，絕對不可動搖能夠讓一個人爬到更好的社會地位的梯子。他主張要設計出能讓人爽快認同對方是富翁，而窮人也有成為富翁之機會的市場；設計的過程中必須不斷檢查是否有問題，這是重視適當的市場設計與規畫社會制度的必要性。如果每個人都沒有公平的機會，便會撼動了民主主義的根基。

羅斯也將個這配對理論套用在學校分配，因為他判斷美國社會越來越不平等的原因之一在於教育。住在貧困地區的孩子們不得不就讀教育品質低落的學校，他對這種現實感到非常可惜。他認為若是不能保障這些孩子的選擇權，就會減少階層流動的可能性，所以他設計了能將學生的喜好與學校的喜好盡可能配對的市場，並於二〇〇三年在紐約市公立學校分配制度上實施。

以前的方式是學生自己填寫前五個志願學校，提交後由學校選擇學生，所以學生、學校全部人都有很多不滿。羅斯設計的市場是只讓學生填寫一個志願學校，而各學校在限定的人數之內，盡可能讓所有人合格；落榜的學生可以再填一次別的學校，並反覆進行這樣的申請

過程，直到最後一位學生都申請上學校為止。他的理論厲害在哪裡呢？因為分發制度不再是以父母與學生的第一志願是哪間學校、考上的機率有多少為重，而是能有效地消除孩童無法如願以償地進入心目中理想學校的不安、恐懼及疑心。羅斯並更進一步地將這個配對系統套用在徵求專業技術人才的計畫上。

在股市交易時，重要的是買多少、賣多少。在市場經濟中，買家以最低價買到一件商品才有利益，賣家則是以最高價賣出才有利益，這或許是無限競爭的市場善意也不一定。可是我們看到的市場經常出現善意嗎？我們會被人坑錢，不過如果我們是熟客的話，運氣好能獲得婆媽們熱情多贈送的一塊糕。市場便是如此令人心情愉悅的地方，但也可能不是這樣的地方。羅斯並不認為市場是善良的，可是他也沒有因此而失去希望，期望著根據市場的設計，我們可以更加接近善良的道路。

羅斯研究人們厭惡的市場，或是與理想還有段距離的現實市場。他這麼說：

經濟學家就像是工程師一樣，精密地設計著真正可行的市場！即便是不能分享的財富，我們也需要研究如何擴大它的效用，又能穩定分配的方法。請思考一下，醫院在分配實習醫生的時候、在移植肝臟的時候，什麼樣的選擇對病患來說是最好的呢？不可以只想著優秀又最好的實習醫生自己的愛好，也不能只考慮錢很多的病患本人的喜好。配對市場不是有錢就能買到任何東西的地方，而是必須條件相符合才能買到東西的市場。這樣雖然無法滿足所有人，但是我的目標是設計出能相互幫助的理想市場。

## 設計市場是為了創造更盛的繁榮

羅斯的案例表現出數學對產業與人類有著巨大影響。像羅斯的情形，只要把市場設計得好，就能拯救數百萬、數千萬的人。為了理解他的厭惡市場理論，我們試著來分析一下人們厭惡的東西——毒品。



以經濟學的觀點來看，規制合法市場會比規制非法市場來得輕鬆。羅斯覺得不應該因為人們認為走私古柯鹼是壞事，便決定掃除這種非法交易。他主張經濟學家應該要建立允許毒品交易時的各種模型，像是毒癮者是否增長，或者合法化是否反而有助於減少犯罪率等，試著進行研究。當毒品交易合法化，而毒癮者人數的增加幅度與犯罪率若是出人意料地減少，代表毒品可以合法化；如果情況相反，則當然不該支持合法化。

他曾說：「中古世紀時，借錢給人賺取利息是非法的，但在現代則變成合法了呢！你們看最近網路上侵犯隱私的情形，網路也成為了新興厭惡市場了。無論個人或國家做出什麼決定時，那種市場是合法還是非法、是否該訂定規則，我們都需要好好分析其矛盾的關係，這在設計市場時很重要。」

我們正如何設計著自己的人生呢？每個人的設計都不一樣，不過大家都夢想著與心愛的人建立永遠幸福的家庭。羅斯在設計市場時，無法完全反映出這個理想，但他至少不是以金錢做為成功的衡量標準。他教導人們「經濟學是為人貢獻」的學問，他便是經濟學界的「太陽的後裔」。

「市場設計是能幫助更多人的工作，我想透過腎臟移植市場設計來幫助外科醫生。身為一名經濟學家，能拯救更多人的性命是我的榮幸。」

羅斯這句話真是令人感動，比起諾貝爾獎這個名聲，更重要的是生命。羅斯與劉時鎮、姜慕妍的共通之處在於尊重生命。在貧瘠的經濟學界中，羅斯留下了像是「愛」、「尊重生命」般的美麗話語。那部電視劇已經播映完畢，但是我們這群追求愛的太陽的後裔們，必須設計出更盛大的繁榮市場。

【理論提出者】

艾文·羅斯 Alvin E. Roth, 1951.12～

关注公众号“松鼠读东游”

回复“1”领取付费资料

他是市場設計、賽局理論、實驗經濟學大師。以「欠缺學習動機」的理由自請高中退學後，考上哥倫比亞大學，並在史丹佛大學獲得作業研究<sup>2</sup>（Operations Research）的碩士、博士學位。2012年他以穩定分配與市場設計相關實證研究，與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UCLA）羅伊德·夏普利教授（Lloyd Stowell Shapley）共同獲得諾貝爾獎。他覺得無論什麼市場都需要設計與穩定的分配，並認為自由市場沒有規律的主張不合理。他主張如果什麼事物遭到扭曲或出錯時必須糾正，必須以新的規則來建立市場。

---

1 宋仲基在二〇一二年播出的同名韓劇當中擔任男主角。

2 作業研究又被稱作運籌學，是一門應用數學學科，利用統計學和數學模型等方法，去尋找複雜問題中的最佳或近似最佳的解答。

## 03 經濟發展與自由理論

### ——暖心的經濟學

#### 消除貧窮與飢餓的雄心

索馬利亞曾經是非洲的模範國家，現在則因長期內戰而亂無章法。二〇一一年隸屬韓國三湖海運的船隻在索馬利亞外的亞丁灣遭到挾持，韓國最後派出清海部隊順利救援。索馬利亞歷經超過六十年的乾旱，嚴重欠缺糧食，國民甚至自嘲只能去當海盜了。而在這樣的情況下，肯亞政府卻宣布要關閉兩個位於肯亞國境附近、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難民營，那裡收留了五十多萬名索馬利亞與南蘇丹的難民，他們為了逃避內戰與飢荒而穿越國境。

華莉絲·迪里（Waris Dirie）是生於索馬利亞的知名模特兒兼人權運動家，她在給媽媽的和解信中寫道：「媽媽愛著現在這模樣的非洲，而我則是相信未來的非洲。大家用自己的雙手創造未來，強而有力、自尊心強的人們生活著在這裡，這正是我夢想的非洲。」

華莉絲出生在索馬利亞某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在她五歲的那一年，她像同部族的其他女孩一樣進行女性割禮，被除去了陰蒂。她十四歲那年，父親以換取五隻駱駝為條件，把她賣給六十多歲的男性當老婆。她在曾是索馬利亞外交官的姨丈幫助下，瘋了般地逃亡離家，最後抵達英國。苦盡甘來的她成為時尚雜誌的模特兒並且揚名國際，之後她移居紐約，與全球頂尖的化妝品公司露華濃、萊雅簽約，從此一帆風順。

華莉絲積極發聲，讓全世界知道了女性割禮的恐怖，聯合國兒童基金會（Th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等機構現正為了廢除女性割禮而努力。聯合國也在二〇一二年通過禁止女性割禮的決

議，目標在二〇三〇年之前要廢除這項陋習。現在華莉絲看著非洲會做何感想呢？

如果她認識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沈恩，她可能會這麼對他說：「現在人類正享受著史無前例的富饒，但是包括非洲在內，地球上仍有許多地方十分貧困。單憑經濟援助就能充份解決資源嚴重匱乏的問題嗎？如果幫助他們發展經濟，便能自然地解決這個問題嗎？我不這麼認為。為了解決資源匱乏問題，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必須達到均衡發展。我們需要廢除虛偽的文化，現在還有像我一樣的沙漠少女在哭泣。全球有兩億名少女要接受這令人毛骨悚然的割禮，我們必須確實地認知到這個事實，所以我積極支持聯合國從二〇一六年開始實施永續發展目標計畫（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聯合國從二〇〇〇年開始採用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十五年間為全球絕對貧窮與解決飢餓問題做出貢獻。此計畫在二〇一五年正式退場，加上印度與中國的經濟急速成長，使得在一九九九年時生活極為貧窮的十九億人口，到了二〇一五年時剩下八億三千六百萬，減少了一半以上。世界銀行將一天生活費未達一．二五美金、無法滿足基本食衣住行需求的人歸納為絕對貧窮層，而這樣的人減少了一半以上，確實是很驚人的成果。

如果說減少一半全球陷於貧窮與飢餓的人口數是千禧年發展目標計畫的展望，那麼從二〇一六年至二〇三〇年所實施的永續發展目標計畫，則是標榜著「打造出不讓任何人成為邊緣人，一起過上好日子的世界」，帶有完全消除貧窮與飢餓的雄心。這是一個從經濟成長到社會、環境領域的均衡發展，全都廣泛包涵在內又具體的目標。經濟方面以投資社會公共設施來擊退貧困，謀策經濟成長；社會方面推廣性別平等，解決對少數民族的不平等問題，減少社會的不平衡現象；環境方面要從原先使用的煤、天然氣、石油等化石燃料，改成使用不會誘發全球暖化的乾淨燃料。這十七個為了全球人類存亡與發展而需要戮力以赴的目標，我們正密切關注聯合國要如何領導世人達成。

## 自由是國家發展的終極目標

經濟學界的「好撒馬利亞人」<sup>3</sup>阿馬蒂亞·沈恩對於開發有著獨特的哲學。沈恩是不平等與貧窮研究的大師，他研究出藉由「貧困指數」指標來測量貧窮的方法，因而受到矚目。他主張比起生產不足，錯誤的分配更會導致飢餓與貧窮。在解決資源匱乏問題上，他強調單一個體並非只被動地接受經濟成長好處的受患者，每個人必須成為具有積極又自由的主體。對他來說，真正的發展是增進自由——這是指當我們在討論國家發展時，需要將增大自由做為終極目標，而不是以增加所得或財富為目標。在他看來，自由才是真正的力量，因此他堅信國家有義務制訂出人人能表現自我的制度

當一個人想要成就某項事業，而社會能在制度上盡可能地支援他去做事，便可視之為有點自由的國家。人們事業有成，其利潤貢獻出可以讓更多人做想做的事的自由，沈恩認為這樣才有真正的永續發展意義。他強調為了讓這個理論有機會成真，我們當然要保障市場的自律性與民主主義。

沈恩對國家開發有這番想法其來有自。當他幼年、印度仍是英國殖民地的一九四三年，他在孟加拉（當時屬於印度領土）親眼目擊到數百萬人死於飢荒。後來他以一九七四年孟加拉飢荒為首，研究了印度與撒哈拉區域國家的飢荒問題。雖然他小時候看到的悲慘飢荒出自糧食供不應求，他也領悟到這都是政府無能，無法妥善供給糧食。當時飢餓致死的大多數人並非在農村農耕的最貧窮層，而是都市中的月薪制勞工。穀物收成不佳，價格急遽上漲，但都市勞工的薪水沒漲，導致他們缺乏購買糧食的能力。商人與富裕階層囤積穀物，印度的地方政府也擔憂穀物價格上漲所以禁止穀物輸出，這兩項才是最大的原因。

政府或從事國家開發相關人員們將貧窮層全視為同一集團，並藉此建立應對政策的行為，沈恩認為這正是問題所在。他表示不只要根據危機狀況，也要視貧窮層各自的情況進行分類，再制訂符合各自的

不同政策。即便要提高國家的全體所得，也有可能使一部份國民遭受飢餓、預期壽命降低的困境。反之，有些國家的全體所得比其他國家要來得低，預期壽命卻相對來得高，較少人受飢餓之苦。因此我們討論飢餓問題時，必須試著以更加寬廣的角度進行精密診斷。

根據沈恩的分析，淒慘的飢荒有可能是因為糧食供給不及，但是比起這一點，無法確實供給糧食才是引發飢荒的主因。沈恩是比任何人都更重視市場的經濟學家，不過他讓大家知道，即便因飢荒為契機而促進經濟成長，也可能不會減少貧困現象；政府為了公正分配，有必要介入市場。說到「經濟」，人們大概多會覺得它沒什麼倫理與良心、沒血沒淚。但是從一生奉獻在研究貧窮、不平等與飢餓問題的沈恩身上，能讓人感覺到經濟有著「溫暖人心的良心」。

按照沈恩的說法，自由是我們最終極的目標。保障社會各領域有充份的自由，可使我們達到更高水準的自由。在經濟層面上，他尊重市場機制，也喜歡亞當·斯密。只是光靠市場機制並不能保障經濟自由，他認為參與者要平等，並保障他們有足夠自由的條件。請你將他的信念深深烙印在心中：

設立「累積所得或財富直到無法繼續累積為止」這樣的目標，是一件不正確的事。正如亞里斯多德所指出，它只不過是個「有點用處」的目標而已，因此我認為不能把經濟成長當作經濟學的至高無上目標來對待。所謂的經濟發展，必須是要能培養出我們能享受的自由與生活。自由不只是讓我們生活更加寬裕、減少阻礙，它還可以讓我們完成心願，使我們去關懷一同活在這世界上的人們。

## 可隨心所欲生活的「有能力的自由」

全世界熱烈討論永續發展目標計畫和國家開發，不過人們對於「援助」有著截然相反的觀點。一個是像撰寫《終結貧窮》（The End of Poverty）的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 Sachs）那樣，支持「大力推動經濟發展理論」（Big Push）——如果想要解救極窮苦的



第三世界國家們從貧窮的牢籠中脫身，西方國家必須提供大規模援助。這種「大力推動神話」主張於一九五〇年代出現，韓國同屬受戰後援助而成長的國家，千禧年發展目標計畫也帶入了一樣的哲學。薩克斯主張富裕國家自二〇〇五年起，往後二十年間金援貧窮國家一千九百五十億美元的話，便能消除貧窮現象。他認為經濟學必須提出解決落後國家的貧窮與疾病的方法，他自己也致力於掃除落後國家的貧窮。

另一個觀點則是以《白種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作者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R. Easterly）為代表，對於海外援助加以批判。他反對「援助可以解決貧困」的主張，因為接受援助的國家會變得腐敗，弱化了他們的自治基礎，所以他認為該國要引進自由市場系統，自行解決貧窮問題；合作開發政策則必須從根本上轉換，往增加個人自由與權利的方向前進。他向援助他國的國家提出忠告，必須放棄「向外推銷烏托邦」的夢想，也不要嘗試以援助為條件來干涉受援國內政。對他來說，幻想金援能消滅貧窮是要不得的行為。伊斯特利主張唯有將個人動力、企業精神做為基礎的國家開發才會成功。還有，他重視讓需要人道救助的人在市場經濟原理下，盡可能讓他們接觸、購買有關供需者（慈善團體）或供給商品（公益活動）相關情報的方法。他也提出與其依靠以供給者為中心的慈善團體，不如提供需求者福利消費券與適當的金額，<sup>4</sup>讓他們可以選擇慈善團體與公益活動的方式。

沈恩是怎麼看待這兩種觀點呢？他重視援助的份量，也重視接受援助國家的自由。當然他更著重於後一項，可是他說的自由不是單純地不被束縛，更是指實際上人們能過著理想生活的「有能力的自由」。他的經濟發展目的在於變得自由，並認為當人們擁有可活得更更多采多姿之能力時，才能真正享受自由。

## 貧困指數與以人為主的經濟成長



沈恩從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開始關注人們的實際生活問題，研究出了測量貧窮與生活品質的貧困指數。他認為光靠現有的貧窮率，很難瞭解確切的貧窮狀況，也無法知道有多貧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研發了不只包含貧窮人口、也包含了窮人間所得不平等程度的「貧窮指數」。沈恩動用了數學知識與統計學方法研究主流經濟學一直以來避而不視的貧窮問題，為此奉獻一生，努力給貧窮階層的人帶來實質幫助。

一九九〇年聯合國發表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也是反映出沈恩的見解後研發出來的概念。這項指數包含國民所得、早死率、預期壽命、文盲、醫療福利、教育等非物質類的因素。大多數進步主義經濟學家較偏向政府為了分配而積極介入市場，不過沈恩是將市場經濟放在政府之上，並致力解決貧窮問題的進步派自由主義者。

我們試著回想華莉絲．迪里，並帶入沈恩的哲學看看。

女性參與經濟活動本身就是在補償她們。家庭決策無法反映出女性立場，這樣子不對。擴展女性權益成為改變社會的主要起因，我很高興在孟加拉看到女性運動驚人的成功。女性在地區金融市場遭受差別待遇，所以我認為消除她們承受著的損失是很重要的。

沈恩將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獎金七百六十萬克朗（現價值約十一億韓元），全數捐給教育少女的印度財團法人，以及致力於男女平等的孟加拉財團法人。經濟學家們稱呼他為「經濟學界的良心」兼「經濟學界的德蕾莎修女」的理由，正是因為他擁有尖銳的指責能力與溫柔的人情味。他也積極擁護女性主義。在中國，一百名男嬰對比八十五名女嬰，離世界平均的九十五名差距很大。他批判中國私下非法女嬰墮胎的行為，並舉出以合理思維克服重男輕女思想的韓國為例，主張中國必須接受改變。

不僅如此，他是個重視正義的人，為了建立公正的社會而犧牲奉獻。但是他沒有提出一個統一的正義概念，反而主張「比起尋找什麼

是真正的正義，倒不如尋找存在現實中明顯又確實的不義並阻擋它」。他強調，「經濟學不是以資本為中心，是必須以人類為中心」。他說著只有以人為主的經濟成長才有意義，他是一位能溫暖人心的人。

沈恩對印度官僚執著於經濟成長率的現象提出批判。他表示我們要有宏觀視野，看出在急速增加的經濟成長率之陰影底下，隱藏著被遮住貧窮、不平等之類的社會問題。他用「非常愚蠢」來嚴厲指責印度執著於追趕中國經濟成長率的行為，認為陷於兩國之間經濟比較會導致印度走上危險的錯誤道路——比起追逐經濟成長率，他主張印度的領袖應該要傾力在解決國民的慢性營養失調問題才對。沈恩向能決定政策方向的印度精英喊話，強調唯有改善社會正義、貧窮、保健與教育，經濟成長率才會有意義。

我忽然想起與沈恩很像、已經過世的李泰錫神父。請你在謹記沈恩的哲學同時，也試著把追悼李泰錫神父的一篇悼念文放在心裡。

住在南蘇丹通治（Tonj）小鎮的各位，李泰錫神父曾說：「愛並非看不到就會被遺忘的。」請永遠記住他的愛。當銅管樂團演奏著頌揚他的歌曲時，許多韓國人深受感動。他會在天上安撫地說：「通治別為我哭泣。」並以開朗的微笑永遠與你們同在。

### 【理論提出者】

阿馬蒂亞．沈恩 Amartya K. Sen, 1933.11～

他是開發出測量貧窮的數學模型的印度學者，一九九八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因主張「個人的自由引領著經濟發展」而聞名。身為研究不平等與貧窮的大師，他被通稱為「經濟學家的德蕾莎修女」。他的名字「阿馬蒂亞」有著「不朽」的意思，這是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印度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給他取的名字。沈恩在泰戈爾創設的學校唸書，自然地也學習到了尊重人權的思想。自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他在福利經濟學、經濟倫理、所得分配論領域裡逐漸

嶄露頭角，並研究出以貧困指數（Sen Index）的數學模型來測量貧窮。

---

3 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是基督教文化中一個很著名的成語和口頭語，源自《路加福音》中耶穌講的寓言，意為：好心人、見義勇為者。

4 福利消費券是指給特定使用者的社會福利服務使用券（醫療、教育、住宅等）。韓國政府會輔助部份費用，差額則由使用者補齊。

## 04 丁伯根模型

### ——經濟學中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 未能達到預期目標的端通法

哪種人的人生是喜劇，哪種人的人生是悲劇呢？在喜怒哀樂的人生當中，有些人即便遇到困難也能像不倒翁般再次站起來。這種人的共同點是生活樂觀，都擁有著不論是大或小的「目標」；無論是追求像親情一樣的細小價值，或是為社會正義、人類和平而活，他們的人生都有著指南針般的目標。許多人設立了這樣、那樣的人生目標，但在過程中都會切身感覺到很難實現目標，所以只要能完成一件人生的課題後再辭世的話，那該有多幸福呢？接下來我們試著在經濟的觀點上來討論這件事。

電信業者會花上大筆的市場行銷費用來留住客戶，手機行經常先以零元手機來招攬顧客，實際販賣時卻綁了一堆條件。同樣的手機有些人買貴、有些人買便宜，消費者的不滿持續累積。世界上沒有白吃的午餐，如果有人便宜地買到手機，也會有其他的人為此付出代價，支付著高額通訊費用。韓國政府為了糾正歪風、解決消費者不滿，自二〇一四年五月實施「行動通訊終端機流通構造改善法」（後簡稱端通法），化解了智慧手機市場泡沫化的狀況，阻止非法回扣與非法補助金行為，<sup>5</sup>使得行動通訊公司與製造商、銷售門市與消費者間的關係更加透明，期待能讓市場更穩定。

但實施端通法的結果又是如何呢？消費者若是想要確實獲得補助金，必須花上高額月租費，通訊費用增加反而導致人民怨聲載道。部份製造商氣呼呼地表示，因為無法販賣高價的旗艦機，公司都快要倒閉了；藉非法補助金來賺錢的店家在端通法實施之後，顧客變少甚至關門了。與此不同的是，韓國電信公司們卻是眉開眼笑。儘管賣量稍微減少，營業利益總額卻晉升到韓元破兆的境界。

實施端通法的時候，人們大肆討論著期望能因此減少消費者的通訊費用、建立公正市場秩序，這些遠大目標是否從一開始就只是海市蜃樓呢？輿論與媒體批判目前只有電信公司賺得荷包滿滿。現在正進行著是否要立法廢止補助金上限的論戰，有待我們持續觀察日後發展。

## 政策工具必須多於政策目標

增進消費者福利和公平公正競爭秩序這兩隻兔子，要是能夠一次全部抓到的話該有多好？但是政策實施後的現實難以處理，是否能抓到兩隻兔子，我們還是先來觀察一下兔子的生理吧！假設叢林中有兩隻兔子，牠們過著相親相愛的生活。可是突然有隻野狼跑來，兔子們嚇得魂飛魄散，便罔顧愛情、運用強而有力的長長後腿各自逃命。因為牠們分頭逃跑，所以野狼不可能同時抓到兩隻兔子。

野狼心想：「我真是太魯莽了，居然想要一次抓到兩隻兔子。」錯失兔子的野狼想起放羊少年說過的話，知道自己被騙了，並深深感到懊悔。

放羊少年是這麼說的：「一石二鳥，摸蜎仔兼洗褲，這就是我的生活指標！」

因經濟計量學而榮獲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揚·丁伯根，很討厭放羊少年這種曖昧不清、腳踏兩條船的行為。他主張目標要明確，必須要有實現的可能。他之所以散發出「正直是愛的香氣」，正是因為他在完成人生目標的過程中，採用了端正的手段，不是嗎？

丁伯根曾說，唯有當政府保有的政策工具比政策目標多或相同時，經濟政策才能好好地發揮其效果，這便是取自他名字的「丁伯根法則」，直至現今仍然受人讚揚。他主張如果有N個政策目標，就必須要有N個以上的政策工具；目標比工具少的話，就很難同時達成許多目標。

將上述例子當作是我們在生活之中，於目標與工具、或是目標與目標之間，存在著衝突和矛盾關係就行。經濟也是一樣，在執行經濟政策時，目標與工具也相當重要。經濟成長、穩定物價、國際收支平衡、就業穩定、減少兩極化現象都是經濟政策目標，擴大財政、降息則是經濟政策的工具，這些事情之間存在著許多衝突或矛盾。

## 無法面面俱到的困局

當然也是有一石二鳥的方法，像是吃了山雞也順便吃了牠的蛋的情形。但是一味追求著一石二鳥，可能會曲解了資源分配的意義，導致缺乏效率。幾年前韓國電力公司因為凍結電費而曾連續出現赤字，而在電力供需市場不佳的狀態下，低廉電價經常被指責為浪費電力的主因。這是一個能夠展現出我們為了百姓的生活而穩定物價、降低成本，卻也使得在強化企業競爭力和能源政策之間產生衝突的好例子。

低廉電價使得用電量大的產業扎根，也因此被視為「停電」的主嫌。可是困於連續赤字的韓國電力公司，卻在二〇一五年創下史上最高、達到十一兆三千億韓元的營業收益紀錄，一部份原因是電費調漲與油價下滑，導致收益大幅提昇。之後由於出口額持續走下坡，為了提高韓國製造業的出口競爭力，產業界向政府提交了「電費調降建議書」。但主管單位表示，電價雖然會影響製造成本，但政府在研究過新興產業投資、溫室氣體減排等相關因素之後，認為維持現有電價才是正確立場。韓國的電費在國際上並不高。

有哪些例子可以簡單地解釋丁伯根法則呢？

首先我們可以舉出菲利普曲線（Phillip's Curve）。短期菲利普曲線可用來看出物價穩定度與失業率間轉變的相互關係。韓國中央銀行在決定基準利率時，會運用短期菲利普曲線；即使無法馬上看到顯著的物價上升，若有失業率下降、物價上升的可能性，他們就會決定提高利率。但其結果是，物價可能會上升，失業率卻也可能提高。菲

利普曲線的例子告訴我們，事實上要抓住物價與就業這兩隻兔子是很困難的。

另一個相似的例子，是取自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教授名字的「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在金本位廢除之後，美金擔任著國際儲備貨幣的角色。國際儲備貨幣必須值得信賴且供給充足，可是現實中這兩個目標相互衝突。舉例來說，美國必須維持貿易逆差，才能充份提供做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美金。可是美國持續貿易逆差的話，國際上對美國經濟的懷疑會漸增，破壞對美金的信任，動搖其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反之，美國維持貿易順差的話，其他國家承受的貿易逆差負擔會變大，世界經濟會因為美金不夠而導致資金無法流動，造成經濟不景氣。這個困境一旦惡化，可能會演變成經濟危機的因素之一。

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前夕，中國努力地生產商品販賣，美國則努力地印鈔買東西的全球經濟失衡（Global Imbalance）現象，被指責為全球金融海嘯的成因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此創立了如同黃金、美金那般的第三貨幣：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sup>6</sup>中國主張這是為了取代美金的國際儲備貨幣，這也是起自於對美金的不信任。

總體經濟學中有一個名詞叫「三難困局」（Impossible Trinity）。理論上，所有國家都無法同時達成以下三項目標：資本自由移動、固定匯率制度（匯率穩定性）、貨幣政策自主性。這三者之間存在矛盾關係，例如在保障資本自由移動的情況下，若試圖自主地調漲利率，其後會吸引資本、匯率升值，也傷到了匯率的穩定性。如果想要維持匯率的穩定性，必須採取資本管制政策，這樣卻會導致資本無法自由移動。

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之後，開始出現了重視匯率穩定的現象，在那之前，曾視資本管制為禁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有了某種程度的穩定。許多新興國家討厭短期投機的資本，它如漲潮般湧入，毀損金



融市場的穩定性之後再撤出；為了防止短期資本流入，巴西政府甚至訂立懲罰性稅制，對現貨外匯交易課徵杜賓稅（Tobin Tax），這也是犧牲了「三難困局」其中一項目標。

一旦美國調高利率，新興國家便會發生資本外流問題；中國的經濟成長速度也會不如以前，造成人民幣貶值、外匯存底急速減少，導致持續性的金融動盪。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中央銀行總裁黑田東彥曾建議，「中國為了防止大規模熱錢流出及人民幣穩定，可以考慮採用資本管制（Capital Control）」。

## 決定目標的優先順序與對應工具

在我們繁忙的人生中，休假是對自己的甜蜜悄悄話。人人都想在最美好的時機，以最低廉的費用與心愛的人同遊，但普通情侶很難實現入住不錯的飯店、浪漫共度平安夜這樣的夢想。對手頭很緊的一般年輕人來說，想完美地擁有一切全部並盡情享受是「不可能的任務」。

國際經濟也是一模一樣，財政健全與福利政策同屬容易產生衝突的目標。歐洲面臨著財政危機，於是通過延長退休年齡的法案來減少年金費用，這是為了財政健全而犧牲福利。福利費用一旦增加了便很難降低，加上因為高齡化而導致老人的福利支出持續攀升，如果經濟沒有成長、稅收無法擴大的話，很難在現有的福利條件下維持財政健全。

當財政不足以充分提供社會福利時，難免會集中在養育或醫療等支出，關鍵在於要建立符合該國的租稅負擔率（GDP中租稅所占比重）或國民租稅負擔率（GDP中包含租稅與四大保險的比重）的福利模型。<sup>7</sup>在經合組織會員國當中，韓國的租稅負擔率與福利支出比重皆屬於後段班，但是因為高齡化的速度快，所以福利支出比重激增。人民繳納的稅金很少，卻期望著福利更好，這種想法怎麼看都不合理。福利必須考量財政健全，達到可持續提供的水準才行。

那麼，丁伯根法則給我們的人生帶來什麼樣的意義呢？

首先，設定目標時要訂出優先順序。在衝突的幾個目標之中，若想達到顯著的成果，必就須明確地挑選出最該完成的政策目標。不知從何時開始，經濟成長與雇傭之間出現了鴻溝，所以有人主張為了讓國民切身感覺到變化，提高就業率必須成為比經濟成長率更重要的目標。在全球經濟停滯之下，政府需要確實地理解經濟情況，唯有設立可以達成的目標，方能獲取人民的信任。關於就業問題，尤其是如果急需解決青年就業問題，更應該往提高就業率方面訂制政策目標。

接下來，是達成目標的工具之重要性。設定目標且想達成它的話，必須擁有適合的工具。舉例來說，在經濟停滯不前時，為了擴大需求會降低利率。但在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之後，先進國家已將利率降至零，低利率政策難以獲得成效，所以中央銀行改為買入政府所發行的國家公債，長期實施緩解壓力的量化寬鬆政策。但它究竟是不是適合拉抬經濟的工具，社會上對此疑心漸增，歐洲和日本最近終於到達必須實施更嚴峻之「負利率」政策的地步。這些國家因為國債已達到了危險的水位，很難實施擴大財政政策。

另一個關鍵，在於想要實施量化寬鬆政策，貨幣必須具有國際儲備貨幣的條件。韓國貨幣不是國際儲備貨幣，不屬於安全的資產。因此確保財政健全比什麼都重要；為了在危急之時能夠動用財政來拉抬經濟，有必要好好地照料國家的金庫。財政健全是決定國家信用評等（Country's Credit Rating）的主因，信用評等會大大影響公債發行費用。財政不健全的歐元區正持續擴大量化寬鬆政策，為了安撫對負利率與量化寬鬆政策產生擔憂的市場，法國中央銀行總裁法蘭科斯·戴加洛（François Villeroy de Galhau）曾表示，「有各式各樣的工具可以達成歐洲中央銀行的通貨膨脹目標（二%）」。這句話被視為想獲得市場信任卻力道不足的發言。

## 明確且有遠見的經濟政策

為了國家經濟的風險管理，需確保各種整體財政健全政策的工具，並將工具與政策兩者間關係調整到最佳狀態，為此當局之間相互合作也很重要。資本自由化使得外國資本像是任意進出自家寢室一樣，在自國的市場進進出出。隨著資本像漲潮、退潮一般來回進出，可能會增加金融與外匯市場的不安。為了建立防止不安的防火牆，有必要制訂各種整體財政健全政策，組織全球金融安全網，多建幾層保護網來守住國家經濟，保障國民的生活。

政府必須經常監控外匯存底對比短期債務比重、外匯存底對比三個月的進口額、貨幣供給額對比外匯存底、經常收支等指標。而在政策當局與管制當局的目標不同之時，因為政策之間存在著觀點差異，為了調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其他總體財政健全政策間的關係以達最佳化，政策當局之間自然需要緊密合作。在經濟持續停滯不前的情形時，就算使出利率政策，仍會存有許多觀點上的差距。如果調降利率，試圖拉抬經濟，就得擔心資本外流、家庭負債增加的問題，所以重點必須放在政策上。為了在瞬息萬變的經濟環境下跟上腳步，各式各樣的政策組合更顯重要。

我們現在正過著什麼樣的人生呢？在競爭激烈的大熔爐裡，唯一的目標是成為贏家嗎？你是不是說著「這世界只記得第一名」，而自行走進疲倦不堪的人生中呢？在朝向目標不停競爭的過程之中，許多人氣喘吁吁、深感挫折。父母們也會將自己未完成的目標強壓在孩子身上，盲目朝著設定好的目標傻傻地奔跑。若是不認真思考為什麼要過著這種人生，我們就只能到處隨波逐流。

經濟政策也是一樣，沒有遠見且急於完成短期目標，政策便會喪失信任。不論是政府或個人，若是想完成某些目標，首先要確立目標的優先順序，尋找達成目標的最適當工具，並持續努力朝著目標前進才對。如果你記住了丁伯根法則，並試圖從各層面物色工具的話，我相信你就可以跨越難關，達到預計的目標。現在正是需要這種人生智慧的時候。

## 【理論提出者】

揚·丁伯根 Jan Tinbergen, 1903.4~1994.6

荷蘭經濟學家。他將數學與統計學融會在經濟學之中，發展出能展望未來經濟現象的經濟計量模型（Econometric Model）。他因提出量性地解決以國為單位的經濟循環，而與挪威的拉格納·弗里希（Ragnar Frisch）共同獲得一九六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荷蘭萊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y）主修數學與物理系，之後在荷蘭中央統計局工作，累積著經濟計量學的基礎。他曾在聯合國的前身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擔任經濟顧問委員。

---

5 根據法案中的定義，在購買行動通訊終端機或設備時，為了補助人民購買，政府會給予經濟上的優惠（例如打折、補助入會費）。三家通訊公司的補助金都不同，但有些店家會謊稱「這是本店特價」，其實那是顧客本該享有的優惠。或是原價賣手機時，店家不使用通訊公司的補助金，而是自行打九折（少於補助金），借此賺取差額。

6 特別提款權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設的一種儲備資產和記帳單位，是用於進行國際支付、平衡國際收支的特殊工具。特別提款權會依據各成員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進行分配。

7 韓國的四大保險為職災、年金、健保、失業保險。

# Chapter2

## 我們正面臨的挑戰

Challenge Facing Us

# 01 搜尋摩擦理論

## ——經濟再完美也不可能零失業率

### 資訊落差造成工作不對稱

當景氣好到完美的時候，失業率會为零嗎？或是景氣不好的時候，職缺可以馬上填補上嗎？並非如此。失業有分在全球景氣停滯時，很難找到工作而產生的循環性失業；也有因產業結構變化，獲利下滑並將設備轉移他國，使原本的員工們沒了工作，這是結構性失業；還有因農閒期不需要人手而產生的季節性失業。

二〇一〇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彼得·戴蒙德，注意到在這持續求職與徵人的情形裡，勞工與雇主之間因為不符合相互的條件，而產生了自發性失業。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在報告中提出警訊，即便企業的職缺增加，也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勞力而不應徵人才，失業率不斷飆升。我們該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商品市場隨著價格的變化，需求與供給會傾向尋找具有彈性的平衡點。但是在勞動市場裡，很少看到人們可以隨時找到想要的工作，也很難看到企業隨時聘用到想要的人才，所以總是有人失業。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試著來思考人倫大事的結婚問題吧！女孩子從小就開始尋找白馬王子，但是王子並不會輕易出現。漸漸到了適婚年齡，她曾經不知天高地厚的眼光也不知不覺地降了下來，恰好這時找到了合適的對象便結婚了。來回尋找對象的過程中，她也經歷了幾次合不來而分手的考驗，並在金錢上、時間上有所損失。於當事者與父母而言，這種找對象的成本是很大的負擔。若在千辛萬苦之後，還能遇到最棒的另



一半的話，那真的是太好了。我不是在表達結婚至上主義，而是在說以結婚為目標在物色對象的人。

未能成功結婚的人，必須傷心地負擔成本繼續尋找對象，他們是直接面臨配對困難的族群。有些人會透過婚姻介紹所找對象，配對成功的成本不容小覷。介紹所為他們找到彼此的理想條件，減少物色對象的成本，加快速度幫他們找到另一半，這是婚姻介紹所的第一輪目的。以結婚為最終目標的男女若是難以自行完成目標，都會想要尋求別人的協助。

這種理論在就業市場也很常見。一邊是求職難，另一邊是找人難；中小企業苦喊著缺人手，青年失業率卻居高不下。許多企業在徵才的過程中會面臨配對問題，企業不斷想找到更好的人才，勞工則不停想找到更好的公司。即使有一個人正在找工作，如果不知道哪間企業會僱用自己的話，就會發生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的情形。求職會產生交易成本，所以求職與徵才的過程並不順暢。就算求職與徵才的需求與供給充足，但是當未能與就業相連運用、造成失業發生時，又該怎麼辦呢？所以政策的重點需放在「搜尋過程」，才能解決失業問題。

彼得·戴蒙德、戴爾·摩坦森（Dale T. Mortensen）、克里斯多福·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稱眼光不同而發生的不合拍為「搜尋摩擦」。依照他們的搜尋摩擦理論（Resistance Unemployment Theory），勞力的需求與供給相遇時並不會產生職缺。他們一致同意，因為資訊不對稱、求職需要成本而發生錯配職業，造成時間與資源的浪費時，減少搜尋成本能增加人力資源分配的效率，有助於促進國家經濟。這三位學者從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開始，便積極運用搜尋摩擦理論研究失業問題，並在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代獲得許多成果。他們針對二〇一〇年勞動市場的先行分析，其貢獻獲得大眾認可，也終於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市場的就業資訊很不充足，求職與徵才的成本越是增加，勞工與企業尋找到對自己最有利的工作與人才的時間就越長，像這樣發生的失業稱為摩擦性失業。雖然不可能完全消滅摩擦性失業，但如果能盡力幫助求職者與雇主順暢地交換資訊，調整彼此的眼光的話，失業率可因此大幅降低。所以企業與政府必然要投入更多的時間與金錢——企業在徵才廣告或應徵人才過程上要投入許多資源，並且錄用專家、聘請人才；政府則有必要努力透過在職教育培養適合企業的勞工，設立就業中心使求職者與雇主配對成功。

## 「搜尋工作」是勞資調整成本的過程

戴蒙德的勞動市場研究基礎概念，建立在資源分配缺乏效率之上，「追求效率的市場經濟，在現實中其資源分配也經常沒效率」。現實經濟裡，購買商品時也需要支付一堆交易成本，即為所謂的「跑腿費用」。更別說勞動市場和住宅市場，才是搜尋成本最高的代表性市場。在勞動市場裡，薪水不是唯一能使需求與供給順利運作的因素；總是有在換工作的人，也有騎驢找馬的人，人們會經常思考自己身處的公司是否合適。穩定的就業不足（又稱自然失業）跟固定的職缺數量、薪水之間的差異，才是勞動市場的真面目。除了薪水之外，有些求職者還會關注著對象公司的風評，或是提供的員工福利好不好。

戴蒙德在商品市場與勞動市場中，實際感受到像這樣「兩者不同的香氣」。有人認為只要調漲薪資就能解決失業問題，那可是他們的失算。也有人錯以為用錢就可以買到愛情，但是合不來的情侶無法天長地久；即便戀愛時投入了很多努力與時間，若是兩人的眼光對不上，百萬玫瑰最後也是扔進垃圾桶。放棄求職的人或失業者，自然會考量到求職時需投資的本錢，至今依然有些年輕人在聽到「請放低眼光」的建議時，寧願逃避現實也不願妥協。所以他們不會無視職缺優劣先上工再說，而是會一直「搜尋工作」，等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出現

為止。他們也可能大膽地投資時間與金錢，有系統地準備考試、找工作。

我們再試著更生動點地瞭解搜尋摩擦理論。

求職者與雇主的關係像是結婚，各自都需要算一下八字。企業與求職者不會馬上簽約，彼此會為了追求更能幹的人才與更好的薪水條件，因而投入時間與資源持續進行情報戰。過程中，求職者可能會收到工作邀約，最後可能接受或拒絕。這場情報戰會結束在最恰當的瞬間，並且達到配對；摸索的時間越長，越會直接、間接地增加求職者的成本。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而產生求職成本以及放棄某工作的機會成本，持續這種失業的狀態只會令人感到惋惜。求職時間一旦拉長，人會變得焦慮不安，最後無法再承擔成本，很有可能降低自己的期待值，這與單身熟女降低眼光的現象相似。

公司徵才的時間越長，越會增加缺乏人力的成本，所以接受調漲薪水提案的可能性也會變大。最終，當雙方的要求吻合之時，便決定了實際薪資水準並結束失業狀態。實際薪資水準、期望薪資、產業的價值、找工作成本等因素交互影響，使得工作的創造與消滅現象不斷出現，持續形成勞動人口流入又流出的流動情形。最後，試著把這種情況套用在搜尋摩擦理論，得知失業的根本原因是求職者與雇主承受的成本不一致，而求職可以說是在調整成本的過程。

## 有職缺不代表有就業

某種程度來說，摩擦性失業難以避免，因為這是尋找八字更合的另一半的過程。這三位教授相信某種程度的失業會為經濟帶來正向效果。有人失業代表公司可以更輕易填補職缺，求職者也會因為職缺越來越多而更容易就業。那麼，摩擦性失業何時會造成問題？戴蒙德認為，實際上企業想聘的人數對比失業人數，是觀察勞動市場的重要指標。如果失業人數比錄取人數要高出歷屆平均許多，意味著缺少合乎公司胃口的求職者，也代表就業市場中充斥著因長期失業而無法擁有

符合再就業之職能或知識的人，導致政府在解決此問題所需的成本變高。

戴蒙德教授曾被歐巴馬政府提名為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 FRB）理事，但是因為共和黨的反對而無疾而終。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讓我們試著從美國政黨的角度來看失業問題。共和黨認為給予人民長期失業津貼福利的話，失業率會提高，找工作的時間也會變長。他們堅信高額失業津貼反而阻礙解決失業率問題，這個狀況實在有點諷刺。

假設失業津貼調漲，國家負債自然會因此增加，領取津貼的人則會一直領到景氣好轉為止。急需用人的企業為了聘僱適任人才會提高薪資，卻也因為全體僱傭成本上升，而減少相對不必要的人力，其結果是失業率可能會增加。共和黨反對戴蒙德的表面理由是覺得他缺乏對利率或金融的相關經驗，但實際上是因為比起財政健全，戴蒙德更贊同政府需拉抬經濟的立場。曾是美國聯準會（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主席班．柏南克（Ben S. Bernanke）指導教授的戴蒙德，在當時也數次闡揚自己的意見。

二〇一一年當時美國的經濟非常糟糕，在急需先解決循環性失業的狀況下，戴蒙德主張為了降低失業，必須實施寬鬆的通貨、財政政策，這一主張很具說服力。但是共和黨不贊成戴蒙德提出的降低失業津貼意見，也看不順眼他的觀點。戴蒙德認為，失業津貼必須以「社會安全網」的角度來看待，政府應當長期盡力減少失業率。

當然，他並沒有排除領取短期失業津貼也可能增加搜尋時間的可能性。失業給付在最具代表的勞動市場中，其政策效果存有許多歧見，因此美國政府現在也嚴格限制失業給付的請領資格與期限，調整失業給付金額，並且為了填補失業給付而整頓薪資所得稅等，持續討論這些政策的變化。失業津貼大大地影響著求職者與雇主的工作搜尋意志與強度、薪資談判、決定是否參與勞動市場，有必要持續地研究。

貝佛里奇曲線（Beveridge Curve）是能顯示出就業與失業間反比例關係的圖表。雖然發表時期與菲利普曲線相同（一九五八年），相較之下卻未受矚目。韓國央行分析美國、日本、德國、西班牙、韓國等五國的貝佛里奇曲線趨勢，發現韓國、美國、西班牙三國在金融海嘯之後，貝佛里奇曲線皆往右側移動了，而日本、德國則是往左邊移動。貝佛里奇曲線往右移動，是指即便出現職缺，失業率也會增加的意思，這有可能是因為退休等理由出現職缺，但是招聘新人的人數卻沒有相應增加，或是高學歷、大學畢業生只專注在優質的職缺，所以這種現象帶來複合性影響的可能性很大。

## 減少搜尋成本以克服就業寒流

經歷全球金融海嘯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之後，主要大國勞動市場的工作不對稱現象更加惡化。學歷膨脹與企業徵才間的差距，導致韓國青年層的工作不對稱指數高居經合組織會員國中的首位。將貝佛里奇曲線理論化的戴蒙德會如何看韓國的青年失業呢？面對自詡人民的學歷是經合組織之最佳的韓國，他應該會說這是「外部不經濟」（External Diseconomies）問題。

競爭越趨激烈，找工作必須投資許多時間與成本，這是最近年輕人面臨的現實。為了跟其他求職者競爭，導致出現「累積學經歷、證照」的消耗戰，產生得投資更多時間與成本的惡性循環。因此也出現了揚言不看學經歷、證照技能的企業，而在強調「去華麗履歷化」的社會氛圍中，企業的徵才方式彷彿成了選秀節目。大學延畢生和準備公務員考試的人也呈增加趨勢。

這種情況嚴重到摩擦性失業會（不得不）被視為自然性失業、暫時性失業，所以我們需要更多面向的政策來改善。過度保護既定的勞動市場，使得就業彈性下降的話，會很難再招聘人才；即便錄用了新人，也很容易將人才放置在不適用的職位上。以年資為主的薪資結構，也讓企業難以輸入新血。青年失業當然不完全是屬於摩擦性失

業，不過數量仍然相當多。難就業的最大原因，是在欠缺優質工作的同時，企業也因景氣停滯而不願招聘人才。

無論如何，大家持續討論如何解決「無就業機會的景氣復甦」問題，戴蒙德強調政府需要傾聽人民心聲、改善制度，以減少勞動市場搜尋成本。二〇一六年二月，韓國青年的失業率高達十二．五％，創下史上最高峰，青年正經歷著最糟糕的就業寒流，媒體報導體感失業率是三倍之多。青年失業如此極度嚴重，但中小企業反而是苦於人力不足。如果說有數十萬大學畢業的青年求職者找不到工作，這顯然會對經濟成長率帶來負面影響。

為了解決這種青年失業問題，所有人都必須繼續努力。政府要透過培養新興產業，來創造良好的工作；藉由合理地調整大學招生名額，以整頓高學歷人力過剩問題、擴充職業訓練系統培養符合企業所需人力；也需要持續研究如何協助失業人士再就業與創業，並準備各種擴大中壯年層求職機會的方案。

對於摩擦性失業，建造「需求與供給」的大數據有助於解決工作不對稱問題。若是真能建立出理想的就業供需大數據，勞工就可以找到符合自己特性的工作，也有助於公司將重要人才放在適合的位置上，如此便可降低失業率，提高社會整體的經濟效率。公司經營者必須致力於控制過度上升的薪資，打破以年資為主的薪資結構，解決正職與非正職間的薪資落差。求職者也不要只嚮往進入大企業，必須抱持著若能找到符合職能的工作，即便在優良的中小企業裡也可以工作的心態。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全球景氣必須轉好。

### 【理論提出者】

彼得．戴蒙德 Peter A. Diamond, 1940.4～

他畢業於耶魯大學，後在麻省理工學院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勞動市場、年積制度與社會福利政策，現為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他在勞動領域是美國首屈一指的學者，因經濟政策對失業的影響

為主的勞動市場研究成果而廣受認同。二〇一〇年，彼得．戴蒙德與克里斯多福．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曾在一九八六年擔任經濟計量學會會長，二〇〇三年擔任美國經濟協會會長。他以身為美國重要的經濟、社會、學會團體的重要成員到處參與活動，在學界與政界也有高知名度。



## 02 直升機撒錢論

——那麼多的錢都跑到哪裡去了

### 量化寬鬆造成資金流竄

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各國多不勝數的錢財都跑到哪裡去了？當時先進國家因為財政狀況不佳，所以財政政策的效果不大；利率已經低到為零，無法再使用調降利率的政策。於是美國、歐盟、日本中央銀行購買政府發行的債券，再以增加貨幣的量化寬鬆政策來試圖增加銀行的貸款能力。這個政策不是直接發錢給店家或公司，而是擴大商業銀行的貸款能力。政策當局期待貸款能力變大的銀行釋出的錢財會往資產市場流，然後購買現貨或金融資產，藉此成為帶動現貨市場的力量。

股價上漲、個人財富增加的話，會出現增進消費的效果；中央銀行發錢也提高了物價上漲的預期心理。如果財富增加真能引發消費增加，那麼這與減免稅金、提高民眾消費能力的效果很相似，所以量化寬鬆政策最後成為了籌措貨幣的減免稅制政策。但是，即便中央銀行發放了貨幣，物價也未如預期地上升，反而出現債券定價上揚、債券收益率下滑的現象。商業銀行開始購買風險更高的公司債券和股票，相關資金也流向了不動產市場，使得整體資產價值上升。

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海嘯後，先進國家量化寬鬆政策釋放出來的錢流入了新興國家，也提高了新興國家的資產價值。可是新興國家因延緩結構改革、原物料價格下滑，經濟日漸蕭條。美國在二〇〇九、二〇一〇年兩度實施量化寬鬆政策，美國經濟中的現貨部門卻未出現預期成效；二〇一二年開始進行第三次量化寬鬆政策，到了二〇一四年現貨部門指標才終於出現有意義的數字，這樣反而令人擔憂起頻繁的流動性。大眾觀察指數創新高的美國股市，議論著是否會泡沫化。但日本與歐洲的多數國家，即便實施了量化寬鬆政策，商家的消費或

企業的投資卻未像美國那樣增加，錢只有流入債權、股市與不動產，使得中央銀行更加煩惱。

中國也掀起了股市投資熱潮，大家都在購買股票，導致中國股價短期內急速上升。同一期間，儘管全球經濟仍不穩定，美國經過一番曲折之後，還是於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將長期維持在零的基準利率調升到〇．二五％。可是一踏入二〇一六年，中國因為經濟成長率放緩、金融動盪等因素，股市開始急速下滑，並導致全球股市同步大跌，數月之後才找回些許穩定。有些人甚至看準中國不穩定的經濟，下注賭人民幣會貶值——華爾街正是這麼做，大規模賣空的行為像是在與中國政府較勁。

這有如電影《大賣空》其中的一幕，發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的銀行為了降低對自身的傷害，付錢給像是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這樣的信用評等機構購買評價等級。這是金融機構與信用評等機構聯手進行詐欺，造成無辜的人受害。華爾街人士找上標準普爾，追究為何沒有調降銀行信用評等，卻收到「你是個偽君子！」的答覆。究竟誰才是偽君子呢？利益掛帥，金融機構、信用評等機構都不擇手段地背叛彼此；一想到這是「金融的屬性」就讓人感到心酸。

日本早在二〇〇一年便領先全球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卻失敗了。非常積極的日本安倍政府再度實行量化寬鬆政策，可是每當經濟指標呈現政策效果不如預期，他們便會坐立不安。或許是擔心只實行量化寬鬆政策還不夠用，日本中央銀行在二〇一六年一月時投入了負利率政策，而在美國的利率調漲、油價下跌、中國經濟成長緩慢等因素影響，全球經濟亂成一團之際，負利率這招苦肉計成為了全球經濟的話題。

## 需繳交帳戶保管費的「負利率」

「拜託，別把錢存在銀行，請拿出來花。把錢放在儲蓄戶頭要繳交保管費用。」

日本中央銀行引進負利率之後，日幣曾暫時停止跌勢而急速回升。金融市場一旦動盪不安，便會出現偏好購買無風險資產（也就是日幣）的效應。可是日本股市辜負了政府的期待——上次實行量化寬鬆時，他們以漂亮的股市成績作為回報，這次卻表達出對負利率新政策的不滿。日本的負利率政策會如何影響個人或企業，我們必須持續觀察。

日本的負利率政策意義在於商業銀行若將錢（儲備金）寄放在中央銀行，將必須支付手續費。通常商業銀行會將法定存款準備金或超額準備金放在中央銀行，負利率政策則會促使商業銀行不要把錢存進中央銀行，而增加投入民間的金額。這是因為通貨膨脹未達到預期目標，日本中央銀行對經濟前景感到不安而實施的苦肉計。當商業銀行需對存放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支付利息時，日本人民開始擔心商業銀行會為了維持收支，轉而向存錢在銀行的人民索取保管費用。雖然各國經濟的情況不同，瑞士由於不樂見瑞士法郎升值，比日本更早實施了負利率政策。二〇一五年十月起，瑞士A B S銀行（Alternative Bank Schweiz）開始向個人存款收取負〇．一二五％的利息。

這期間人民抱怨著大企業不投資，只把錢囤在了某處，這是因為企業判斷世界經濟會基於各種因素而萎縮，景氣也不穩定。為了給萎縮的企業注入活力、鼓勵外銷與投資，安倍晉三總理實施了特別措施。被稱為「安倍經濟學」的政策核心是讓日幣貶值，提高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可是安倍經濟學實行後，日本企業並未如所想地將賺進的錢再拿去投資。儘管這件事還需要繼續觀察，但是都做到實施負利率的地步還成效有限，難怪會有人說安倍經濟學不算成功了。令人擔心的是，要人民別存錢、多花錢，用實質經濟逼人民花錢的負利率政策，這種要求對銀行、保險、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而言是否合理。在日本實施負利率之後，全球銀行的股價都受到波及。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珍妮特．葉倫（Janet L. Yellen）對此劃清界線，表示現階段美國不需要負利率。全球經常盯著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的發言，因為在充滿著對各國貨幣未來的各式各樣預測

中，美金價值的走向始終是其中關鍵。美金這種貨幣以商品之姿流竄在全球，是個令人在意其價值流向的魅惑之物。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以國債作擔保，將「美金」商品租出去；美國政府則為此代價向聯邦準備理事會支付訂定的利息。事實上，美國國債是以美國人民的納稅能力為擔保而發行，最終使得美金成為美國人民的債務，每次美金發行，美國人民都必須承擔向聯邦準備理事會支付利息的義務。

我們懷疑美國美金貨幣的信任度，正如同美國政府懷疑已承擔許多債務的美國人民是否有能力償還；透過量化寬鬆被釋放的美金，成了美國人的負債。因為許多國家深陷債務困境，因此人民身為國債投資者會懷疑本國政府或中央銀行的信任度；投資人思考手中握有的國債是否有能力贖回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零利率的情況下，勉強實施的量化寬鬆政策彷彿流行病般地在先進國家中蔓延，但也有許多人開始質疑經濟成長的實效性與財富分配的公平性。量化寬鬆應該可以促進經濟成長，進而提高政府的償債能力並降低國家負債，但各國實施後的現況並非如此，甚至接連出現推行負利率的國家，使得人們對中央銀行的信任日漸動搖。

## 紙幣滅亡的時代即將來臨？

我們太習慣獲得利息了。如果把錢放在中央銀行，商業銀行自然期待獲得利息。如果說把錢存進銀行卻要繳交保管費，老百姓究竟如何打造自己的資產呢？人們認為日本銀行很可能會進一步降低負利率。使用負利率的國家有歐元區、丹麥、瑞典、瑞士等，這些國家的社會因為不熟悉負利率，政治上的爭論逐漸激烈，使得金融安全性下滑，這就像是沒有罪的錢卻正遭受著處罰。在現實而非小說中發生了這種事，讓人非常好奇全球經濟之後會怎麼發展。

實際上，前美國財政部長羅倫．桑默斯（Lawrence L. Summers）在幾年前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討會上，曾主張負利率（負三％～負二％）做為克服承受龐大負債的經濟方案，也就是將一百美元交給銀

行，只拿得回九十七～九十八美元。學校教我們通貨膨脹是降低金錢的價值，如今負利率導入了另一項降低金錢價值的因素，我想經濟學課本需要改寫了。紙幣繞了一圈回來之後不只外觀磨損，價值還降低了，莫非紙幣滅亡的時代即將來臨？當把錢交給銀行保管反而造成損失時，持有現金的人就會越來越多。另外，先支付費用或快速償還債務時所獲得的優惠也會消失。

歐洲各國正發生著呼籲人民慢慢繳稅這種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店家也開始轉為給長期分期付款或貨到付款的客人提供優惠，不再鼓勵客人一次付清或預先付款。既然把錢放在銀行會有損失，許多投資者轉向至少還有賺頭的不動產發展。採用負利率的瑞士（家庭負債占GDP比重第一名）和丹麥的不動產價格已經大幅上升，這些國家的家庭負債比重比韓國還高。因此許多專家擔心一旦長期實施負利率，股價與不動產會出現泡沫化。從量化寬鬆到負利率，有人說「即便使用直升機飛到空中撒錢，也要拉抬經濟」。說不定他們是想要召喚外號為「直升機班」的班．柏南克（Ben Bernanke）。

## 從量化寬鬆到直升機撒錢

我環顧全球還是找不到經濟正常的國家。歐洲、美國、中國、日本全都處於低物價狀態（或是物價下跌的通貨緊縮），承受著龐大債務之苦。政府繼續實施著不被人信任的政策，人們自然會對「貨幣的信任度」起疑。我忽然想起了強調這些全是貨幣現象的貨幣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我們來看看他在《貨幣的禍害》（Money Mischief）書中的論述。

在加羅林群島之中的某座島，島上原住民以石灰岩製成的巨大石頭當作貨幣。島上有一位擁有最大石頭幣的富翁，沒人看過他那顆最大的石幣，因為他幾代之前的祖先早將那顆大石幣扔進海裡了。村民們在偶然間知道了這件事，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呢？儘管大石幣在大海之中，村民人還是相信它是屬於富翁的，並承認他的地位。

這個故事的重點在於人們對貨幣的信任。傅利曼藉此想告訴人們，貨幣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而此信任必須穩定維持才能支撐住貨幣。

為了維持中央銀行的信任度，傅利曼主張「固定貨幣成長法則」（K-percent Rule）。與經濟走向無關，每年的貨幣供給額必須固定維持 K %，才能延續人們的信任。不過現代很難遵守傅利曼這個法則，像是最近人們不帶很多現金，所以金錢交易的流轉速度（貨幣流通速度）不穩定又變得緩慢。傅利曼是假設世界的貨幣流通速度處於穩定狀態。當代世界已與傅利曼提出固定貨幣成長法則的時候差異很大，現在的中央銀行比起貨幣供給額，更加重視以基準利率為主的貨幣政策，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日本、歐洲一部份國家的負利率。

傅利曼一直捍衛著這個信任法則嗎？對他來說也有例外，那正是直升機撒錢。這是指為了拉抬經濟，中央銀行採取非傳統貨幣政策，印製新鈔後提供給市場，像是從直升機上撒錢似的。柏南克的「直升機撒錢」點子正是受到傅利曼影響，可說是他的徒孫。當基準利率成為負值，經濟卻仍然無法順利運轉時，許多人討論著還有哪些可行措施。這種情況下，傅利曼的主張在某方面有著說服力。英國工黨黨魁傑瑞米·柯賓（Jeremy B. Corbyn）也對傅利曼的這個說法感興趣，提出了「人民量化寬鬆政策」（People's Quantitative Easing），主張若是由中央銀行印鈔給政府投資基礎建設（例如道路運輸）或公有住宅，就能牽引就業率提高、經濟成長和物價上升，可惜事情並沒有這麼單純。各國政府與中央銀行必須對直升機撒錢政策取得共識，因為這兩項主張看待經濟的目光可能不同。

全球經濟正停滯不前，可以引領市場需求的東西並不多。於是比起柏南克堅信藉由提高資產價值可以間接創造出需求的見解，人們現在更為關注傅利曼別樹一格、瞄準直接效應的直升機撒錢論。當為了搶救經濟需要大規模的消費，卻連降息也沒有用時，人們會更加關注「直升機撒錢」的作法。

歐洲和日本的中央銀行長期與通貨緊縮對抗，因為通貨緊縮帶來的物價下跌會造成人民延遲消費，進一步抑制消費需求。若是消費者都不肯掏出荷包花錢，難道不會出大事嗎？我們再來看一次全球經濟。為什麼大多數國家的家庭支出都達到了極限呢？那些國家的工業生產指數為什麼糟糕呢？全球正關注著許多國家為債而苦的狀況。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之後，在政策手段受限的情況下，經濟體系發生許多震驚世人的奇怪現象；所謂的「新常態」——隨著時間遞移而改弦易轍的全球經濟新秩序——也備受爭議。

當經濟政策的藥效堪慮時，中央銀行用直升機撒錢還會有用嗎？美國明白表示不會實施直升機撒錢，歐元區則是從法律上禁止這種作法。而日本這個國債占GDP比重最高的國家又是如何呢？負利率一登場，全球媒體便指出日本法律並未禁止直升機撒錢。全球經濟持續動盪，曾向柏南克徵詢意見的安倍總理，看來會進行許多比負利率更新穎的金融實驗。他這麼說：「我們得加速脫離這長達十年以上的通貨緊縮。」

##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全球都在關注日本要如何靠緊急應變計畫來減少國債，以及怎麼延續安倍經濟學。諸如日本的龐大國債或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正把很多國家逼上了懸崖。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必須領悟到強化國家財政儲備、處理家庭與企業的負債問題有多麼重要。

我們也必須留意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日後的利率調漲動向。在日本實施負利率政策之後，全球金融市場變得動盪不安。其他國家的經濟成長低迷時，美國經濟也會受到影響。但如果美國的就業指標表現良好，對經濟成長抱有充足信心的時候，美國可能會加快利率調整的速度，藉此吸收流動性過剩。美國股市雖然在二〇一六年初曾因中國經濟發展緩慢而嚴重下跌，但於同年七月便強勢反彈，道瓊指數與標準普爾指數皆因經濟指標好轉而創下二〇一五年以後的新高。美國股價上升打破了因日本負利率而面臨的經濟動盪不安，也導致難以評估



英國脫離歐盟（Brexit）這種全球經濟不穩定新因素的影響有多大。如今是全世界融為一體的全球化時代，當美國調升利率，而其他國家卻實施負利率時，可能會因為各國中央銀行的目標衝突而產生問題。所以在金融海嘯以後，G 2 0 峰會屢屢強調各國政策彼此協調的重要性。

說到這裡，我們來回想一下傅利曼的名言吧！他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句話充份表達出當今世道，直升機撒錢自然不例外，終究要付出代價。強風正在吹襲，阻擋我們前進，但我們就算感到委屈也無從埋怨，因為所有的一切都相互連結。雖然現在難以預測全球經濟的下一步走向，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大力地踏出每個步伐。

### 【理論提出者】

米爾頓．傅利曼 Milton Friedman, 1912.7～2006.11

他是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對抗著一九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之後崛起的凱因斯學派。他指責就算政府為了拉抬或穩定景氣而推行調整薪資或物價的財政政策，從實施到效果出現為止之間會出現嚴重的時間落差，政策也無法順利運行。他更重視要持續增加貨幣供給額的貨幣政策。他在一九六二年與妻子蘿絲．傅利曼一起撰寫的《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反對將個人主義的傳統價值套用在當時的社會福利制度上，並主張由負所得稅來取代（當一個人的所得未達最低生活費用或繳稅額度的話，政府會補助最低生活費與實際所得的差額之稅制。韓國的薪資所得獎勵稅制也是同樣的主旨）。

## 03 人口革新論

### ——單身稅是否正當

#### 單身稅是史上有據的稅制

在三十歲左右時，應該幾乎沒有人能在事業、婚姻都很成功。近來結婚不再是必選，而是可自由選擇的選項。那麼，如果說要向沒生孩子的未婚人士收取「單身稅」，人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大家應該會怒吼那是什麼鬼話，但單身稅並非毫無根據的說法，過去或現代的其他國家都曾實行過。歷史上可從古希臘和羅馬找到單身稅的起源，當時只要超過了一定的年齡卻還沒結婚的男人，會遭到國家剝奪選舉權或課單身稅；沒有孩子的話，就不承認他的繼承權。在現代，歐洲與美洲部份國家為了解決低出生率，也有徵收單身稅的情形。

萬一韓國也引進單身稅的話會怎麼樣呢？現在年輕人就算沒被課單身稅，也已經被就業難、高房價等困境壓迫，放棄戀愛、結婚、生子的「三拋世代」正在增加；若是再實施這種制度，心酸的單身者們的反對聲浪不會更激烈嗎？除了單身稅，我們可在許多國家的租稅制輕易看到根據有無子女或有無結婚，而實施有所區分的徵稅。大部份的先進國家中，也可見到依據有無子女而存在租稅的差別。但拿韓國與經合組織的主要國家相比，單身家庭與育有兩子的家庭之間所承擔的租稅差距非常小。

#### 經濟是人口，人口即國力

過去二十年間，豐富的工作年齡人口（十五～六十四歲）是亞洲能夠在全球貿易與全球GDP總額增加所占比重的主要原動力。但頻頻有預估認為，人口減少會衝擊到以亞洲為首的全球經濟未來。雖然也有人反問，提高勞動人口不就成了？但是不安感不會消失，它依然是現在進行式。

聯合國預計到二一〇〇年為止，會有六十%以上的國家處於人口減少狀態，大多數亞洲國家接著也會加入其中。擁有全球二十%人口的中國在二〇五〇年會面臨勞力不足的窘境，因此中國會廢除一胎化政策，甚至有人說會出現婆婆與媳婦都懷孕的奇異景象。另一方面，聯合國預測到二〇五〇年為止，全球人口會增加三十二%，但是工作年齡人口增加二十六%後就停止了，反而是先進國家的工作年齡人口會減少五%。我一聽到韓國與日本的工作年齡人口各自會減少二十六%、二十八%，便不自覺地發出長長歎息。

這種「從人口減少演變成經濟規模縮小」的可能性足以讓人畏懼。其中，接受許多移民的美國，工作年齡人口反而在二〇五〇年時會成長十%。歐巴馬總統在二〇一四年末時，曾發表暫緩執行遣返五百萬名非法移民的移民改革案。因為非法移民中有許多年輕人，長遠來看他們可成為養活美國的基礎。對此，共和黨執政的二十六個州政府提告歐巴馬，他們表示移民問題必須立法解決，而不是由行政命令來處理。最後在二〇一六年六月底，美國最高法院以程序上的原因撤除了歐巴馬的移民改革案，拯救非法移民的意圖失敗。

「經濟是人口，人口即國力」是很理所當然的主張。因為韓國預估在二〇一七年開始就會面臨工作年齡人口減少的狀況，我們有必要持續關注日後美國移民政策的發展方向。

## 難民對歐盟經濟的影響

我們轉個方向，來看看為難民問題傷透腦筋的歐洲。德國同樣預計工作年齡人口會減少，所以對難民採取友善措施。德國郵政銀行預估隨著難民的進入，到二〇三〇年首都柏林、波茨坦、漢堡等德國主要城市的房價會上升。難民可緩解一定程度的低出生率問題，並且能促進占GDP比重四%的建設業投資擴大。隨著德國政府財政支出增加、實施基本工資制度，內需市場有望好轉，難民也將成為德國經濟成長的動力。德國的難民開放政策除了人道觀點，也帶有政治的考量。

我們來聽聽在二〇一五年爆發史上最大規模、一百一十萬敘利亞中東難民湧入德國時，安吉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總理說的話：「如果德國成功收容這些難民，我相信今天的挑戰將成為未來的機會。從收容難民到整合進社會，需要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努力與資金。我們必須負擔這些，渡過這個困難的時期，這也是我們的現實。德國是強悍的國家，我們會成功地去面對這一切。」

她將進入歐洲的敘利亞難民視為「並非歐洲社會的不安，而是機會」。德國對低出生率、高齡化問題的對策是收容難民，這也是她一貫的信念。有觀測顯示約在二〇六〇年時，德國人口會大大減少二十%、勞動人口減少三十%，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然不能無所作為。

但反對聲浪也不可小覷。二〇一六年三月在德國三個州進行的議會選舉，梅克爾總理帶領的基督教民主黨失敗，而反難民的極右派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迅速崛起。為了阻擋非法難民，另擇黨甚至主張必須賦予國境管理人員在必要時可開槍射擊的權限，也播放了一名女性出來喊話「我想要保障外出的安全」的廣告，並要求驅逐犯罪的難民。梅克爾當然也不是主張要收容所有的難民，她只准許收容來自像敘利亞那樣國家處於高度危險的流亡人口。

在德國，一名即將遭到驅逐的巴勒斯坦難民女孩的故事，弄哭了許多人。「我想要繼續唸書，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樣有夢想，上大學就是我的夢想。雖然我目前在這裡生活，卻無法擁有未來，因為我不知道日後自己是否能繼續在德國生活。必須看著別人享受人生的樣子，實在是太痛苦了。」

德國公營電視台播放出梅克爾與這名少女的對話，梅克爾以冷淡的口吻回答德國無法收容全部難民，不知道少女是否能理解總理所謂「政治很複雜」的意思。不過，中東人和非洲人為了生存而定居歐洲，住在破舊的房屋裡，做著沒人喜歡的工作，從事著廉價的純勞力

工作。他們一方面為德國經濟做出貢獻，但也成為失業率增加的原因之一，大多數歐洲人認為難民搶走他們的工作。

歐盟的「歐洲經濟展望報告」分析，歷來最大、從二〇一五年開始持續流入的難民潮，會對日後歐盟的經濟帶來正面效應。但英國人民不認同這項分析，他們因為歐盟分配難民收留所產生的就業紛爭，而決定退出歐盟。此外，二〇一六年七月德國慕尼黑發生購物中心恐攻事件，但首謀並非伊斯蘭極端主義份子，而是極右派種族主義者所為。德國人民因這群希特勒推崇者的舉動而大受打擊，梅克爾也下定決心要持續推動接納難民的政策。

我們再深入探討經濟和人口的關係吧。古典經濟學學者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的《人口論》是個令人憂鬱的經濟故事，但馬爾薩斯未曾料到人類伴隨工業革命而發展大躍進，他當時認為人口增加是妨礙經濟發展的主嫌。人口照等比級數自然增加，但糧食生產照等差級數增加，所以人類貧窮被稱為自然法則的結果。可是工業革命後，發生了馬爾薩斯未預料的生產增加，經濟學家這才意識到人口是引領購買力與生產的主要因素。人口成為了力量。

實際上，當經濟發展到某種程度之後，全球人口增加率變得還不錯，可是先進國家的經濟遭遇了新的問題。在全球人口增加的光景中，先進國家因低出生率與高齡化，財政負擔逐漸擴大；隨著醫學發達，人類平均壽命增加的高齡化現象，也導致年金與醫療費用的壓力備增。扶養老人亦成為負擔，尤其在缺乏有效對策處理快速浮現的高齡化現象下，世代之間的矛盾很可能惡化。越是先進的國家，在女性地位上升的同時，越容易出現不生孩子的低出生率問題。也就是說，比起馬爾薩斯的「人口增加的詛咒」，日後更有可能發生駭人的「人口減少的災難」。

## 更可怕的「人口減少之災」

日本的情形更可怕。一位住在大都市橫濱市中心壽町的長者自責地說，在低出生率的情況下，自己活那麼久是個罪過。「日本人口四分之一是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這樣怎麼可能不出問題？國家早已負債累累，又能去哪裡弄錢來餵活我們這些老傢伙呢？能過著這種程度的生活就要感謝了。我為了討生活都快走投無路了，若是又被孩子拋棄，逼不得已只好去犯罪。坐牢至少會給飯吃、要你運動，還有人陪伴你，所以我才去當小偷。」

即便日本老年層比韓國老年層的經濟狀況要好，卻也從很久以前就開始持續貧窮化。老人無論與家庭或地區社會的關係都漸趨疏離，以厭世的眼光看待未來。儘管獨自面臨死亡的「孤獨死」也很常見，但是犯下罪行而曾坐過牢的老人，相當多會在釋放後的五年內又再次被抓回監獄。日本某家研究機構曾提出警告，一千餘個村落在三十年後會缺乏最佳生育年齡的女子，再加上人口預計會減少四千兩百萬名，將導致日本的總人口數由目前逼近一億三千萬名，降至八千五百萬名。該機構也預估日本的地方自治團體有一半會因為人口減少，而可能在二〇四〇年左右消失。

韓國又是如何呢？韓國因為出生率極低，被稱為會是地球上最先消失的國家。有人說，若是現在人口趨勢持續下去，二七五〇年人口會變成「零」，大韓民國就此消失。那麼，試著來比較看看小學六年級和一年級的人口，再看看那畢業於首爾大學、吃著便當準備就業考試的年輕人所流下的眼淚。

如果你覺得這個例子太極端，我們把假設再放寬一點。如果日後韓國實施單身稅，國民年金保費增加，可是退休後可領到的錢卻減少，連領取年金的年齡也往後延。財政會惡化，大多數的福利政策中斷，各種基礎建設因為缺錢維護而變得破舊，被棄置的鄉下住宅增加。這樣還不可怕嗎？最近年輕的一代，有些人認為不生小孩可以減少支出，能藉此安穩享受自己人生的道路。當沒有孩子哭鬧聲、寂寥冷清的生活場景化為真實，在我們面前上演之時，少了人口的「國家」其意義又何在？

## 人口增加是現代經濟成長的基石

企管學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曾經批評人類最大的革命就是「減少人口的革命」，你可以數數看日本因發生這種人口革命而失去了多少歲月。杜拉克表示日本社會因人口減少，使得社會變得難以發展、極度不安，並告誡全球正逐漸日本化；低出生率、高齡化的壓力，也逼向了人口結構中的中年齡層。請試著站在沒生孩子、中年五十歲世代的角度來看，扣除占了人口一半的退休人士與年幼孩子之後，剩下的人口皆必須工作。我也討厭去想像部份人士宣揚「讓機器人來取代」的意見。工作人口減少代表稅金減少，與國家財政惡化、購買能力下降、經濟社會動力低下有直接影響，最終會導致國力惡化。

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西蒙·顧志耐，站在與馬爾薩斯相反的立場看待人口。顧志耐因在人口理論導入了G D P的概念而聞名，但是「顧志耐周期」——人口變動會以固定的周期影響經濟成長率——使他更加聲名大噪。如果讀過顧志耐的書，你會感受到其中散發著「進步派的香氣」；他希望藉由人口增加和革新，使國家更加繁榮。他主張人口增加在現代經濟之中不會阻擋經濟成長，反而能促進經濟成長；人口越多，革新的可能性越大。顧志耐認為人口繼續增加，當至少每人生產從三十年持續增加到四十年以上時，有可能達到現代化經濟成長。

顧志耐的主張若要成立，在人口增加的同時，人均G D P也要增加，如果G D P增加速度遜色於人口增加速度是不行的，所以，掀起生產技術改革的技術進步對顧志耐來說很重要。他覺得人口規模越大，技術創新的可能性越大，其結果是人均G D P也會增加，人口增加到G D P可扶養的程度。

曾有人說左右經濟的海浪不是景氣海浪，而是人口海浪。根據這個主張，經濟電梯因為工作年齡人口減少所以下降，而政府無論如何都想拉抬經濟，於是進行生產增加或放寬貨幣、財政政策，但是政府



的努力看起來難以獲得很大的成效。看看日本或歐洲的例子，要阻擋經濟電梯下滑好像很困難。在出現「人口懸崖」一說之際，<sup>8</sup>學生人數減少，許多學校合併，老師聘用人數也大大縮小。試著來思考一下韓國的情況，人口數與學生減少的话，許多大學的學生數也會變得很少，那麼調整大學結構一事還會遠嗎？許多現職的大學教授怎麼辦？想成為大學教授的新血又該如何加入？文明發達，技術進步的程度驚人，但各國反而因人口不足變得不安。

儘管現在有時候會聽到人類尚未開化的言論，但我們也有過家家戶戶生下十名孩子養育的貧窮時期。當時孩子並非造就支出變高的對象，而是可以自己賺錢討生活的勞動資產。請試著想一下日後不斷與恐怖的孤獨戰鬥的後代子孫們。建立出一個孩子無法浪漫地接受幸福的社會，或許是我們所有人的錯。雖然我們無法責罵「因為養孩子要花很多錢，所以我不生小孩」這種合理的想法，但也因為這個因素，韓國社會顯然變得更黯淡。對孩子過度保護、令人厭煩的競爭、人人勾心鬥角，低出生率成為了宿命，這個情況猶如受到惡魔誘惑而背棄了顧志耐的信賴。兄弟姊妹們吵吵鬧鬧地聚在一起，聽著外面傳來「來買蕎麥蒟蒻」的叫賣聲，對著熱滾滾的烤地瓜邊吹邊吃，那個時期就算不怎麼富裕卻很幸福，真是令人懷念。

## 印度是下一個人口紅利國家

聯合國推測到了二〇五〇年，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佔了十六%。雖然在北美、北非、中東與亞洲的開發中國家，未滿十五歲的小孩人數會增加，但是其他地區會大大減少。另外，全球往後二十年間年輕族群規模會減少，而因為缺乏年輕人，所以會直接面臨勞動力與購買力下跌的雙重不利因素，真是令人惶恐。全球四十歲至六十五歲的人口，到二〇五〇年為止預計會增加二十一%，具備影響消費市場的絕對性，所以也出現「攻略富裕國家的中年人與老年人」這樣的主張。各大陸的人口變化趨勢都很依賴預計的人口流入、孕齡女子人數與生育率，未來年輕移民者預估會往北美、新加坡、澳洲等移動；孕齡女

子的情形是北美、中東及印度等亞洲開發中國家會增加，反之西歐、亞洲富裕國家、東歐、中國會減少。

印度是當前全球密切關注的國家。中國經濟發展開始變得緩慢，全球焦點轉移到印度。不久之前，印度的經濟成長率開始超越中國。雖然印度因為經濟水準和教育水準上升，導致女性生育率快速下降，但是人口依然看漲；增加的孕齡女子人數與下降的生育率相抵之後，預估印度人口仍會增加。中國總人口數在二〇一八年達到高峰後將會走下坡，到了二〇二四年，印度的人口有望超越中國。

全球主要企業也因此在最近陸續瞄準印度。蘋果公司發表要在印度設立技術開發中心，執行長提姆．庫克（Timothy D. Cook）認為往後十年印度是蘋果可以好好發展的重要市場。他的根據來自於人口紅利效應——當高出生率的農村經濟，轉換到低出生率的都市經濟的過程時，在生育率下降的初期，工作年齡人口比率會變高，扶養比變低、儲蓄率增加，也會促成經濟成長，這便是人口紅利效應。

現在十二億的印度人口中，有一半是二十五歲以下，平均年齡二十九歲，比中國的三十七歲少得多。印度要到二〇二五年年全體人口中的老人比重才會達到七．二％，那時他們才會開始邁入高齡化社會的初期。再加上印度與主要靠輸出的中國相反，他們追求內需為主的經濟成長，所以相對上外來的衝擊不大。未來印度內需市場將由一九九一年經濟改革後出生的世代們來引領，與父母世代不同的是，他們受過高等教育，會追求以消費為主的生活。

## 人口數會改變財富地圖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二〇一五／二〇一六年全球監測報告：人口變化時期的開發目標」報告中，警告著全球老化的趨勢，並勸誡各國接納難民移入。二〇五〇年全球的總人口中，低所得國家的人口所占比率預估會從現在的九％增加到十四％。這種情況下，《華爾街日報》估計從低所得國家移民到先進國家的隊伍將會連

綿不斷，也就是主張接納移民或收容難民的政策，將為低成長、經濟停滯的主要先進國家帶來新的成長動力。

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也推測從二〇二四年開始會開始出現勞動力不足的現象，並在二〇六〇年達到欠缺九百萬名勞動力的規模。世界銀行建議在東亞相對較先進的韓國與日本開放勞動市場，接受亞洲年輕的移民者。有人主張建立移民署，但也有諸如青年失業問題、外國勞工犯罪、朝鮮純血主義的反對聲浪。這時有一件事值得我們思考。假設有人很認真地提問，為什麼美國與日本在拉抬經濟的成效有所差異？如同大家所知，美國的拉抬經濟政策發揮了某種程度的效果，所以利率也上升了，但為何日本的拉抬經濟政策效果不佳呢？

雖然可能有許多的原因，但是日本有一位知名經濟學家正在從人口之中尋找原因。他說，如果工作年齡人口持續減少，拉抬經濟政策的效果終究有限，這就是日本通貨緊縮的真相。這是一個人口數會改變財富地圖的世界。

### 【理論提出者】

西蒙．顧志耐 Simon S. Kuznets, 1901.4～1985.7

他以有關國民所得理論和國民所得統計的實證分析，於一九七一年獲得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一九二六年取得博士學位。他以實證分析經濟成長，使得經濟、社會結構與發展經過的理論系統化。他強調設計正確經濟模型的重要性，並主張經濟模型必須包括了人口結構、技術、勞動品質、政府結構、貿易、市場等資訊。另外，他創立了可說明景氣循環變動與人口有密切關係的「顧志耐周期」（Kuznets Cycles），並因提出能解釋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間關係的「倒U曲線」（Inverted U Curve）而聞名。

---

8 人口懸崖是經濟學家哈利·鄧特二世（Harry S. Dent, Jr.）於《2014-2019 經濟大懸崖》（The Demographic Cliff）提出的理論，指「出生率下降」與「高齡化加劇」同時出現的現象。

## 04 賽局理論和囚徒困境

——我獨活則無一倖免

### 企業遊走各國只為避稅

政府會創造工作崗位，可是預算有限，所以很難創造出足夠的工作。無論是哪個國家，企業向來是就業的寶庫，就算中小企業也不例外，故「企業要成功，國家才能活」這句話堪稱真理。有很多人在談論企業的存在理由是什麼，但是嚴格來說，企業是追求利潤的經濟單位（Economic Entity）。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也曾向蘋果創辦人史帝夫．賈伯斯哭訴。為了增加美國國內的工作，歐巴馬期望賈伯斯有「愛國心」，請求蘋果把海外的工廠移回美國，但賈伯斯的回答是NO。就算是總統輕聲呼籲要愛國，也無法期待賈伯斯爽快地回答YES。在「融為一體的世界」上，如果他是一位追求利潤的企業執行長，他就不得不在意股東的利益或其他價值。

賈伯斯的回答是：「我們會以全球最棒的產品來回報全球的消費者。」技術水準沒有差距太大的話，產品價值應該要便宜才對。如果生產原料成本的人事費用偏高，企業一定會為了尋找更便宜的勞力而離開。

英國前總理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非常憎恨那些逗留在避稅港（Tax Haven）的企業，曾經強烈批評他們極力追求利潤的行為。可是他又主張，政府如果想要吸引外國人投資、促進創造工作，並且想在全球競爭中勝出的話，必須降低英國的法人稅。製藥公司輝瑞（Pfizer）是一家非常道地的美國企業，卻因為高額法人稅而試圖離開美國，最後發表有意與因肉毒桿菌聞名的愛爾蘭愛力根（Allergan）合併的聲明，成為二〇一五年最大、最受矚目的併購案

例。美國名目上的法人稅是三十五%，但愛爾蘭的法人稅率只有十五%，所以輝瑞將總公司搬到愛爾蘭的話，每年便可省下十億～二十億美元的法人稅。

接著，歐巴馬像是火氣快從髮尾冒出來似地，大力推動法規限制避稅行為。為了使企業合併無效化，即使要合併，當美國方面持有股份超過八十%以上時，無論總公司在何處都一樣視為美國公司，其結果是造成輝瑞與愛力根合併案告吹。諷刺的是，擁有可與國家抗衡力量的跨國企業與有錢的個人，一邊濫用著稅收協定來節稅（Treaty Shopping），一邊又到處探頭探腦找尋其他利益，這種行為可說是在炫耀著不斷上升的身價。

## 抑制有害的租稅競爭

面臨財政危機的歐洲國家考量到社會輿論關注著跨國企業的一舉一動，也為了確保國家稅收，而強行採取又名為「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EPS, Base Erosion & Profit Shifting）的行動計畫。這個由政府準備的應對方案，是為了杜絕跨國企業企圖減稅，於是在高稅率國家誇大自己的成本，再將公司移轉到低稅率國家的逃稅行為。經合組織基於G 2 0 峰會特別命令而制定出的這項計畫，可說是含著淚水呼籲各國不要進行只對跨國企業有利之「有害的租稅競爭」（Harmful Tax Competition），計畫中包含了日後各國法令或租稅必須納入的義務事項。

蘋果、Google、星巴克等跨國企業都曾濫用稅收協定節稅，現在也在歐洲進行與稅金相關的訴訟，令人非常期待跨國企業往後會怎麼對付B E P S這張新設下的法網。人們深深認為無論法網再怎麼細密，跨國企業一定想得出妙計逃脫。歐巴馬誓言要阻止逃稅的的意志，將會擴散到全世界。

資訊傳播科技企業因為多在虛擬世界工作，所以不太需要由石磚和砂漿建造的工廠。像是亞馬遜、eBay、PayPal等世界級企業的總公

司，都聚集在法人稅率低的盧森堡。例如某家企業如果把總公司設置在盧森堡，營運部設在法國的話，法國課稅當局便會損失稅源。這就像是喜歡在海外網站購物的人，雖然他們沒有親身去到盧森堡，卻等同於在當地刷卡、支付當地的消費稅。

實際上，蘋果在盧森堡設置了只有一個郵筒的超小辦公室為歐洲總公司（iTunes S.A.R.L）。而蘋果在手機零件生產或APP應用程式開發上與韓國廠商合作，為韓國貢獻了工作職位，至少這點足以堪慰。在全球化的時代下，雖然創新也很重要，但是若不以這樣的方式在稅金與原物料價格競爭中取得優勢，實在很難存活下去，接著就會在競爭中遭到淘汰，付不起員工薪水，最後終於破產並在業界消失。

## 甘於次好選項的納許均衡

我們假設周遭有幾間財務結構相似的加油站，如果其中一間加油站降價招攬客人，其他加油站也會採取相同方式應對。結果是，打折策略無效，有打折的加油站都沒有獲得利益。油價下滑，消費者福利變好，但是因為競爭者相互廝殺的「膽小鬼賽局」（The Game of Chicken），一部份加油站最終會倒閉。

我們再來看看出現在賽局理論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這理論說明了彼此合作的話，所有人都可以獲得最好的選擇；如果只追尋自己利益的話，不但自己受害，還會給對方招致最壞的結果。

有「你」和「我」兩個囚徒。某一天，兩人同時被警察當作一起犯罪案件的嫌疑人逮捕，警察這麼說：「從現在開始，你們倆會分開審問。如果兩人都坦承犯行，會求刑三年。但是只有一人承認、另一人否認的話，認罪的人可以被釋放，否認罪行的人將會被求處最重的無期徒刑。萬一兩人都不認罪，就算你們只犯過小錯我們也不會放過，求處三個月有期徒刑。」

這時兩人只要確信對方都不會認罪的話，彼此就可以獲得最好的結果，只被關三個月有期徒刑。但是兩個人分開審問的情況下，他們分別會這麼想——如果他背叛我、承認罪刑的話，怎麼辦？

那樣的話，自己會被處以無期徒刑，於是兩個囚徒皆承認犯行的可能性很高，這就是兩個囚徒所處的困境。我不是要討論如何逃避罪刑處罰，提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盡可能不掉入陷阱、招致非生產性結果」的經濟學賽局理論。

承認罪行、獲得減刑可視為次好的現實選擇。即使有「不承認罪行又最好的客觀選擇」，我們卻經常目擊到人們不得不面臨「承認罪行的次要選擇」現實。這在經濟學裡稱為「納許均衡」，是指在對方不改變策略下，我沒有選擇其他策略的理由。正因為沒有改變現在選擇的理由，所以狀態非常的均衡。

若是兩位囚徒事先見過面，約好不招供、堅定互信的話，就可以獲得最好的結果，但實際上承認罪行會是比較有利自己的情況。現實中還會發生許多更糟糕的情況，像是為了自己獨活而想害死對方，便把對方雞毛蒜皮的問題都告發出去。如果收到舉報的警官向兩位囚徒說你們都有罪，要將他們一起送入監獄的話，那就是預料外的最壞結果。比起因過度競爭而認罪、坐牢的情形，我們豈不是活在一個更殘酷又累人的世界呢？

「納許均衡」是美國數學家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翰．納許，在二十二歲時發表的博士論文中所使用的概念，電影《美麗境界》（A Beautiful Mind）正是根據他的傳記改編。納許頭腦很好，卻因為情感缺乏症而很難理解人類行為。即便如此，他把數學當作看世界、理解世界的工具使用，他身上散發著「現實人類的香氣」。在這個世界上，有時候比起最好的選擇，選擇次好的反而更好；理想與現實有落差所以更突顯出選擇次等的原因。有時我們不是因為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而無法選它，而是因為不可能達到最好的情形，或是它不現實，所以選擇了次等好的。



## 一起放棄金髮美女

在重視效率性的傳統經濟學裡，將「不減少其他人福利便無法增加自己福利」的狀況稱為「柏拉圖最適狀態」（Pareto Optimum）。如果要進行一場以所得公平分配為前提的經濟遊戲，柏拉圖最適狀態就是最理想的遊戲。囚徒困境中是兩個人不認罪的情形為最理想，可是實際上我們很容易做出次等選擇的納許均衡。想要獲得最適當的結果，必須有更堅韌的信任與團結，可是這並不容易達成。各方意見分歧，世界被力量差異懸殊的國家掌控，實在很難追求理想狀況。

在電影《美麗境界》裡，納許斷言：「亞當．斯密錯了！」

納許認為合作比競爭更能帶來好結果。但這是因為電影中的情節是處於一種壟斷狀態，而賽局理論是以與對方合作時可達到平衡為前提。如果競爭來提高效率是值得又可行的方式，賽局理論可能就未必正確了。

電影裡還出現了一名金髮美女，朋友們沈醉於她的美貌，為了擁有她而相互較量。這時納許這麼說：「請想一下她那很難追到的高標準，不如大家都放棄她吧！以次等的選擇來取代，才不會傷了彼此的和氣，去選擇她周遭實際可能成為情侶的女人吧！」他這段話非常現實——不要高攀追不起的美女，選擇簡單路線、追求她周遭的朋友，反而更容易實現。

但是有勇氣的傢伙，不是也有可能獲得美女的心嗎？對於深陷這種想法的人，納許應該會告誡他：「問題是這樣不夠節約呀！我們必須減少不必要的競爭與競爭中的超載情況！」

「我一個人過得好就行」的思維，在冷漠刻薄的現代社會之中蔓延，我們是否正朝著不均衡又糟糕的方向前進？納許就像是往我們後腦勺打一掌、指責著我們似的。

## 深陷囚徒困境的世界

回到法人稅的話題。在各國間的國際競爭體制中，很難期待對方國家經常配合或合作，各國考量情況後會只追求本國的利益。全球爭先恐後地實施放寬規定與吸引企業的政策，其結果與一九九〇年代全世界相比，國民所得中企業分到的利益比重（資本所得分配率）增加，勞工分到的利益比重（勞動所得分配率）呈減少趨勢。

經合組織針對這種情況從各種角度分析，並提出可關懷社會弱勢族群的包容性成長為解決方案。可是各國想要抑止這種「拚個你死我活」的競爭，於是向一部份名列避稅港的先進國家和開發中國家提出警告，說他們無法容忍有害的租稅競爭發生。有害租稅競爭是指各國為了盡量留下國際資本而相互競爭，使外國資本在本國賺到所得時能享有各種租稅優惠。

經合組織認為，政府利用有害租稅競爭能否取得一時的經濟利益還是未定之數，但是最終會造成嚴重稅收損失，妨礙了實質經濟的公平競爭，乃至發生避稅和逃稅行為。一旦某個國家降低了法人稅，其他國家也會依照納許均衡原理進行降稅競爭，因此不得不由經合組織這樣的國際機構來發號司令，判斷這種競爭是否有害，藉此維持全球經濟的秩序。

## 團結互信以追求共生

如果全韓國的家長都約定好不送孩子去補習，孩子也就不會因為補習過多而痛苦了，可是現實上很難達到這種共識，父母就是希望把自己孩子送進好的大學、找個好對象結婚、在好公司上班。要他們別這麼做，難道他們就真的會不要孩子上補習班嗎？比起這些，期望他們打破「一定要上補習班，孩子才能過著他們想要的生活」這樣的信仰好像會更快。要不然「課外補習禁止法」怎麼會被判定違憲呢？

「其他人都這麼做了，為了我家的孩子，我什麼都敢做！」這種想法使得大家都要孩子去補習，造成韓國人民全都心力交瘁。這在囚徒困境中會往糟糕的一方傾斜，只有獲得好結果的人能感受到些許安

慰。就個人立場來看，採取這種行為能獲得利益，但是社會整體會招致浪費資源的結果。像這樣個別立場上合理，整體來看卻是錯的現象，經濟學上稱為以偏概全的「合成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

為了阻止大企業進軍中小企業的領域，韓國制定了「指定中小企業適合行業」的方案。這方案曾廢止過，於再次實施後，其副作用也遭到一部份的人指責。秉持著要讓大企業和中小企業一起走下去的信念而設立的「同伴成長委員會」，也成立了一段時間，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引導出業界內部的團結。

企業必須要有「相互激勵才能在競爭劇烈的時代共存」的思維。中小企業活下來，相關勞工的薪資才會上漲，消費者全體購買能力也會增加，如此一來大企業也能存活。大小企業都該稟持信念，相信可以透過合理的決策，建立所需之公正透明的業界系統，使彼此能夠相生共存。在降低生產成本的競爭之中，這才是能讓企業從囚徒困境中脫身的道路。當企業員工的薪資呈僵固性，而一部份大企業的高階主管卻領著高薪，或是工會過度爭取成員薪資時，將會引發青年就業困難。以新、舊世代需要共生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重視就業與薪資問題。

同樣的理論亦可套用在政府。如果各國為了出口競爭力而發動誘使本國貨幣走跌的「匯率戰爭」，全球貿易說不定會萎縮，導致景氣持續低迷。政府必須意識到這是不考量財政、只增加國債的囚徒困境，這種刺激選票的民粹政策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這一切像毛線球般糾纏在一起，讓世界變得複雜。約翰．納許強調人們要觀察象徵團結的企鵝，人們都聽到了他這充滿號召力的聲音。我們必須用擁抱的力量，建立一個彼此互信的世界。我們還要選擇往破壞平衡的方向走去嗎？

### 【理論提出者】

約翰．納許 John F. Nash, 1928.6～2015.5

他自一九五〇年代開始以數學方式解析賽局理論，功勞備受肯定，於一九九四年與匈牙利裔美籍經濟學家約翰．海薩尼（John Charles Harsanyi）、德國數學家萊因哈德．澤爾騰（Reinhard Selten）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有著複雜利害關係的競爭者之中，他確立了產生競爭的賽局理論之數學原理。他聞名天下的「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理論可解釋競爭對手間的威脅，以及相應的權力較勁關係。儘管理論也有極限，不過企業策略家們正廣泛運用賽局理論。

# Chapter3

## 經濟與倫理的關係



Economy & Ethics

# 01 交易成本理論

## ——良心企業會變得富有

### 企業越大越有效率嗎？

占了韓國企業整體九十九%的中小企業，發著牢騷說生意難做，並視很會賺錢又不把錢拿出來的大企業有著「樂夫的心眼」。9最近看似許多大企業間出現不安的徵兆，他們同樣面臨著瓶頸，但這段期間大企業其實也做了很多壞心眼的樂夫行為。我們來聽聽看發展得稍微成功的大企業對此如何辯解。

「全球景氣好的話，我們會拿未分配盈餘去投資，也會用在研究開發。但是全球景氣長期不佳，我們有必要留下現金啊！像韓國這樣對經營權保障措施有限的國家裡，企業的未分配盈餘是對付海外企業獵人惡意收購的保險。外資持有股份總額超過五十%的情形很常見，我們容易面臨惡意收購，所以保留現金以備機動性回購自家公司股票是最好的防禦方法。」

所以呢？對於投資新興產業研發（如電動汽車、生物科技、物聯網、智慧型汽車等）的企業，政府正積極地給予租稅優惠。一般人將中小企業視為「興夫」，認為他們是需要受到保護與培養的對象。儘管中小企業提供了八十八%的就業機會，還是被大企業的損人利己行為壓迫，無法揚眉吐氣，一般人大概也是因此才會產生如此的情緒，使得「九九八八」（韓國企業九十九%是中小企業，全體勞工的八十八%任職於中小企業）成為象徵中小企業的詞彙。

其中，有一位經濟學家認為東西要大才有效率，他充滿「男子漢心胸寬大」的氣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利佛．威廉森擁護大企業，主張大企業才是最有效率的企業組織形式。對於覺得大企業有如「樂夫」的韓國人而言，他說這種話會被人扔石頭。

為了理解他的主張，我以汽車公司來舉例。市場裡有無數家與某家汽車公司一起工作的合作廠商。這家汽車公司為了製造完整的汽車，需接受完善的零件供給，必須與合作廠商形成良好的交易關係。如果這家公司心存疑慮，他可能會買下整個零件廠商，編入自己的集團。在市場上，生產者也會基於這種原因而買下原物料廠商，或因為不信任流通網路而買下流通廠商。企業為了防備未來的不確定性而做出的這些措施，被稱為「垂直整合」。

當大企業因為信不過合作廠商而進行垂直整合，這在效率層面來看是去除不確定性的方法，因此威廉森不會將之視為大企業橫行，可是我們周遭不難看到大企業的霸道。假設有一家中小企業只向一家大企業提供產品，這在市場上稱為大企業的「買方獨占」。大企業若是惡意利用這點，毫無理由地壓低供貨價格的話，只跟單一對象交易的中小企業別無他法只能吞下去。我們當然需要對大企業加以規範，威廉森也認同大企業像這樣濫用力量壟斷時，有必要控管這種行為，但是他覺得限制大企業規模是不好的。

他依照自己主張的根據，提出與買方獨占相反狀況的賣方獨占。如果壟斷供給的中小企業強硬地要求調漲供貨價格，大企業會面臨必須提高產品價格的危險。一旦這種事反覆出現，大企業為了消除不確定性與降低成本，反而會乾脆決定收購合作廠商，這將成為併購中小企業的最大誘因。

## 合理交易才能維持競爭力

關心中小企業的人，看到這裡應該會討厭威廉森。如果不是垂直整合，大企業又會與合作廠商定位成什麼樣的關係呢？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間的關係，可能是脅迫、溫和或信賴，其中威廉森主張信賴關係才是最可取的。他舉了豐田汽車做為正面的例子：

「豐田汽車的重點合作廠商們長期與豐田汽車交易。這些廠商為了強化做為零件廠商的力量，會從豐田汽車直接學習其技術。技術分



成一般常用技術與核心技術，大企業應該要積極將核心技術交給外包廠商，這才是正確的作法。豐田汽車做到了，他們讓中小企業也擁有技術能力，可以自力更生地做生意。最後豐田汽車成為培育中小企業的關鍵角色。」

「為了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共生，信賴是最重要的。」威廉森這句話意味深長，可是現實中無法做到的例子極多。威廉森是這麼批判做出像福特、通用汽車那種行為的大企業：

「過去像福特與通用這樣的汽車公司，一貫採用高壓的姿態對待中小企業，導致弱化了自身的企業競爭力，他們必須為此反省。美國的汽車公司會一敗塗地，正是因為習慣對合作廠商採高壓姿態。大企業信心滿滿，不惜負債也急於收購中小企業以壯大自己，這堪稱是揭開了不幸的序幕。」

威廉森主張，經由成功進行垂直整合，以及在大企業與合作廠商之間進行合理交易而減少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這些措施會決定企業的成敗。他也指出韓國的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不該建立壓迫性的契約關係，而應以信賴為基礎來締約，長期來看才會更有效率。

## 中小企業同樣會壓迫人民

在追尋各自利潤的市場中，不可能實際去規範、侷限企業之間的合作。這就像是某知名比薩連鎖店經銷商對加盟店的壓迫一樣，10企業的蠻橫行為與矛盾持續進行。原本發展順利的造船公司一旦遇到景氣不佳，便會斷然進行結構調整，也造就日後他們的公司方向仍處在迷霧之中。

有家位於慶尚南道的造船大企業，其首要合作廠商的老闆燒炭自殺了，遺書中血淚表白著他悲痛的心情。「領取施工費用的日子快到了，我好害怕錢沒進來，這種生活已經是第三年了。沒錢實在不行，

但就是因為沒有錢，現在我再也做不下去了。還有，請幫我好好照顧員工，盡量別讓他們有損失。」

他應該要責怪轉包的大企業舉止蠻橫，但因為造船業界處境困難，他也無法斥責大企業什麼。造船大企業為了盡可能不出現大規模赤字，而把赤字推給下游業者；下游業者為了自救，紛紛對職員們的薪資動刀。其中，請問在勞動市場裡過度保護正職員工的大企業公會，或是大企業的經營團隊，真的有負起責任嗎？

社會大眾批判大企業不透明的經營結構，或是富二代、富三代等世襲經營方式，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大企業說他們沒有違法，卻以相當旁門左道的方式集中與濫用自己的經濟力，使得政府當局不得不拿刀抵著他們。那些人利用小股份串連眾多企業，然後經營著財閥集團，這對於出國旅遊一次都是作夢的國民來說心情並不舒坦。在景氣展望不佳又難以避免結構調整的情況下，減縮人力會威脅到勞工，甚至大企業的新進員工也會成為犧牲品，這種現實令人悲痛。

韓國有家出口家電的企業Moneual公司，惡意利用政府推出的「隱形冠軍」（意指潛力很強的中小企業）培育政策，造假自家公司的輸出額高達兩兆韓元，害得金融機構遭受數千億龐大損失。這個事件是怎麼回事呢？他們是以窗飾手法（Window Dressing）設立子公司DigiTech Systems來欺騙銀行，<sup>11</sup>藉此詐取他們正常來說不可能獲准的巨額貸款；承辦的公營銀行職員也因為收取賄賂而被以貪污嫌疑羈押。

企業狡猾地惡意利用政府補助金或政策的金融案例多得很，這種中小企業和一部份居心不良的公家負責人，一看到政府預算便失心瘋了。我們應該將大企業視為厚顏無恥的樂夫，中小企業則是善良的興夫嗎？這種看法令人質疑。在迫使人民屈服這方面，中小企業也不亞於大企業，他們同樣可能是比「故意弄傷燕子的樂夫」更狠毒的存在。

## 罹患彼得潘症候群的企業

在網路時代也適用威廉森的理論嗎？有人主張企業只要集中核心力量，剩下的交給外包廠商，這樣在節省交易成本層面上反而更好。我們來聽聽擁護網路市場有降低成本效果的立場。

「大企業垂直整合並掌控價值鏈的作法已經落伍了，現在興起由消費者主導的新興價值鏈。消費者從設計商品與服務、製造（創造）到販賣（供給）都能自行處理，不再需要經過中間階段。經濟變得不繁瑣，儉樸的經濟製造出數億美金的價值與數百萬個職位。依靠大企業龐大的研發預算與封閉的組織結構而維持的大量生產模型，現在很難滿足講究成本、生態的消費者需求。」

透過電腦與網路，我們可以快速連結全世界，將業務外包到海外已不是幻想。由網路連結起來的網路市場裡，有足夠資質、可替代的供給者或合作伙伴是要多少有多少。雖然每個行業各有差異，但是人們漸漸發覺在網路市場交易明顯可降低交易成本。當然另一方面，大型 I T 企業同時會出現規模超大化現象。

現在我們再試著深入探討一下對於「企業最大化」的贊成與反對意見吧！

如果企業資產規模擴大，算是好事嗎？韓國政府發表了「大企業集團認定標準」現況，問題是做為大企業認定標準的資產額，並不會反映出經濟規模增加的時代背景。Kakao和Celltrion這兩家公司被指定為新的大企業集團那一天，金融市場並未將之視為利多條件。這是因為當一家企業被指定為大企業集團時，子公司間禁止相互投資、新循環出資、[12](#)保證債務，被限制行使所屬金融機構、保險公司的決議權，也要課以許多法定稅務。

無論如此，當公司被指定成大企業，會被追加、套用上無數的法令與規範。全國經濟人聯合會主張那種規範會成為經濟成長的腳鐐，

應該把資產標準提高到十兆韓元才對。而政府為了反映當下情況，總是煩惱著該調高到哪個點才好。

為了逃避規範，有些公司選擇不發動併購以避免被認定為大企業集團，或是在擴張事業上消極以對。與其擴張事業不如安於現狀的這種情形，正是陷入所謂的「彼得潘症候群」——美國心理學家丹·凱利（Dan Kiley）將這種為了逃避扛下沉重的責任感，即便成為大人之後，也還想只當個孩子的心理，定義為「彼得潘症候群」。這是大企業獨有的問題嗎？許久以前就有人主張中小企業也有彼得潘症候群，這是指成長為大企業的中小企業懷念著有保護柵欄的時期，於是再度回到中小企業模式，反而成為在培育強而有力、足以面對全球競爭的中小型企業隱形冠軍路上的阻礙。

## 德國——隱形冠軍眾多的強國

隱形冠軍強國的德國又是如何呢？在歐債危機時，德國企業的銷售額與營業利益率依然逐漸上升，成績持續看好。他們根據「生產力等於薪資」的等式，調高勞工的薪資，接連擴展了人民消費能力，這過程中隱形冠軍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隱形冠軍不是指大企業，而是指潛力很強的中小企業。德國的隱形冠軍與韓國的隱形冠軍不同，規模更大，從創業階段開始便在推進全球化策略。德國有許多家庭型長壽企業，與企業規模無關，一旦繼承後只要繼續經營七年，並維持一定標準的聘用與事業資產的話，便可獲得一百%稅額減免優惠（二〇一四年十二月被判定一部份違憲）。

在德國他們不會把繼承家業當作財富的傳承，而是看作為企業的延續性。他們相信繼承企業可維持企業競爭力、創造工作，確實繳交稅金為國家經濟貢獻。德國除了中小企業培育政策外，並沒有按照企業規模大小而給予不同待遇的政策；有些人主張韓國也需要努力減少企業規模越大、障礙越是增加的狀況。「大企業集團認定制度」是在國外難得一見、韓國特有的「抑制經濟力集中的制度」。

「中小企業指定合適行業制度」所帶來的正反意見爭論也是同樣的道理。有人站在認為需要保護適合中小企業的行業，並必須阻擋大企業侵犯到那些行業的立場，也有人主張這樣中小企業將安於現況、終究會變成彼得潘的立場。這兩種立場的論述將會持續不休。

## 大小企業互信共生是時代潮流

韓國通常對大企業沒什麼好感，人們視之為蠻橫資方的主體；反之，德國幾乎沒有這樣的認知。德國在一九九〇年兩德統一後成功地達成社會整合。與擁有兩百多年工業化歷史的德國不同，韓國只在半個世紀裡便體驗到超高速成長，其中的經濟成長過程是以大企業為重，中小企業自然會落在後頭，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間的不公平交易行為亦非昨日今朝之事。

一些人主張要對這些共同成長課題達成協議，並制定可促進這些的法案或制度，包括決定大企業與中小企間公正供貨單價等利益分配制度。他們批評大企業習於蠻橫地降低採購單價，以及奪取中小企業的技術，「自律性共同成長政策」這種制度像是在做利益分配，實際效用不大。有人則提議與其採用那種可能違憲的制度，不如依照自律協約展開共同策略。在全球化的時代，企業如果缺乏競爭力，人民、國家也很難存在。隨著大企業為了節省原物料成本進軍海外而產生的國內產業空洞化，還要發生到何時？

與過往不同，韓國以「中小企業→中堅企業→大企業」成長的案例正在減少。大部份中小企業安於現況，韓國大企業若想一躍成為跨國企業，就需要有與中小企業共同成長的策略。全球競爭版圖正從企業間競爭轉變成企業網路間的競爭，所以更迫切需要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共生。威廉森強調削減交易成本是為了追求效率，他也認同沒有比「企業家的創新」更有效率的事情了。當今低成長結構逐漸成為常態，我們必須在企業網路相生的辦法上尋找新興又創新的突破口，像是塑造業界積極分擔風險的氛圍、帶來刺激好奇心的教育機會、追求技術創新與研發合作，以及產品設計、生產、販賣的分工合作等。我



們必須要相信這麼做會給彼此帶來利益。這種培養人們創造出那樣價值能力的「創造成果型」合作，可以誘導出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以信賴為基礎的共生成果。

全球超一流企業微軟維持著比自家公司規模還大一百倍以上的業界。比爾·蓋茲（Bill Gates）坦誠地說，比起反壟斷法，他更害怕某個人的創新技術可能會在某天早上就破壞了Windows帝國。為了讓業界盡可能有效率地運轉、持續創新，他投資了天文數字般的財富加以支援。凱因斯說過，比起思考新想法，脫離舊想法才是真正困難之處。現在就從過去的舊式思維脫身，將威廉森說的信賴當作基礎，以共同的力量來創造新的價值吧！請試著想像一下興夫與樂天彼此講著「哥哥先、弟弟先」，而一起割開葫蘆、共享成果的景象。企業界現在應該要順應時代潮流，離開充滿疑心的世界，目前正是企業界需重拾信用、重新出發的重要時期。

### 【理論提出者】

奧利佛·威廉森 Oliver E. Williamson, 1932.9～

他因從交易成本觀點研究企業誕生與成長上做出貢獻，於二〇〇九年與伊莉諾·歐斯壯（Elinor Ostrom）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關注著「不完全競爭市場」（Im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導致的交易成本，並展開了大企業是最有效率的企業理論。即便我們需要制約大企業，威廉森還是主張人為的區分或限制規模並不可取。他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後，在史丹佛大學完成了MBA學程，最後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

9 《興夫與樂夫》為韓國傳統民間故事。在父親過世後，勢利的哥哥（樂夫）獨占家產，把弟弟（興夫）一家趕出家門。某天興夫救了一隻受傷的燕子，燕子為了報答而送興夫一粒種子，最後種出一顆很大的葫蘆，割開後裡面是滿滿的黃金。聽到消息的樂夫很是嫉妒，於是故意弄傷一隻燕子再救活牠，並要求燕子送他種子。樂夫種出葫蘆後，割開卻是妖怪冒出來；妖怪們打傷樂夫，並把他的家

產全搶光。受傷又沒錢沒房的樂夫很是傷心，興夫看了就趕緊把哥哥接回自家住，兩人和好。

10 這裡是指經銷商對加盟店提出許多不合理要求，如任意提高加盟店每月支付的管理費用、收取高額行銷費用等，導致加盟店聯手向公平會檢舉。二〇一七年，韓國公平會判定該經銷商違法。

11 窗飾為公司在編製財務報告時，運用會計準則所允許的判斷來美化報告的會計手法，從而誤導一些利益相關者對公司財報的理解。

12 循環出資為在一個集團裡，A集團出資B集團，B集團出資給C集團，C集團出資A集團，集團內的子公司相互出資與持有股份的作法。藉由資金的內部流動能製造漂亮的帳面數字，又能確保對眾多子公司的經營權。



## 02 目標導向式投資

### ——數學天才的投資夢

#### 聰明人也會不理性投資

人類多半喜歡錢，天才瘋狂於賺錢一事更是常見；越是年輕，瘋狂追逐錢財的傾向就越濃厚。只要嘗到一次成功的滋味，任誰都很難抵抗它香甜的誘惑。英國物理學家艾薩克·牛頓（Issac Newton）有樁出名的軼事，他在一七二〇年代投入股票投資，曾一時取得龐大的獲利，於是他增加了投資規模。但是炒到最後，他連本錢都賠光了。

經歷到破產的牛頓，在股市留下了這句名言：「我能計算天體的運行，卻無法計算到（跳入股市的）人類的瘋狂。」（I can calculate the movement of the stars, but not the madness of men）

牛頓購買的股票，就是被評為股市史上三大泡沫之一的英國南海公司。他反覆買了又賣之後，喪失了接近九十%的財產，約合兩萬英鎊。南海公司是從英國政府手中獲得西印度群島與南美地區獨家貿易權的公司，如果在新大陸發現龐大金銀財寶的話，就可以賺大錢；也因為人們這種期待心理，造成投資股市熱潮。

曾被認為最理性、最科學的牛頓，果然也只不過是一位會在股市裡向不理性行為屈服的弱小人類。處理完買來的股票之後，即便有獲利，只要那支股票持續上漲，心裡就會焦慮不安，人類就是這樣。如果聽到別人獲得好幾倍的利益，相較下獲得較少利益的自己會嫉妒對方。不只是自己的財富增加，當然也包括想賺走別人的錢，這種想持續撰寫成功神話正是不理性人類的心理。可是當接近名為毀滅的泥沼時，人類會驚恐不已、捶打胸膛，這便是人類可憐的自畫像。認為

「我是那例外的」人類傲慢，促使人類寫下無數的「不幸的股市投資歷史」。

有些人很會賺錢，是因為他比其他人聰明嗎？假設有人因為比其他人聰明，所以發明了可用機率解釋現實的數學模型，若他還產生「市場也能像數學公式一樣被準確地預測」這種傲慢想法的話，那他會變得怎樣呢？

## 過度槓桿會瞬間破產

勞勃．默頓在十幾歲時是股票投資狂。在他攻讀理工博士學位後，比起唸書他更喜歡觀察股票資訊牆，於是他轉到經濟系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他修改了當時做為股票選擇權評價模型代表的布萊克－休斯模型（Black-Scholes Model），創造出流行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評價模型。華爾街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多不勝數，投資銀行有一陣子獲得了天文數字般的盈利。完成博士課程的默頓把自己的名字加上去，建立了布萊克－休斯－默頓模型，對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成長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麥倫．休斯（Myron S. Scholes）與費雪．布萊克（Fischer S. Black）一同開發了可測量股票選擇權與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價值的「布萊克－休斯模型」，麥倫．休斯因其功勞於一九九七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布萊克則在一九九五年因癌症世逝，依照死後不得授予諾貝爾獎的傳統，遺憾地無法獲獎。取而代之，是由與休斯一起創建避險基金、「十幾歲時曾是股市投資狂」的默頓共同獲獎。

默頓建立了聚集當代天才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LTCM），並獲得了很大的利益。他注意到三十年期的新發行公債，與先前發行、還有二十九年六個月才到期的公債之間，存在非常細微的利率差異；亦即流動性高、人氣佳的新發行債權，會比已發行債權的利率要低，債權價格也較貴。他看到這種情形後，便使用高達三十倍的財務槓桿進行價差交易，彷彿用提高獲利的

無風險價差交易技法（套利，arbitrage）就好像可以獲得全世界一樣。喜悅卻是暫時的，神向意氣洋洋的他射出詛咒之箭。市場不穩定與變動性增加，長期資本管理公司曾被稱作天才避險基金，但這下子高報酬率派對結束了。他們瞬間破產，默頓個人投資的資產與一生累積而來的名聲全都飛了。

我們必須從這兩起例子中看出什麼呢？衍生性金融產品是靠時間存活的，每一秒都喜悲交加。人類可以準確地判斷出那一秒嗎？或許時間是在警告人類，下一秒的反轉會顯露出人類的無知。「不可僅因為過去不曾發生過，就斷定那種危險不會發生在未來」是一句很單純的真理。投資的世界裡，風險的最大來源是時間。時間經常會讓人付出比起那東西價值更大的代價。就算是被評價細微的風險，只要財務槓桿變高，便會遭遇巨大的損失。如果是繼續持有低風險現貨的話倒還好，但是有時效性、借太多錢買來的商品就會被迫賣掉。無論是在經濟或是人生裡，我們必須重視會促使「時效性與借錢」發生的風險因素並徹底管理。

## 先設定目標才規劃投資計畫

「為了獲得更高的報酬率，再大的風險也必須承擔下來。如果想要爬上更高的山，就必須做好承受更大痛苦的準備。」

以上是我們認為最基本的投資原則。你不可能既是厭惡承擔風險，又期望獲得更多的報酬。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天才，在搞砸自己建立的投資公司毀之後，他從人生中領悟到了什麼嗎？

投資老手默頓的新關注事項是財務設計。他相信透過「目標導向式投資」（Goal-based Investing）可以管理風險，也可以製造出穩定的現金流動。他強調現在不可以絕對地信奉理論與模型，堅稱模型不過是為了解釋這世界現象的道具；對他來說，模型只是投資的參考事項而已。體驗過失敗後的天才，看世界的眼光確實變了。商品的報酬率再好，也無法保障過去優良的報酬率會持續下去。即便是經常往

返同條航線的飛機，根據機長的能力與判斷，可能會是平安之旅，也可能成為一趟不幸之旅。購買基金的時候，既存的模範案例也只能當成參考而已。

如果問人們認為高齡化時代的最大危險因素是什麼，大家可能會回答：「在不健康的狀態下，沒有錢還活很久。」許多人想要長壽，但若是擁有的財產不多，想法又會不一樣，反而害怕自己活太久，所以規畫退休金很重要。如果向身經百戰的默頓請教如何規劃退休金，他大概會這麼說：

「有效率管理投資的基本法則是建立正確的目標，這就是『目標導向式投資』的概念。以退休金為例，管理個人資產的金融公司像是我們的退休金一樣，讓我們累積著一定的財富。更準確來說，最好的目標是退休之後提高固定收入，維持一定的現金流動。目標如何訂定也會左右投資。假設現在年所得是六千萬韓元，退休後希望所得是現在的七十%，那麼退休後需要的年金是每年四千二百萬韓元。如果國民年金或個人年金只能填補一部分金額，剩下的缺額就必須透過投資來解決。你現在就可以決定該為了那個目標存多少錢，以及又要增加多少風險資產（股市）的投資比重。」

設立最低的保守目標，並為此而儲蓄與投資，這就是默頓的說明。對於日常生活繁忙的我們來說，他的說法可能聽起來很空洞，卻是正確的事情。他也補充，如果你已達成退休後所期待的目標所得，就該減少以股票為主的各種風險投資，只投資安全資產，因為準備退休金是為了維持退休的生活水準，不需要追加風險。他還這麼說：

「存款不夠的話，就該運用當下持有的房屋等資產。現在的所得，比未來把房子等資產傳給孩子更重要。如果你能夠把所持的房產流動化，藉此每個月獲得現金的話，就應該要積極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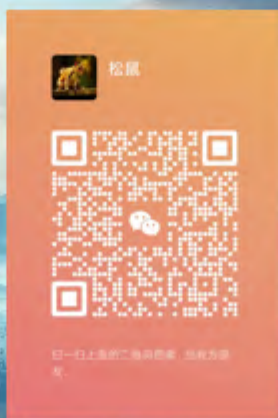
## 現金在手比傳家的房屋更重要



## 松鼠信息精选付费社群福利

1. 社群每日持续分享副业、自媒体、引流、网赚、认知提升、成长等干货内容。  
超十余家同行资料汇总，物超所值，全网最全。
2. 每月**120+**篇精选付费文章分享。
3. 每月**200+**本经典书籍分享。  
包括各类高分好书，及很多未正式出版的网络绝学。
4. 现进群即赠送往期分享过的书籍和付费资料。
5. 社群遵循商品交换原则，有偿服务。  
进群后还可将一个名额赠送给朋友。
6. 人与人认知上最大的竞争，是信息输入量的竞争。  
松鼠信息精选群每日输出有价值的信息，提高信息含金量，提升信息能量密度，取精华、去糟粕，为大家节约时间，你的**10分钟=我的3小时**。

欢迎添加松鼠微信进付费社群：



(备注：信息)



我們可以很正確地瞭解到，個人的財務設計之中，最有用的資訊是自己現在的所得金額、預想自己何時要退休、自己期待的目標所得是多少、為此該存多少錢等等。以這些為基礎，自己必須決定要多儲蓄，還是要降低目標所得。運用反向房屋抵押貸款（Reverse Mortgage）也是個很好的方法。<sup>13</sup>積極讚賞這種制度的默頓，當他面對即便是一個小房間也想傳給子女的韓國父母的心情，他又是怎麼說呢？

「這世上許多人很缺錢，因而把錢當作可以購買物品的工具。在韓國，不管你再怎麼省，也必須支付醫療費用或發紅白包。你也很難向已另組家庭的子女們伸手要錢，我能理解這是因為孩子們為了討生活也都快喘不過氣來了。但是你能傳給孩子的不是房子，而是你的平安。比起留棟房子給孩子，我認為你健康又幸福地生活，才是對孩子來說最大的禮物。這正是目標導向式投資的價值。」

韓國政府推出的活化住宅年金對策「我家年金三項方案」，<sup>14</sup>是為了銀髮族而準備的金融商品。實行上是以住宅為擔保品，向政府借錢來償還家庭債務（最多可領取七成），剩下的錢（三成）則是從指定年齡開始領取的年金。當房價上升時，日後償還完住宅年金後可以向政府收取差額，但是房價下跌時，年金也不會因此減少。如果有人向政府房屋抵押貸款，卻為了償還貸款而想要再賣掉房子，這時若是採用住宅年金商品，亦可加強居住安全和提早做好退休生活計畫。

過去不動產急漲的時期，人們會因為對市價差額的期待而置產。在這不斷上升的不動產市場裡，如果還有人覺得很難賺取市價差額的話，加入這種商品也是不錯的選擇。

默頓進一步強調成熟投資者應有的態度：「人們要設定退休後的目標收入，規劃符合個人的退休計畫，那麼自然會區分出安全資產與風險資產。當人生發生重大變化，隨之調整適合的目標，改變相稱的投資計畫就行。獲得自己想要的退休所得方法只有三個：工作久一點、多存一點錢、多承擔風險。」

## 活越久越要管理投資風險

股票投資會使人陷入不理性狀態。股票上漲的話，大家都被周遭玩股票的群集本能（Herd Instinct）給捲入，踏入了股市。處理掉自己的股票，股價卻持續上漲的話，自己便會後悔太早賣掉、損失了莫大利益。若是周遭人獲得大量財富，自己就會羨慕得目瞪口呆，不知不覺變得心生妒恨，忍不住再次跳入股市，想要一口氣挽回這段期間錯失的利益，甚至因為這種欲望去借錢。之後爆發泡沫化，股價大幅下跌，卻固執著要等待股價回升到過去的水準，無法輕易虧本拋售；真正放手賣掉之時，股價下跌階段已經快結束了。若想在股市投資成功，最重要的是節制自己的欲望，建立屬於自己的投資原則。

我們試著將勞勃．默頓的「目標導向式投資」原則各別套用在個人、政府和企業上吧？個人的話，可以透過年金儲蓄或國民年金、確定給付制年金，持續增加所得。但是國家或企業因為高齡化或低利率，不易運用資產，所以保障本金或維持確定給付制年金實際上是很困難的事。

年金改革成為全世界的話題，芝加哥市因為年金負擔如雪球般越滾越大，面臨了破產危機。隨著年金改革失敗，芝加哥市因信用評等下滑成為「垃圾城市」（Junk City），金庫裡沒有錢了，正背負著數百億美金的天文數字般負債。因年金赤字（約芝加哥市預算的三分之一）而財政破產之後，芝加哥市雖然馬上推出公務員年金結構改革案的苦肉計，但伊利諾州最高法院判定此案違憲，看來除了大量裁減公務員之外別無辦法了。由於年金給付負擔沉重，教育的核心機能也受到威脅，許多學校都關門了。小學的運動校隊補助金遭到刪減，為了省下校車費用，小學的上課時間延後四十五分鐘。隨著許多老師被解雇，每一班的學生人數也不得不大幅增加。

企業的退休年金又如何呢？默頓強調因為低利率，所以企業的退休年金運用實效不可能會很好，所以確定給付制很難持續下去。確定給付制這種退休年金制度，是勞工退休時可以按雇主事先承諾的方式

領到退休金。企業將每年負擔的費用堆積在金融機構，並由企業管理與負責；不論年金管理結果，勞工都可領取定額的退休金。

至於雇主與勞工共同負擔費用、並由勞工監控的確定提撥制，因為管理人是勞工，所以除去稅制優惠，管理與責任都由勞工承擔。確定給付制度如果管理得當，可以減少業主的負擔，但是在最近的低利率時代管理年金並不輕鬆。勞勃．默頓分析過去十年間的狀況，判斷退休年金從確定給付制變成確定提撥制是全球的趨勢，這是因為高齡化與低利率，企業難以負擔保障勞工退休後的生活。

如果公司的執行長比起經營企業的風險，更害怕年金造成的風險，這就是問題了。退休之後，勞工與管理階層、國家與國民，對於「制度的延續性」的想法可能會不一樣，「遵守約定」的立場與「不可能持續下去」的立場間會產生矛盾。以平均壽命六、七十幾歲來設計的年金制度，有可能在一百歲時還維持下去嗎？如果低利率成為常態，問題就更大了，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禁止販賣保障本息的年金商品。現代醫學發達，需要更多退休資金，為了不想窮困地度過下半輩子，現在必須馬上進行「目標導向式投資」。

### 【理論提出者】

勞勃．默頓 Robert C. Merton, 1944.7～

一九六六年在哥倫比亞大學主修數學，之後在加州理工學院取得科學碩士學位。一九七〇年在麻省理工學院轉修經濟學，並獲得博士學位。他是美國的經濟學家兼金融專家，運用了「布萊克－休斯模型」，與史丹佛大學的麥倫．休斯教授共同開發了測量衍生性金融商品價值的公式，促使全球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急速成長；因其功勞，於一九九七年與休斯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默頓總是思考如何把數學套用在金融上，他就讀麻省理工學院時的指導教授，正是美國首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保羅．薩姆爾遜。



13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為一種較特別的貸款形式。借款者以自己的住家為抵押品，金融機構則通常以按月給付的方式貸出款項。貸款期間借款者不必還錢，只有當借款者過世或出售抵押品時才需要還款。

14 三項方案分別為：包括房屋抵押貸款償還型住宅年金、固定利率抵押貸款預約住宅年金、優待型住宅年金。

## 03 非理性衝動

### ——貪婪與恐怖如何撼動經濟

#### 停下來時才看得到「泡沫」

油價可怕的上漲趨勢會消失在歷史之中嗎？低油價已成為全球經濟的「風險因素」，因為這樣會導致產油國的購買力縮減，所以石油需求減少，交易量也萎縮。不過，一想到幾年前因為油價衝得老高的而生活辛苦的時期，真是恍如隔世。像是鮭魚逆流而上，我們的時光也倒流了！

二〇〇三年九月之後的五年間，油價過度上升、爆漲了五倍多之後，導致了通貨膨脹，誘發經濟停滯，這些事在二〇〇八年一整年時常上演。該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主席表示，因受到利比亞威脅減產，夏天每桶油價恐會上升到一百七十美元；甚至有人說這是石油輸出國組織和投機商人聯手，導致油價持續上升的「第三次石油危機」。當時美國議會提案限制期貨市場的投機交易法，國會議員們卻忙於計算這會影響多少選票。一方面有人主張過度侷限期貨違反效率市場原理，將使資本外逃到其他國家。另一方面則有人主張，高油價成為低所得層與中產階級的痛苦源頭，卻餵飽了投機商人的肚子，而「強化規範」能迎頭痛擊這個問題。

與當時原油市場的需求增加速度相比，供給能力完全跟不上。而最重要的是，各種條件皆有利於油價上漲，所以期貨市場裡押上漲那一方的勢力，期待油價會止不住地高速奔馳。這就像是幾顆鬱金香球根的總價就足夠買房的時期，不停上漲的油價曾是「必須停下來才看得到的泡沫」。

一九九六，大家都預期股價會持續上升，促使人人也都無計畫地跳入股市。美國前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說「股市陷入了非理性繁榮」。他以簡潔的話使熱鬧的證券市場沉睡了。當時他是這麼演說：

「當非理性繁榮不當地使資產價值上升的時候，我們要怎麼知道？非理性繁榮可能招來長期不景氣，就像過去十年間日本經歷景氣蕭條那樣。」

還有，他也補充了必須警戒資產市場的非理性繁榮。

「像我們這些在中央銀行上班的人們，有責任不讓崩潰的資產價格泡沫化，威脅到生產、就業與物價穩定。」

中央銀行有責任穩定物價與金融。在葛林斯潘發表這番極為妥當的言詞之後，同一天各國的股市神經質地回應——日本（負三．二％）、香港（負二．九％）、德國（負四％）、英國（負四％）、美國（負二．三％）的股價一致下滑。他那天會不會在自家吐了吐舌頭，被裝滿的啤酒杯泡泡沾滿了嘴唇？雖然我不太記得那時候的股價下滑事件，但是以後每當證券市場顯得過熱時，「非理性繁榮」這句話便像是記憶的習作一樣來找我們。<sup>15</sup>

在科技股泡沫帶動下似乎能夠無止境地上升的那斯達克指數，二〇〇三年三月十日的指數是五一三二．五二點後，四月十四日卻跌至三三二一．二九點，三十五日內就掉了三十五％。金融大海嘯時期道瓊指數不斷下跌，跌破七千大關，但到了二〇一五、二〇一六年指數就回升到历史新高。股價就是這種時而不斷上升，時而不斷下跌的妖物。

不知是不是從葛林斯潘那裡得到的靈感，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羅伯特．席勒教授復活了「非理性繁榮」這句話，並當成自己著作的書名。他在這本書裡分析美國人民如何非理性地貸款、飛蛾般地撲進不動產市場。事先預料到二〇〇〇年初期的網際網路泡沫、二〇〇八

年次級房貸風暴的席勒，在二〇一五年撰寫了文章「債券市場有多可怕？」（How Scary is the Bond Market?），提到美國的債券價值過高與崩潰的可能性。

他運用冠上自己名號的指數「凱斯席勒房價指數」（Case-Shiller Housing Price Index）來精密分析不動產市場，它是可看出美國房貸市場動向的代表性經濟指標之一，於一九八〇年代由席勒與衛斯理學院的卡爾·凱斯（Karl E. Case）教授，在和信用評等機構標準普爾合作下共同創造，這個指數可以週期性地了解美國主要都市的住宅價格變化。從這個指數就能看出席勒在經濟學界聲譽卓著。

## 泡沫化是「心理傳染病」

任何人都很難正確測量資產價值大於內在價值很多的泡沫化。像是不動產的情形，我們以「房價所得比」（Price and Income Ratio, PIR）做為判斷是否為泡沫化的比較指標好了。這時如果拿像是該地區人口密度等其他指標放在一起比較，我們對是否泡沫化的判斷也會隨之改變——即便房價所得比一樣，人口密度不同時，也很難標準地判斷出泡沫化。在不動產方面扮演位置財（Positional Good）角色的大都市紐約、倫敦、巴黎，[16](#)若是這些地方的高級公寓價值高，我們只以房價所得比來判斷就不正確了。因此，有人主張因為基於人類對數量有限商品的需求，所以一流都市的高價住宅需求與景氣無關。另外，出現高所得人士爽快付錢買下高價房屋等行為時，我們也很難只根據房價所得比判斷不動產泡沫化。

席勒把泡沫化比喻成「心理型傳染病」，這是指人們拋開合理性、根據「傳聞」來購買資產的傾向很深。他也注意到雖然人們不管怎樣都想避開泡沫化，泡沫化卻還是反覆出現——一六三六年的鬱金香熱、一九二九年經濟大恐慌的股市泡沫化、二〇〇八年掀翻華爾街的不動產泡沫化都是例子。

我們為什麼會頻繁地體驗到資產價值的上升與下跌呢？試著以席勒的角度來談談吧！有些人有多餘的錢卻找不到地方投資，但是席勒並未忽視對各個層面的觀察，他認為「思想的傳染」對資產市場的價值變動有很重要的影響。當流傳著某人因價格上升而獲利的消息時，該消息傳遞的模式與病毒散播很像。口耳相傳引發各式各樣的蔓延，促進價格更往上升；沒有參與市場投資的人會感受到相對剝奪感。到最後，大家都不理性地投入其中，市場變得過熱、價格爆增。

從經濟大恐慌與其他類似歷史上的教訓得知，人們要等到泡沫真正破裂之時，才會意識到泡沫化。而一旦從對未來過度樂觀轉變成過度悲觀，貪欲會不知不覺地被恐怖蠶食，市場陷入恐慌。「啊，我真該早點收手的」，貸款投資的散戶懊悔地急忙逃跑，有些人因此走上房奴的艱辛之路，有些人則批判政府助長個人盲目地進行信用交易，要政府也負起責任。

在家庭負債傳出達到史上最高的警訊之後，政府開始準備應對家庭負債的策略。未來凡是人民要借錢，都必須盡可能符合自己的還款能力，並從借錢的時候就開始還錢，這是韓國政府為了防止負債觸發系統性風險而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包括必須維持固定利率和分期償還為主的貸款結構，也要持續考量以擔保為主的借款者之還債能力。

二〇一六年初，因為美國利率調漲、中國經濟成長緩慢、油價下跌和新興國家經濟衰退、日本採取負利率政策等因素，全球股市跌得很可怕。有人說這不是「非理性繁榮」，而是「非理性恐怖」。考慮到中國經濟成長緩慢且金融系統欠缺效率，賭人民幣價值下跌的投機商人與中國政府進行了一場勝負之爭。在此同時，也有投資者購入變便宜的中國股票；他們不在意人民幣價值的變動，而是因為預測日後人民幣全球化、中國經濟的長期成長可能性而投資。究竟誰的作法正確還有待觀察。

## 經濟面的非理性「動物本能」

二〇一三年，尤金．法馬（Eugene F. Fama）、拉爾斯．韓森（Lars Peter Hansen）、羅伯特．席勒開發研究債權、股票、不動產市場的趨勢，立下很大的功勞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以「非合理市場參與者」為前提上，席勒與強調市場合理性、傳統芝加哥學派的法馬或韓森有所差異，他們和席勒是彼此站在對立面的學者。經濟學與數學或科學不同，沒有能夠以適用於全部狀況的單一理論。

法馬的「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相信市場有效率、擁有自我調整能力。人們會考量到市場的供需做出合理行為，並尋求市場的均衡，這是效率市場假說的核心。但所謂「資本市場的價值會根據現有資訊充份、即時地反應出來，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獲取暴利」這種主張是否正確還有待商榷，人們總是喜歡探聽別人不知道的內線消息或密報並藉此獲利。無論如此，根據法馬所想，市場因為能夠反映過去情報、公開資訊、內部消息等所有資訊，所以不需要政府加以規範。依照他的意思，資本市場裡形成的價格是最能反映出資訊的適當金額。市場資訊想藏也藏不住，一切都會反映在價格上。

相反的，席勒強調防止市場泡沫化的重要性。他說，根據周期性發生泡沫化的事實來看，市場是不理性的，他主張因不理性群集本能而導致價格過度上升的投機現象，必須由政府加以規範。席勒表示當貪婪壓蓋恐懼時，便會產生非理性的泡沫化，而逐漸膨脹的心理恐懼大過頭時，可能會把全球經濟導向停滯不前的局面。

例如，他認為人們過度看待中國的問題了。中國經濟雖然是美國的主要關注對象，但是許多人過度評價中國的狀況。他判斷如果人們心理上沒有對中國經濟成長緩慢感到過度害怕，這便不會是個很嚴重的問題。但是，他強調若要針對協助不實企業延長壽命的政策、中國國營企業過多進行改善，比起人為的政府介入與管制，更應該盡可能鼓吹企業自發性為經濟注入活力。席勒的妻子是心理學教授，他是因此受到影響嗎？他強烈傾向套用人類心理學來看待經濟現象，並依照這種方式進行經濟診斷、預測未來。

我們應該站在法馬這一邊，或是席勒那一邊呢？席勒重視股票、不動產等資產價格受政治、社會、心理等多樣因素影響的非理性「動物本能」。他主張如果只依賴市場指標，就絕對無法預測到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大海嘯，這句話也隱含著動物本能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理性的經濟因素，必須好好調和才能正確地觀察與管理經濟。我們必須銘記在心，只依靠看不見的手，最後貪婪會招致破滅與危機；若是政府過度介入，又會發生另一個失敗與無效率。

## 是長期停滯或者過度恐懼？

經濟發展順利時，人們會因為自信心過剩而變得大膽；超過自己能力地使用資金槓桿，志得意滿認為什麼都做得得到，也絕對不會想到自己可能會失敗。但是最近的狀況是怎麼回事呢？席勒認為，是「心理恐懼」把世界經濟逼到停滯不前的局面。他對「長期停滯」這個詞彙抱持負面意見，並且反對中國經濟成長緩慢、歐洲金融不穩定帶來經濟長期停滯這樣的主張。人們茫然地對這種恐懼產生共鳴，才是逼世界經濟不安、讓消費者關上錢包、使企業的再投資萎縮，導致陷入惡性循環的主因。他不認為現在處於景氣停滯狀況，並且主張與動物本能相通的自信心在景氣循環中可發揮重要的角色。

景氣好的時候，人們因強烈地相信會成功而本能地投資，因此資產價格會變高，呈現上升趨勢。相反的，景氣不好的時候，人們容易陷入悲觀與恐懼。這種情形時，貨幣政策會到達極限。席勒拒絕使用「長期停滯」一詞，是因為他考量到美國就業或企業投資相關指標顯示出經濟正要脫離長期停滯、回到正常軌道，帶有正能量。當恐懼主導著情勢，經濟主體不會乖乖聽話，就算降低利率（甚至是負利率）也沒用。儘管可以輕易借到錢，投資卻沒有跟著增加，所以席勒強調「心理」的主張反倒是更有說服力。

根據他的說法，經濟停滯終歸來自於心理因素。他認為如果看衰長期經濟的恐懼抑制了企業投資，擴大流動性的政策會產生很大的負作用，我們反而需要優先地實施能樂觀看待經濟的政策。這是一個引

人關注的主張——廢除阻擋企業家精神的規範，喚起企業家的動物本能，為經濟帶來活力。我們必須把他說過的話放在心裡。日本人民因持續二十年的通貨緊縮而陷入厭世主義的心理，席勒向安倍總理提出動物本能可刺激日本人心的方案。他認為需要使人民武裝起動物的本能，日本才能再次站起來。

## 正能量是成長的動力

我們為什麼必須關注席勒這些多少帶有非經濟性「心理」因素的主張呢？二〇〇六年美國不動產市場出現過熱現象時，他就持續發出「房價會下跌」的警告。但是低收入戶、低信用戶認為不動產投資是他們唯一可能成為富翁的道路，所以不可能把他說的話放在心上。之後吹起一股金融借貸潮，物價一上漲，政府也提高利率。這麼一來，投機客漸漸收回投資，最後住宅價格下跌，其衝擊自然轉到了老百姓身上。房價一跌，便大量發生賣了房子仍還不清債務的情形。人們償還了幾年的貸款，但這時銀行說要把還錢方式從固定利率改成浮動利率，那麼老百姓會因為利率上升而導致償還款項暴增、蒙受損失，逾期滯納金一再追加，最後不得不破產。

我們生活的現實之中混雜著主觀與客觀，因為同時存在著悲觀者和樂觀者，所以世界總是能發出各式各樣的聲音。身處困難時期，我有時候會感受到過去某首流行歌曲歌詞之中的涵義：「天下無難事，只要努力的話，太陽升起的那天會再回來。」正如這句歌詞，雖然不能只靠努力，但是我們要試著反問自己是否過度陷入感性的厭世主義和客觀的悲觀主義。

儘管有些人爭辯中產階層的生活越來越辛苦，高所得層則是越來越豐足，但這就是世界的現象，也是事實。全球的中產階層彷彿電影《亂世佳人》女主角費雯麗的腰一樣，漸漸越來越細。青年們很難找到符合眼光的工作，他們因為內心充滿委屈而哭泣。但我想相信即便如此，只要有越多人正面地看待世界，世界可能會變得很正向。即使



現實不簡單，可以連內心也變得脆弱嗎？如果相信努力比天生的能力更能改變命運的年輕人變多，經濟成長的動力也會變大。

年輕世代們應該要擁有希望與熱情，我最怕的就是他們說著「沒有希望」，然後畫地自限。懷抱著負面的心理，很容易誕生負面的預言。因為受到負面預言的影響，導致原本可能不會發生的現象真的按照預言發生，這豈不是一場悲劇呢？當社會整體充滿了負能量，可能會發生席勒所謂的「自我應驗悲劇預言」，所以讓社會整體吹起一股正能量一事更顯重要。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東西，可是有許多人擁抱值得被愛的自己。試著與其他人一起默默地走著自己想要走上的道路吧，人生只有一次，這種活法不是更有價值嗎？

### 【理論提出者】

羅伯特．席勒 Robert J. Shiller, 1946.3～

於二〇一三年與尤金．法馬、拉爾斯．韓森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名列康乃狄克大學評選的「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百位經濟學家」。席勒在密西根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唸書，並完成賓大華頓商學院課程，現於耶魯大學擔任教授；他是取代古典經濟學基本前提「理性人類」觀念，以實際人類行為模式為基礎的行為經濟學大師。他在二〇〇〇年出版的《非理性繁榮》警告美國房貸市場的泡沫化，成為世界級暢銷書。他還首創了計算美國主要大都市房價的「凱斯席勒房價指數」。

---

15 「記憶的習作」同時是韓國名曲，歌詞中提到記憶儘管早已遺失卻重新找上門來。

16 位置財是指會影響消費者在某一社會環境中之相對地位的消費商品，帶有炫示效益。

## 04 損失規避傾向

### ——利益的喜悅比不上損失的痛苦

#### 我的損失為何感覺特別嚴重

「到了週末習慣地約見面，想著這是為了彼此而做的慈善工作。有時候也會避開彼此的注視和別人見面，自然地也會有想要找藉口分手的時候啊！如果找到初次見面的那感覺、那心動，我們現在就不會感到厭煩了呀！」<sup>17</sup>

這是曾經很有人氣的一首歌的歌詞。為什麼我們跟交往很久的戀人分手之後，會感覺非常空虛呢？感受到情侶間的越趨疏遠，小誤會成了分手的起因。若是因為這樣而馬上分手的話，生活中少了戀人的空虛感會不斷被放大，甚至讓人從晚上哭到天亮。而相親一百次的男人在結婚前夕，卻盤算著這期間錯過的女性是不是更好，這樣後悔著又有何用呢？總之我們活在這世上，當和某人分手或是失去某人時，會大大地感到失落。可是，有些人在與戀人分手後，抱持著以後會遇到比現在更好的人的期待感，這表示著他們對未來會遇見的戀人賦予了更大的價值。

分手的故事到此為止，我們來討論現在價值與未來價值，並試著瞭解人類的損失規避心理與失落感吧！

美國在一九八〇年代經歷了二十％等級的驚人高利率時期。那時若在銀行存入十五美元，在一個月後、一年後、十年後分別會得到多少呢？如果是十年後，加上本金、利息和風險溢酬，大概可以拿到一百美元左右。最近人們因低利率而失去投資目標、不知所措，他們要是聽到這件事的話，有可能火氣都要從頭頂冒出來了。但即便利息是正數，任何人都會判定現在手中的一百元比未來領到一百元更有價

值。在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的不確定情況下，人類理所當然會傾向於躲避危險。

人類傾向把現在的價值看得更重，這說明了人類進化的過程。狩獵和採集的原始時代執著於可以馬上吃的東西，人類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如此奮鬥。我說人類傾向更為看重當下的價值，並不是指人類不會去思考如何在未來過著更好的生活。利率高的時候，人類為了「未來」會不捨地放棄「現在」的快樂，還會享受儲蓄的快樂。現在已到中年齡層的父母們壓抑著當下的購物衝動，為了未來而理性地計算財務，也會準備屬於自己的房子。不管怎樣，因為未來的價值充滿不確定性，並非能馬上握在手中的東西，所以人類傾向把未來價值評價得比現在價值低，這說明了人類討厭具有不確定性的東西、藉此規避損失（Loss Aversion）的傾向。

人類的損失規避傾向不限於現在與未來相比的時間問題上。例如，有個輪盤遊戲的規則是失去一百美元的機率與得到一百美元的機率不相上下，人們通常會不太願意參與這種遊戲。行為經濟學家丹尼爾·康納曼認為人們不願參加是因為，即便是同樣金額，比起利益他們會有放大評價損失的傾向。他說，比起獲得的東西，人們對於失去的東西會做出二倍到二．五左右的敏感反應。這是不是因為，對於利益的喜悅，像是小口小口地吃著珍惜的美味餅乾，想要多品嚐一下那個味道；失落的悲傷則是像一口把苦藥吞下，想快點忘記呢？

如同生活家事繁忙的主婦感覺新品打折活動很少辦，菜籃裡的東西卻好像頻繁漲價似的。即便官方的消費者物價上升率跌到谷底，為什麼主婦們還是感覺物價在上漲呢？這是「平均的陷阱」。就算國際油價下跌會大大影響物價穩定度，沒有汽車的家庭便感覺不到油價變便宜；自己主要消費的產品物價上升比率，卻會感受得到。

來聽看看政府當局的說法。「消費者比起價格下跌，對於價格上升會敏感二倍。消費者物價通常是與前一年比較來計算上升率，可是消費者傾向與物價最便宜的時期做比較。」

對於傳統經濟學認為人類是理性的、會依照預期效用做出理性選擇的主張，康納曼表達了反對。他認為人類是感性、善變的，是非常受到他人與周遭環境影響的不完美存在。在看到人類比起利益的喜悅，更強烈地感受到因損失而痛苦的心理時，會覺得他的話也有道理。

接著來看一個有點不同的例子。上班族偏好薪資隨著時間流逝上升。假設你工作二十年所拿到的總薪資為定額，照著錢的時間價值來看，上班初期就領高薪，會比之後領高薪更好，這是一個可提高更多投資利潤的理性選擇。那麼，假設有一家公司初期給高額薪水，可是會越給越少，這樣人們會滿足嗎？並不會。時間越是過去，人們越不能承受薪資逐漸減少。因為比起理性的判斷，情緒助長的失落感會更強，所以我們會感受到好像有東西被搶走的空虛感。人類不會想到自己先拿走的利益，只會想到薪資減少，令人懷疑是否真的能說人類有理性。

## 人類既感性又善變

康納曼主張我們損失一萬韓元的痛苦，比檢到一萬韓元的喜悅更大。當我們遺失用慣的東西，會感覺到在實際購買價格之上的失落感，這是因為那段期間已用出感情來，所以稱這種產生損失規避傾向為「稟賦效果」（Endowment Effect）。所有物的價值越高，我們恐懼與逃避損失的傾向就越大。有個實驗結果顯示，同樣的東西人們在賣它的時候，價格會比購買時來得更貴。

投資大師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第一原則是「不要賠錢」，而第二原則是「永遠不要忘記第一條」。投資股票最基本又確實的方法，是區分出經營狀態不穩或是結構正在惡化的企業。過往績效並不保障未來的投資報酬率，可是若你持有過去表現良好但如今危險因素眾多的股票，你可能會更難降低虧損，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儘管股價下跌，人們也會基於對所有物執著的「稟賦效果」而不願虧本出售。

人類的情緒並非隨著自己財產的絕對價值而產生。例如甲的金融資產從二千萬韓元減少到一千八百萬韓元，而乙的金融資產從一千萬韓元增加到一千一百萬韓元，雖然絕對金額上是甲多，但是乙更感到幸福，因為資產總額甲是變低、乙則是變高。人類對利益或損失的變化幅度很敏感，像是自己持有的公寓價值從四億韓元上升到五億韓元的人，會比從三十億韓元上升到三十一億韓元的人更感受到上升許多，從這點就可以看得出來。康納曼視「損失規避傾向」、「敏感反應」、「標準相異」為人類重要的三大傾向。

人類比起獲利更對損失感到敏感的事實，也可以從使用信用卡與現金的差異之中說明。假設某加油站老闆向支付現金的客人收取一公升九百八十韓元，向刷卡客人收取一公升一千韓元。當然這麼做是不行的，但是消費者經常遇到這種用現金付款就能獲得打折的事。這時消費者不使用現金付款的話，會覺得自己蒙受損失。刷卡可以之後再付錢，若考量到利息因素，其實不管是使用現金或刷卡都一樣，可是我們會覺得支付現金有折扣。如果兩者價值相同，比起利益我們會對損失更敏感。

## 限量版很貴也要買的原因

在利率為正的時候，未來所領到的一百元，其現在價值會比一百元來得低，這稱為「折現率」。我們試著來進行與折現率相反的實驗。當未來價值比現在價值評價更高的時候，對於「與喜歡的電影演員接吻」和「令人不快的電擊」，人們是如何看待這時間的價值呢？接吻與電擊兩件事各別能延期到多久呢？受試者對於延後與電影演員接吻一事，最多能忍到現在起的三天後；相反的，電擊則是想要延期到很久很久以後。這裡的接吻與電擊分別代表利益與損失，當要延期到未來的時候，我們會提高它的價值。

一般人們碰上心情好的事情，都會想要把它放著一段時間，多感受其中喜悅；反之，我們會想要盡可能地躲避恐懼。比起現在價值，我們更看重具有不確定性的未來價值，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我們

對未來有所期待，或是把焦慮賦予了更大的意義。我們不會急著現在購買新產品，若是對未來價值的不確定性減少，推延購買的可能性會更高。假如隨時都可以得到想要的東西，我們便無法感受到必須現在馬上做出選擇的需要。

我們會啟動這樣的心理：「再等一下的話，就會出現性能更好、擁有新機能的汽車或智慧手機。忍一下再買吧！現在買的話，反而會過時嘛！」

iPhone新品發表會誘發了人們購買的欲望，許多消費者不自覺地被自己的期待感欺騙。新產品上市時，反而需求會急速下降、價格也跟著下降的現象就是這麼來的。電影或電視劇的預告，是為了提高看到正式播出前的期待感而製作；企業也會以擴大未來價值的方案來推出限量版，這是利用消費者「不買、不看的話就損失了」心理的行銷策略。

畫家梵谷在寫給朋友安東．凡．拉帕德（Anthon van Rappard）的信中，他極力稱讚輝柏牌（Faber-Castell）色鉛筆的優秀品質。除了梵谷以外，歌德、赫曼．赫賽、鈞特．葛拉斯等許多文藝家都熱愛這種鉛筆。創建於一七六一年的輝柏是德國的代表企業，目前已傳到了第八代。他們為了防止圓形鉛筆滾動而把鉛筆設計成六角形，現在來聽聽如此有創意的他們對於限量版的看法。

「輝柏瞄準成人消費者，所以把有收藏價值的高價產品製作成限量版，也能提升品牌價值。為了紀念創立二百四十週年，所以用樹齡二百四十年的橄欖樹製作鋼筆，並以此為起點，每年只挑選一種產品用手工製成，且只在該年進行銷售。我們期望消費者是『一試成永遠』的客戶。從第一次拿起色鉛筆學習塗色的孩子，到成為想使用名牌文具又挑剔的成人消費者為止，陪伴他們成長正是我們的成長策略。」

絕對伏特加（ABSOLUT）公司也與知名藝術家合作推出限量版產品。因為很難買到，所以人們把這種產品視為藝術作品，想著未來若

有機會一定要買到手。

## 不願接受損失的希臘財政

透過希臘債務危機事件，我們瞭解到國家怎麼會陷於財政困境，以及人們會因此受到多大的痛苦。如果國家或企業都沒有防患於未然的話，情況會越趨惡化。

一九九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孟代爾（Robert A. Mundell）教授主張，整合貨幣後所獲的利益比起放棄貨幣主權後產生的費用更大時，會促使該地區的國家們使用統一貨幣。他說為了使用統一貨幣，各國之間的金融市場要好好整合，經濟政策要密切合作，勞工、資產等生產要件的移動要更自由。可是，貨幣統一的歐元區卻出現了希臘的衰敗。歐元區整合以後，不動產價值急速上升所以形成泡沫化，又因為經濟動盪不安而急速下滑，再加上財政危機導致國債爆發，人民過得很委屈。一位住在雅典的貧窮父親必須把孩子送養，年幼少女則為了買漢堡吃而賣春。

希臘政府為了因應財政危機而推動撙節方案，但人民強烈反彈，因為該方案包含了縮減年金、基本工資與公家單位裁員，所以希臘人民馬上感受到了損失。不接受撙節案的話，我們可以預想希臘會無法領到援助資金，陷入債務違約危機，使得國家整體的損失更加擴大，可是國民投票結果顯示了「我不想失去現在享有的優惠或工作」的強烈損失規避傾向。雖然有報導顯示幸虧物價變便宜使得觀光客增加，國家財政稍微好轉，但是希臘青年們依然承受著痛苦。我想這有可能是因為希臘醉心於經濟整合帶來的利益，又因損失規避的心理因素造成喪失產業競爭力的結果。

某位希臘年輕人的話令人心痛。「希臘是充滿觀光客的美麗國家，但是美麗不能餵活我們。希望幻滅，連個支撐我的梯子都沒有，這要我怎麼去愛國呢？我沒有錢、也沒有工作，在希臘看不到任何未來，所以我為了養活父母而放棄念大學。我的朋友們唸個學士七、八



年才畢業，卻沒有工作可做。我要去挪威，我弟弟在法國，朋友們則正在德國、英國生活。不過只要國家變好的話，我會回來的。都唸了那麼多書，卻沒辦法上大學，真的太可惜了，不是嗎？」

希臘政府的組織比起其他國家來得大，但即便被指責財政管理散漫，也沒有縮減政府的規模。為了降低公部門支出，大多數公務員理當接受結構調整，但這樣會導致選舉時大量流失票源。到最後，政治人物的損失規避行為也助長了國家危機。

## 結構調整一定會有人受害

在韓國，企業的結構調整也持續引發爭論。為了進一步提振產業競爭力，結構調整是不得不經歷的成長痛苦。在可能造成許多人失業的情況中，大股東為了迴避損失而賣掉股份的行為，必定會遭受世人唾罵。像是造船、海運業，企業因損失規避而持續拖延、不進行結構調整，反而會招致更大的損失。在不穩定的時代下，產業結構調整是一種常態。它可以按照市場原理的原則進行，但當政府介入的時候，企業能以L T E級神速處理產業結構，加強對外的競爭力，所以結構調整的結果必須要獲得L T E（Long-Term Evolution，長期演進技術）效果。

連假開車出門會塞車，我開的這條車道都沒在動，隔壁車道卻好像一直在動；如果馬上變換車道，原本開的車道卻又一直前進。想快一點到達目的地，於是在壅塞的道路上不斷變換車道，這是許多人都有過的駕駛經驗。我超越的車輛很快就消失於視野，但是超越我的車輛卻會留在我的視野很久。當你被後方來車超越的時候，感受到失落也沒關係，但我們該忘記這些，試著讓路給別人吧！重要的是不要像為了搶票而毀了國家的政客一樣狡猾，我們不能為了不想讓自己有所損失，而做出損害別人的惡行。結構調整一定會有人蒙受損失，透過平靜對話與說服來達成共識，才是減少損失的正道。

假如你現在想到了一個很棒的想法，可以降低公司十萬美元的支出。這個想法要如何傳達給市場，讓他們能馬上接受呢？考量到人類的損失規避傾向，比起說「不這麼做的話，每年會損失十萬美金」，說服他們「這麼做每年可減少十萬美金的支出」不是更能引發共鳴嗎？當薪資帳戶因支出而空蕩蕩時，千萬不要被利用你損失規避傾向的行銷手法欺騙。這是康納曼教給我們的說服技術，也是生活的態度。

康納曼提到了兩個自我：「經驗的我」和「記憶的我」。經驗的我是指自己體驗一件事物時，感覺到自我的瞬間；這個「我」會享受現在發生的快樂事情，會想逃避痛苦或難受。「記憶的我」則是回想、評價過去經驗，並與日後的記憶連結。兩個自我的判斷多半不會一致，通常預測未來和做出決策是由記憶的我來完成。過去所蒙受的損失似乎讓人很難受，但如果它能在日後成為有意義的記憶，這難道不是成功的人生嗎？不只是「記憶的我」，也利用經歷並有所感受的「經驗的我」，透過這個「我」以各個角度分析世上萬事，把損失降到最低，這樣便能成為人生的智慧。

### 【理論提出者】

丹尼爾．康納曼 Daniel Kahneman, 1934.3～

他是以色列籍的心理學家兼經濟學家，二〇〇二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與阿莫斯．特維斯基（Amos Tversky）一起研究人類的判斷與決策，並在一九七九年發表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他們研究人類建立於刻板印象的思考與偏見之後，主張雖然人類並非全都不理性，但他們認為假設人類是理性的「預測效用理論」（Expected Utility Theory）是不現實的理論，否定傳統經濟學主張人類是理性的概念整體，開啟了研究人類不理性行為的學問，揭開行為經濟學的序幕。他說人類有兩種自我，分別是經驗的我、記憶的我，透過此研究的快樂經濟學也是他的功績。

17 本段歌詞來自一九九二年的韓國歌〈交往很久的戀人〉，由015B樂團演唱。

## 05 釣愚經濟理論

### ——中古車買貴的原因

#### 真實市場充斥著欺瞞與騙術

有位高中生在網路上販賣中古商品進行詐欺，一個多月便從一百三十多人身上騙到約三千萬韓元，因此被警察逮捕羈押。許多經濟理論都假設市場會完全反應資訊，但是真實市場裡面卻有許多像這樣的欺瞞與騙術。效率市場假說、適應性預期假說與理性預期假說，皆是假設有效又完美的資訊對稱之理論。仔細觀察我們生活所在的市場，便會懷疑重視市場效率性的芝加哥學派學說是否為真。

在資訊爆炸的網路市場中，彼此擁有的資訊卻存在差異的這點，依舊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之一。看看靠資訊吃飯的谷歌和雅虎的龐大收入吧！如果你知道兩家公司的市價總額，是美國全航空公司市價總額的好幾倍，便能更體會到「資訊即為金錢」、「市場不會完全反應資訊」的主張了。

現在充斥著巧妙地欺騙他人，詐取個人資訊騙術的網路釣魚（Phishing），這是個人資訊（Private Data）和釣魚（Fishing）的合成詞，遭受網路釣魚的受害者被稱為新「傻瓜」（Phool）。上當受騙的傻瓜有兩種，一種是資訊不足而被騙的「資訊傻瓜」，另一種是心理容易受到刺激、動搖的「心理傻瓜」。網路釣魚不只是指金融詐騙，舉凡在經濟、政治等人類活動所有領域進行欺瞞與騙術，藉此獲取個人利益的行為皆涵蓋其中。

走進菜市場，你會感受到濃濃的人情味。賣豆芽菜的阿姨會再多抓一些豆芽菜給老顧客，熱情的熟客多給賣蕨菜的老奶奶一些錢，要她拿去給孫女買糖吃。鄉下市場雖然本質上是賣東西的地方，卻也是分享人情溫暖的地方。在都市，人們也會相信常去的店家；長期累積

信用、交易的話，自然會放心。可是實際上做生意是為了獲利，所以在現實市場裡，縱然有老交情，彼此間的信賴出現龜裂的情況還是很多。買東西時順路進到舊貨店的買家，因為對賣家的認知不足，自然會產生「該不會這是在騙我的吧？」、「這不會是在亂喊價吧？」的心理；賣家同樣會因為對買家的資訊不足而產生混亂。

萬一你買了不該買的東西，作為一個消費者，你的心情會如何？站在銷售者的立場上，也可能發生一模一樣的情形。販賣癌症保險時，如果有許多罹患癌症的高危險群加入保險，銷售者會產生想降低損失、提高平均癌症保險費用的念頭；但倘若提高保費，那就真的只有罹癌高機率的人會加入保險了。出現這種錯誤的選擇時，擁有好商品的人不得不再謀求其他的妙計，才能讓商品以相符的價格賣出。例如，他們會向買家附上保證書之類的東西，這樣會產生附加的成本費用。發生資訊不對稱的問題時，原本只有需求者與供給者的經濟學世界裡會出現仲介者的角色，意味著成本費用增加。

## 只剩下檸檬車的二手車市場

參與市場的交易者之間，一定會存在識別有無價值資訊的眼光差異，這稱之為「資訊不對稱」，也被認為是市場失靈的原因之一。身為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珍妮特·葉倫丈夫的喬治·艾克羅夫研究資訊不對稱，並因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諾貝爾得獎論文是《檸檬市場》（The Market for Lemons），這裡的檸檬不是吃的檸檬，而是指低品質的二手車。檸檬外表看起來好像不錯，可是咬一口的話會因為太酸而吃不下去，藉此來比喻低品質的二手車。二手車市場有劣質的「檸檬二手車」，但也有性能堪用的「桃子二手車」。二手車賣家很清楚知道自己要賣的車是檸檬還是桃子，想買二手車的人卻不知道。

如果賣家的車是桃子二手車的話，他們會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呢？買家無法支付滿意的價格時，賣家便不會進行交易。相反的，如果賣家的車是檸檬車的話，一旦買家提出適合的價格，他們就會快點賣

掉。其結果是，二手車市場很有可能會幾乎沒有桃子，而是充滿了檸檬。

舉個例子吧！有一輛車子很乾淨、沒發生過事故的车子，以一千六百萬韓元放到二手車市場；如果有買家想以一千兩百萬韓元來議價，賣家寧可選擇以一千六百萬韓元賣給值得信賴的友人。相反地，假設有一輛車子款式相同，但曾經發生過事故導致車況不佳，實際價值未達一千二百萬韓元，卻以該價格進入二手車市場。買家因為無法充份理解這輛車子，很可能以設想好的價格購買。一旦市場裡持續發生這種狀況，只有檸檬車賣得比實際價格高，桃子車卻無法賣出該有的價值，最終會造成桃子車從一開始就不會進入市場。想購買桃子車的人開始不去低品質的檸檬店，使得二手車市場無法發揮該有的機能。

當買家把所有賣家視為「騙子」，賣家則把所有買家視為「奧客」的時候，市場整體的品質會下滑。賣家知道自己車子的價值是在平均以上或以下，但是買家不知道，所以買家總是只以平均價格開價，進而產生問題——價值高於平均價格的車子因此會在二手車市場消失，只有價值低於平均價格、對買家不實惠的車子會留在市場。這便是艾克羅夫的理論，賣家比買家擁有更多情報，資訊不對稱使得消費者很有可能做出錯誤選擇；就這層面上來看，檸檬市場理論亦可稱為「逆向選擇理論」。仲介人的角色因此登場，可能犧牲了消費者的主權，這就是市場失靈的一面。

## 左右國家經濟的信用評等機構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周遭有人上當買下二手車而生氣。那種車表面看起來正常，但開一下就容易故障，於是他們發誓：「要是我再買中古車，我就不是人。」艾克羅夫的檸檬市場理論也適用於借貸、股市等金融市場。在金融市場裡，因為信用相對良好的人不會借錢，所以最後只剩下信用低的檸檬貸款者了；雖然不完全是這樣，但是不需要

借貸的公司通常不會上市。因為資訊不對稱，所以會出現需求者的選擇與市場原理相反的現象，這在金融市場經常可見。

之所以要關注金融市場裡的逆向選擇，是因為它是讓金融市場不穩定的代表性因素。假設某位董事長知道公司即將倒閉，卻還是發行了高利息的垃圾債券（Junk Bond）。<sup>18</sup>這位董事長從一開始就壓根沒打算要償還債務，但購買垃圾債券的人們幾乎不知道這家公司的情況，最後自然難以避免金融市場失敗。艾克羅夫表示，「dot-com網路公司」的股價之所以會被過度高估，使得檸檬股票支配市場，最終導致IT股泡沫破裂，主因也是由於散戶的資訊不足。

為了提高市場的效率性，我們必須解決這種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可是有什麼方法嗎？讓民間擁有仲介的機能就行了。當一家企業要股票上市時，一般投資者比起企業本身，更看重負責該公司上市業務的證券商，再決定投資與否。如果沒有負責的證券商，上市本身會因為資訊不對稱而變得困難。政府可以制定讓人販賣資訊、或像是證券市場公告制度的規範。金融中介機構收取一些手續費，就會介紹不錯的投資。

防止金融市場裡發生逆向選擇並因此累積不少名聲的民間公司，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信用評等機構。可是信用評等機構如果不站在多數的老百姓一邊，而是為了賺錢所以站在少數的大型銀行與大企業那一邊，導致老百姓受害的話怎麼辦？二〇〇八年金融大海嘯便是個例子。必須防止逆向選擇的信用評等機構，反而做出道德風險（Moral Hazard）的行為，讓檸檬的味道酸到發苦了。

信用評等機構為了提高收入，不惜把靈魂賣給惡魔。咸認是引發金融大海嘯主嫌之一的信用評等機構之中，穆迪公司（Moody's）的一位員工違背良心，給予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商品高信用評等，老百姓卻對此堅信不移。像這樣，信用評等機構的一句話便左右了一國的經濟。在這種世界裡，他們不站在老百姓這邊，而是站在該負責的企業那邊，不時做出傷害百姓利益的行為。當信用評等機構不公開內部評



價過程時，我們還能無條件地信賴他們做出的評價嗎？再考慮他們與華爾街大戶的錯綜複雜關係的話，問題更加嚴重。

信用評等機構可以壟斷有價值的資訊，並放出虛假的情報。如果他們製造出符合自己口味的資訊，別說是防止逆向選擇，他們會因為道德風險而招致市場的不信任。如果逆向選擇是發生在交易之前的問題，道德風險則是交易之後發生的「主人—代理人問題」。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的股份有限公司時，經營者（代理人）比起為了股東（主人）去追求利潤的巨大化，他們可能會陷入想多拿一點自己利益的道德風險。

看看有名的美國安隆（Enron）事件吧，安隆的經營階層們為了個人利益，惡意運用了公司資金與利潤。股東們對企業的資訊不足時，代理人們可能會陷入道德風險。加入火災保險後，卻沒有盡到該預防火災的注意事項，這也是道德風險的問題，因為加入保險之後，盡義務的動機會降低或是消失。

## 有人正為了釣你而虎視眈眈

透過專業的仲介來購買中古車會比較有保障，可是價格也比一般的個人交易來得貴，民眾因此不太願意這樣買車。許多人於是選擇在網路上直接交易，這樣既不用繳交額外的手續費，也可以與當事人議價。但直接交易可能會面臨未依約繳交物品的狀況，遇上詐騙、損失財物的風險很高。電商業者沒有申報警察、提供資訊、給予買家履約保障的義務，所以制度上很難擔保交易的安全。

近幾年線上直接交易詐騙案件數量持續增長，人們對線上中古商品直接交易的不信任感日益加重，也非常擔憂直接交易市場整體會萎縮。但因為線上中古商品直接交易是個人自由，所以政府在事前、制度上能做的規範有限。受到公家認證的賣家會在一定期間之內保證售後服務，或是提供加盟連鎖店型態的服務。相比之下，個人間的直接

交易除了價格便宜，很難期待他們提供這樣的服務。在個人間的交易裡，事實上也不可能完全瞭解到資訊。

在名為網路的資訊洪水之中，或許可以說資訊不對稱的狀況逐漸縮小。大量資訊透過網路在世界上散播，隨著人們的分享，過去只有少數人能夠享有的情報，現在許多人都可以輕易接觸到。不過網路世界充斥著沒良心的賣家和虛假商品，如果不信任感開始蔓延，排除掉這些因素依然很重要，尤其是中古市場更該如此。做生意的人如果製造出有違消費者利益的資訊，例如惡意利用消費者不懂專業資訊的事實，會怎麼樣呢？如果沒倫理觀的醫生為了賺錢，強烈推薦病人做手術，缺乏醫療知識的病人不就沒辦法、只好接受手術嗎？

我舉一篇糾出資訊不對稱問題的美國某醫學論文為例。報告中顯示，位於低出生率地區的婦產科，其剖腹產手術的比率大於高出生率地區。當醫院經營困難時，醫生們可能會勸病人進行需花更多費用的剖腹產。如果這篇論文描述的狀況為真，那真是令人擔憂害怕！

## 面對資訊不對稱的現實

回到二手車的例子。最後我們可以知道，在解決資訊不對稱問題上，企業家的良心與政府的角色都非常重要。當有人想要經營二手車網站時，政府可以設置機制，派人親自訪查現場，只給遵守安全交易的良心賣家發放經營資格。良心賣家可以藉由自我檢驗來建構一個值得信賴的二手車市場，從中過濾掉虛假商品和錯誤的車輛資訊，這樣才能防止買家走上冤枉路。現在也有向買家提供協助購買二手車的金融商品服務，之前只有金融中介機構在辦理這種商品，所以利率很高，但是最近銀行也推出了相似的商品，促使利率大幅下降。

韓國政府必須推動二手車市場先進化和改善二手車線上競標制度，以持續減少消費者受害。像美國二手車評價公司凱利藍皮書（Kelley Blue Book）那樣提供消費者二手車價格情報，在汽車領域的專業機關設置國民服務中心，給予購買二手車受害的消費者諮商、

協助，這才符合設立的宗旨。為了防範二手車市場的非法行為，一旦發現車輛性能檢查廠假造汽車性能報告時，就要立即取消營業資格；業者的商品被揭發資訊不實或有誘售詐騙之嫌時，也應斷然執行取消買賣業登記的嚴格處分。為了保護線上競標的使用者，賣家在線上競標時必須標記出里程數與驗車資訊，並養成保管交易紀錄的習慣。

就算有這些措施，現實也很難達到完美的資訊對稱。在人們對二手商品關心漸增的情況下，為了防止逆向選擇，政府與社會必須一同建造一個值得信賴的社會。你在瀏覽網路時，突然冒出好像能看穿我內心想法的廣告，這絕對不是偶然。如果有人正虎視眈眈地尋找釣你的機會，你就必須強化自己的防禦。

### 【理論提出者】

喬治．艾克羅夫 George A. Akerlof, 1940.6～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他是於二〇〇一年與麥克．史賓賽（Michael Spence）、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Eugene Stiglitz）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世界級經濟學家。他在一九七〇年發表的論文《檸檬市場》論文之中，首次提出了資訊不對稱產生的心理上錯誤計算，會對市場經濟造成影響。現實市場的需求與供給一致，與效能巨大化又理性的完全競爭市場關係甚遠，最後證實了因為資訊不對稱，而廣泛地出現促使人選擇劣質品的價格扭曲現象。他的檸檬市場理論也奠定了資訊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的基石。他曾任職於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系教授、布魯金斯學會首席研究員，也曾在柯林頓政府時期擔任經濟諮詢委員。

松鼠读西游

微信扫码加入星球

知识星球




---

18 垃圾債券是信用評級甚低的債券，通常是由商業信用不佳的中小企業、新興企業、有壞賬記錄的公司發行。其特色是商業風險高，但債券利息也高。

# Chapter4

## 如何建設國家

Nation Building

# 01 國家經營論點

## ——企業家為何會成為失敗的國家領袖

### 國家不是公司

鰥居的美國總統角逐連任美國總統大選在即，卻與專精於環保議題的女說客陷入熱戀。在確認總統心意的那天，女主角頂著一頭像剛睡醒的中性短髮，穿著總統男友的白襯衫誘惑他。這是二十多年前的愛情電影《白宮夜未眠》（The American President）其中一幕。手握世界霸權的美國總統，實際上會像電影中那樣是個浪漫的人嗎？令人好奇他們現實中到底是什麼模樣。

二〇一六年是歐巴馬總統任職八年期間中的最後一年，他在白宮記者協會每年例行舉辦的晚宴上，以富有幽默的方式這麼說：「我的頭髮都變得灰白，年紀也過五十了，現在正倒數著被醫生宣告死亡的那天到來。我的夫人蜜雪兒和我不同，她依然是八年前那副容顏呢！」

演說結束之後，他把麥克風丟掉，大喊「歐巴馬下台」，這是在模仿最近歌手或藝人在自認完美演出後滿意地扔掉麥克風。一想到八年間全球發生的多災多難，我便對將離去的他感到憐憫。經濟系第一名畢業的學生，能在企業經營中展露頭角嗎？讓史帝夫．賈伯斯或比爾．蓋茲來經營國家的話，他們能做得好嗎？進步主義經濟學家的代表保羅．克魯曼會說「不」並劃清界線，而且他對「經營大企業有成的企業家提出國家經濟建議」的行為感到擔憂。他在一九九六年寫的一篇專欄「國家不是公司」（A Country Is Not a Company）裡面詳細解釋了理由。

曾有一位企業家出來參選總統並獲得了相當多票數。一九九二年，羅斯．裴洛（Ross Perot）在總統大選中以無黨籍身份參選。他

說：「對政府無能、浪費與貪瀆、財政赤字與國家負債增加感到失望的國民，由我來拯救你們！」這番話吸引了許多人氣。雖然最後他落馬了，但是我們再回顧一下他的主張吧！

「我們必須銘記我國憲法是建立於工業革命之前。建國先賢們不知道會有電氣、火車、電話、廣播、電視、汽車、火箭、核武、人工衛星、宇宙探險。要是在今日，他們會制定出什麼樣的憲法草案呢？一想到這裡就令人興奮。」

在經營國家經濟的層面上來看，成功經營企業的經驗不過是極小的部份。即便是擁有十億美元資產的成功企業家，也很難看作是適合擔任一年G D P達十八兆美元的國家領導人。因為國家和企業的存在原因與實際不同，所以優秀的經濟專家與只要好好賺錢就能成功的企業家角色不同，這便是克魯曼的思維。

## 國家經營和企業經營的差異

二〇一二年美國總統大選之際，考量到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中有人是企業家出身，所以他再次拿出那一冊專欄集，為的就是提出反對的聲音。如果企業經營有成，又能充份履行總統的角色，克魯曼的主張就會被推翻，因為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不可能阻止企業家出來角逐總統候選，所以表面上克魯曼的偏見看起來不正確。但是每個人都有表達的自由，就讓我們來好好分析克魯曼的想法。

「為什麼到現在還有人相信，成功的企業家也能制定成功的經濟政策呢？經營企業和制訂總體經濟政策是截然不同的事。最重要的差異點是，在總體經濟上勞工是消費者，可是沒有一家企業能把大部份的銷售額賣給自己公司職員。反之，就算國家再小，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生產品是由自己國家人民消費，因為服務業大多不可能輸出海外。」

後面的部份看似合理沒有爭議。但我還是對於企業經營與國家經營間是否存在巨大差異這一點感到懷疑。讓我們繼續聽聽他是怎麼說的。

「這有非常大的差異。透過結構調整減少一半的員工人數，卻依然維持著同樣銷售額的企業經營者，會獲得大家讚頌。可是經濟政策立案者這麼做的話，這個國家馬上會陷入不景氣，就算製作了商品也沒有人要買。即使經營企業再怎麼厲害，對國家經營很重要的『節儉的矛盾』（Paradox of Thrift）或『貨幣供給額增加』，因為這兩個因素造成了像是通貨膨脹的情形時，他們會不太能應付。」

雖然這段話說得對，但是擁有經濟學知識的企業家能清楚分辨企業與國家的差異，並且任用適合的專家來制定與實施政策，讓企業家來經營國家也無不可，不是嗎？我覺得克魯曼說「企業家絕對不可以當總統」的主張有點過頭了。我認為他說的事情是企業家出身的總統候選人們該留意的事項，將之謹記在心、試著去分析他所說的內容，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可以肯定的是，國家並非只為了一家企業而存在，而是融合了諸多企業、消費者、各國關係的主體，所以成功的企業經營經驗並不能保障能成為成功的總統。

「當上總統之後，你必須與議會共事，而且會比當企業執行長的時候受到更多牽制，最重要的是懂得如何與議會一起工作。如果有人認為現在我們需要企業執行長型的總統，那就太傻了。」

現代國家實施三權分立，制約了總統的權限。企業經營者在經營公司時被賦予完全的權力，可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下有效率地經營事業；相反地，國家經營的權限受到很多限制，行政首長也受司法機關、立法機關甚至國民輿論的牽制。縱使自己制定了一個非常好的計畫，如果想要順利實現，就需要擁有能調解利害關係衝突的能力。為了更加理解克魯曼的主張，仔細觀察國家與企業經營的本質會更有意義。



## 多元追求和利潤掛帥的差異

我們繼續來聽克魯曼的主張。

「成功的企業家擁有捕捉生意中的機會、解決問題的能力，我相信這也一樣可以適用在國家經濟上。但是國家經濟需要的思考方式，與讓企業達到成功的方式非常不一樣，因為國家不是公司。與其像公司經營那樣推動特定戰略，國家經濟需要按照一般性原則運行。最佳的方法是建立好的結構、基本的系統，接下來便讓它盡可能自我運作。」

為了在全球化的廝殺競爭中生存，企業必須不斷維持業績大幅超出業界平均值，針對特定世界制定戰略思維是生存的必要條件。《從A到A+》（Good to Great）的作者詹姆．柯林斯（Jim C. Collins），觀察到偉大的企業裡面必定有偉大的執行長。偉大的企業領袖在尋找有責任感與幹勁、能夠自發工作的適任人才上做出許多貢獻，並且打造出適合工作的氣氛與環境，給予他們決定權且試著不去干涉。今時今日也很偉大的企業們，一邊奉行著「顧客是企業的夥伴」的理念，一邊建立自我的革新策略，並不斷實踐與打造品牌形象。那麼，這種企業的本質是什麼呢？

企業為顧客創造價值，但是利潤沒有最大化的話，他們也很難生存。企業的社會責任或提高股東價值也很重要，但利潤最大化才是企業的最重要目標。國家目標是讓人民過得更好，卻也會點燃該以經濟成長或公平分配為重心的論戰。民主化、解決兩極化、地方發展均衡等多樣化目標皆很重要，實在很難忽視掉任一項。當然，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過程中，也被強調需要擔負起社會、法律、倫理上的多元責任。但就算企業目標有好幾個，不論去到哪裡，賺錢才是最重要的事。

國家的目標很多元，政策方向會隨著強調哪一方面而改變。國家經營與企業經營不同，很難放棄任何一個目標，也因為存在各式各樣

的利害關係，所以會碰上兩難的困境；政策目標越是存在分歧，遇到的難題就越大。有人因政策受惠，就會有人因政策受害，因此政策必須加以調整，政府要確實進行政策效果的成本效益分析，這也是為什麼「最大化成本效益策略」很重要的原因。過程中會要求領導者擁有說服、溝通、整合的領導能力。

國家不像企業，「執行長帶頭指揮以使利潤最大化」並非國家經營的必備條件，反而是因為目標多元、對政策存在正反意見，所以國家領袖更需要擁有整合的能力。領導者要能好好地協調社會各方面發生的利害關係與分歧，不向既得利益層的強權與脅迫低頭，妥善維持均衡。

## 在效率與公平之間求取平衡

企業家難以想像國家經營的複雜程度。就以韓國來說，總統必須面對的人民數量，比最大企業集團的從業員人數多上幾百倍，而且需要考量到人民間的利害關係，所以國家必須考慮到的變數是好幾百倍的次方以上。此外，企業就算規模再大、涉足領域再多元，始終能從他們的核心策略當中找到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但國家簡直是同時存在著性質、哲學完全不同的數十萬個部門。這就是國家經營比企業經營更要立足在廣泛、一般性原則上的原因。

克魯曼說法的核心意義是政府只要定下最大的原則，細部的營運則交給經濟主體。請試著思考一下有關「開發新成長動力」這個問題，在開發未來成長動力上，需賭上自我存亡的主體是企業。如果政府在這層面上支持他們，指定幾個核心產業且引領他們的話，稍微一個不小心就可能會阻礙到企業的創新與浪費資源。發展順利的企業沒必要像國家那樣，全方面地照顧到所有部門。當國家經營的一個部門發展順利時，也必須考慮會造成其他部門受害的可能性。企業的話，依據執行長的領導能力與策略，全部事業部門可以同時增加聘用與投資，市場占有率也可能持續增加。可是國家不可能讓全部企業同時提高市場占有率，至少內需市場是因為企業們針對一定人數的消費者而

相互競爭。這種根本上的差異，造就政府會計與企業會計的不同，而勞動法也與企業的人事管理不同，金融、貨幣政策亦與企業財務管理不同。

是不是因為這樣，克魯曼才會主張政治領袖可以向企業家詢求有關錢的問題，但是企業家必須要能夠意識到並區分出什麼樣的建議適用於國家經濟呢？他這個主張聽起來像是在告誡大家，當國家元首具備企業型思維時，可能會過度偏重效率。

企業會盡力降低最低投入成本，並追求生產最大化，盡可能擴大投資與生產之間的差距，努力培養剩餘價值。相反地，國家追求投資與生產的平衡，財政收入與支出之間並非總是要產生盈餘，時常會編出預算赤字，也有編出預算盈餘的時候，但重要的是財政要達到平衡，才能減少世代負擔並維持公義。企業以效率為主，所以他們傾向只有在可能長期損害效率的情形下才會考量公平，但國家不能這麼做。效率與公平像車子的兩個輪子一樣關係密切，國家必須不斷思考如何盡可能達到均衡。

一位總統無論成功與否，國家都會延續到下一個政權，但是企業的獲利源泉一旦乾涸便會死亡。看到眾多世界級優秀的企業們在一瞬間消失，我覺得企業經營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 兩極化的政治招致經濟的兩極化

政府追求公益，它與企業不同，目標是利他性的，必須包容其他國家、企業、消費者等許多利害關係者。全球話題處於兩極化之中，我們來聽聽保羅·克魯曼提到和這相關的說法。

「不是因為經濟的兩極化導致政治變得兩極化，而是因為政治的兩極化，造成經濟也兩極化。」

政治和行政不能只為特定支持者發聲，比起分裂與對立，整合與和解才是解決政治兩極化與經濟兩極化的方案。克魯曼在美國總統大

選時支持歐巴馬，他甚至獲得「小布希狙擊手」這種稱號。然而對歐巴馬的金融海嘯對策感到失望的他，主張歐巴馬政府處理銀行不良資產計畫是把錢扔進垃圾筒的政策，並且提出銀行需要國有化。

克魯曼在著作《下一個榮景：政治如何搭救經濟》（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中，提出要強化社會安全網、減少不平等現象，強調了自己進步主義者的立場。要富裕階層繳納更多稅金來幫助貧窮人家的他，令我聯想到了羅賓漢。

「美國不只是沒有平等的機會，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機會本身就不平等。我們必須擴展眼界，攜手迎接共存的時代，而不是個人獨活。」

我們是要贊成或反對克魯曼這番毒舌論調其實並不重要。只是在現代社會，對國家元首格外要求的品德是要能夠融會各種聲音，圓滿地管理矛盾與糾紛——就這點來看，我覺得克魯曼的話值得放在心上，他的核心與主旨正是國家經營比企業經營更難。國家元首為了達到恰當的平衡點，要提出最佳的藍圖，與人民一同朝著目標前進，再加上必須展現出柔軟身段、兼具頑強耐性的領導能力。重要的是，這個過程之中沒有引發矛盾，適當地管制糾紛。

經合組織所發表的「社會衝突管理指數」（Social Conflict Management Index），是顯示政府的行政或制度是否能有效管理衝突的指數。對於政府效能、法制品質、防治貪污等指標，經合組織根據會員國的調查數據實施迴歸分析，但韓國的成績不怎麼理想。民主主義成熟度和政府效能越是低落，所得不均的狀況越高，社會衝突自然也高。沒有控管好衝突的話，便會成為災難，但是好好管理、整合的話，便能孕育出美好的果實，這就是國家經營。有分析指出，只要能稍微降低社會衝突管理指數，人均GDP就能上升。經合組織會員國當中，社會衝突管理指數表現最優秀的荷蘭與德國藉由勞資協商，在全球金融大海嘯之中也能堅毅不搖地維持經濟成長。看看他們現在仍是發展順利的歐洲國家之一，這就是證據了。

國家經營不能只責怪政治圈。政府管理衝突確實很重要，可是企業必須重視自己的社會責任，地方政府必須克服地方主義，人民也必須要有解決階層間、世代間矛盾的決心，這些全都很重要。對於欲擒故縱的男女關係，我們會用「搞曖昧」一詞來形容。但總不能因為國家與國民的矛盾鴻溝深不見底，於是我們社會就一邊說著討厭搞曖昧，一邊朝向迴避這一切的方向發展吧？請不要忘記，管理衝突和恢復信賴是建設國家的基本。

### 【理論提出者】

保羅．克魯曼 Paul R. Krugman, 1953.2～

他出生於紐約長島，一九七四年從耶魯大學畢業，一九七七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梭羅（Robert Merton Solow）教授指導下，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二〇〇八年因其結合貿易理論與經濟地理學的學問貢獻獲得認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克魯曼跳脫了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主張的傳統型比較優勢理論，並站在多樣性或規模經濟的層面上，提出能解釋貿易利益的新貿易理論。他因預測到一九九〇年代亞洲開發中國家的金融風暴而受到矚目，學界評價其論述為「新凱因斯主義」。他身為《紐約時報》的固定專欄作家，曾好幾次下筆批判小布希總統與其幕僚的不道德行為。

## 02 教育經濟學

### ——報酬率最高的投資

#### 嬰幼兒教育投資效果高出十六倍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在連任後的首場國情咨文演說上，說著「我不放棄」，表達他國政改革的意志。他強調二十一世紀最棒的抗貧計畫，是世界級水準的教育。歐巴馬政府積極推進的教育改革，包含為了貧窮子女的「零至五歲計畫」（Zero-to-Five Plan）。幼兒期是人類左腦與右腦最具可塑性的時候，到六歲為止會增加四倍左右的重量，腦部大小也會成長到成人大腦的九十%。出生後的一年內，每一秒會形成七百個新生神經細胞連結；隨著年紀增長，可以改變的能力會逐漸減少。歐巴馬的決定是起於他認知到美國幼兒教育已經落後，例如在比利時和法國，三歲幼兒幾乎都會在教育機構就讀，但是美國卻連四十%都不到。

念書——用稍微高尚一點的詞彙叫「教育」——被全世界認為是最好的投資，所以連歐巴馬也讚賞韓國的教育瘋潮與教育制度。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他的著作《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提到「最有價值的資本投資是對人投資，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母親。」雖然不知與馬歇爾所想的母親是否一致，但這讓我自然地想起被稱為「教育之神」的韓國母親們。

就算歲月如梭，全球依然認為教育很重要的原因有兩大項。一個是教育為擴增生產力的捷徑，另一個是教育為解決兩極化的方法。那麼，我們念的所有書在經濟學上有意義嗎？未必如此。

提出歐巴馬「零至五歲計畫」理論根據的學者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詹姆士·赫克曼。二〇〇〇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的他，藉由收

集細微的數據與統計分析，打開了學問融合的新世界。嬰幼兒時期大膽的教育與照顧，是比其他任何投資更要有經濟性又可觀的投資，而赫克曼是證明出這點的獨特經濟學家。另外，他還做出嬰幼兒教育投資效果高於成人教育投資十六倍的結論。依照他的說法，隨著時間增加，投資的教育報酬率（生產力圖表）會下降。實際上，他的理論與解決不平等有關。他強調比起投資高中和大學教育，國家把資源花在貧窮家庭的零至五歲嬰幼兒教育，可以有效阻擋貧窮世襲。

## 非認知能力才能長期改變人生

在韓國，過度教育導致補習費用沖天般的高；儘管赫克曼的話有其重要性，但還是讓人疲乏招來了疲勞感。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剖析他說的投資嬰幼兒教育是最有報酬率的主張。赫克曼反對遺傳因子左右人類命運的說法，他想證明向社會邊緣群體的孩子們實施早期教育，可以穩固國家財政，提高孩子的 I Q 及社會聯繫，並成為發展未來的原動力。根據他的實驗，在二十一歲之前 I Q 都可充份增加。他考量到貧困家庭會比中產階級家庭更疏忽孩子的養育問題，所以將國家財政運用在貧窮及被冷落的孩子時，會給個人與社會全體帶來福利。

赫克曼以三到四歲的黑人孩子為對象，實施了俗稱為「培瑞托兒所方案」（Perry preschool project）的計畫。調查對象是一九六二年出生的貧窮家庭黑人孩子一百二十三名，其中五十八人組成少數群體，成為接受完善教育的實驗對象，剩下的人則是做為對照組接受一般教育，並進行超過四十年的追蹤調查。其結果顯示，數十年過去，托兒所教育的效果仍持續顯現。兩組在就業、年所得與犯罪率方面都有顯著差距。實驗結果證明，像 I Q 這樣的認知能力僅有短期效果，在畢業後的一、兩年內，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差距幾乎消失。但真正能長期改變人生的，是認真、社交等非認知能力。

赫克曼以自己的主張為根據，向政治家與預算編列當局提供了這實驗結果，後來成功說服並改變了州政府與國家預算分配的優先順序。他認為，儘管政府補助年輕人的方式可能因一時的消費增加而改



善資源分配，但是這可能會妨礙到資源分配的效率性。反之，給予被邊緣化的弱勢幼兒免費教育則不是單純的消費，而是能帶來更大報酬的強力投資。他實際證明了這套理論。

常識上，投資貧窮孩童是期待可以涵養他們擁有正確的價值觀。並在成年後做為一個健全的社會人士生活。生長於困苦環境的孩子，因為未能從父母身上獲得良好養育，所以掉進犯罪巢穴的可能性很大；他們缺乏認知能力、社會及情緒能力，人生失敗的機率也很高。如果有一個國家計畫援助生活在這種環境的孩子，讓他們從童年時期開始閱讀書籍，並與其他孩子們相處融洽的話，會如何呢？

若是編列適當的預算投資孩子，稅收會隨著他們的就業而增加，減少失業給付、降低犯罪率，也接著省下警察、法院、監獄的維持成本等等，赫克曼疾呼這樣便能達到政府所期望的目標。他的主張讓民主黨與共和黨的議員、甚至是歐巴馬總統都感動地點頭同意。

## 早期教育可以克服基因影響

誘發暴力行為的M A O A遺傳基因，19常在喬治亞州或其他地區的監獄囚犯身上見到，赫克曼對此進行研究。結果顯示，縱使擁有M A O A基因的孩子，若是在中產階級家庭接受良好教育的話，就不會成為犯罪者；相對來說，擁有M A O A基因的孩子若暴露在經常出現暴力的環境之中，成長階段未能受到良好照顧，就有高機率成為犯罪者。至於M A O A基因較少的孩子們，即便遭到虐待也多半不會成為犯罪者，這與一般人的預想相反。

赫克曼認為人性一半是建立在遺傳基因上，但是剩下的一半可充份靠教育培養。不好的遺傳基因能靠環境隔絕其發展，好的遺傳基因亦能靠好的環境開發出來。另外，他主張藉由提高貧窮孩子的生產力來解決貧富間教育差距，而且重點是要在三到四歲以前實施早期教育，因為那才是提高生產力的捷徑。考量到大部份的品性教育是在家

庭塑成，政府的政策應該應先照顧單親家庭或低收入戶家庭的嬰幼兒教育。他這番主張受到世人關注。

對赫克曼而言，人生是「提高我可以做到任何事的自信心」之過程。解數學問題、賞析音樂，為了與人們相處融洽而擁有調解憤怒的智慧，能綜合提高社會及情緒能力，這就是人生的意義。他認為儘管生活中 I Q 也是重要的東西，但是良心與動機也是活出率性人生的重要角色。他說人類為了人生成功，不該集中在填補缺乏的認知教育，重要的是培養均衡的社會及情緒能力。他這段話是任何人在生活中都曾感受過一次的事實。

實際上，當我們進入職場後，誠實、創意、自制力等品性會更加左右個人的經濟上、社會上成功，因此赫克曼說必須從三至四歲開始進行早期品性教育。他呼籲老實、自制力、溝通能力是與人交流時必要的「軟技能」（Soft Skills），我們要重視培養這些技能的教育。從他的話中可以感受到濃濃的情緒感染力。對於邊緣孩子，重要的不是「錢的稀少性」，而是「母愛的空位」。這是他向現代人生活忙碌、想只以錢解決養育問題的態度提出警告。

向生計困難的人們提供麵包至關緊要，不過只給貧窮人家錢財、提高消費能力，並不代表下一代就能享有繁榮。長期來看，想讓孩子成為社會一員、過上真實的人生，為他們創造能填補所缺乏的母愛之環境是非常重要的。赫克曼曾說，孩子無法去學校，也沒有想去的念頭，是因為他們生活在「無法確實知道要做什麼」的環境中，所以被傳承了貧窮。根據他的主張，促進「擁有者」與「無法擁有者」固定化的最大差異，來自於是否經歷過「帶有溫暖母愛的嬰幼兒教育」。

## 影響美國教育政策的赫克曼方程式

赫克曼主張，為了解決美國的兩極化問題，往後二十年至三十年需集中投資貧窮孩子的教育。這種教育投資的報酬率到底會有多少呢？他宣稱每年可達到七～十%的報酬率；投資四歲孩子一千美元的

話，到六十五歲便能獲得六十～三百美元的報酬，他這話聽起來很神奇。他指出，社會對早期教育投資而降低犯罪率所需的成本，為增加警察人數成本的五分之一。另外，投資貧窮人家也能成為他人的利益。同時，他也強調國家投資孩子的教育而獲得的利益，會廣泛地擴散到整個社會，不只是貧窮階層受惠，繳納稅金的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亦然。

經濟學裡有太多複雜的方程式，不過這裡有個非常簡單的方程式。取自詹姆士．赫克曼名字的「赫克曼方程式」，大大地影響歐巴馬政府的政策。這個方程式的核心是：

$$\text{投資} + \text{開發} + \text{維持} = \text{利益 (Gain)}$$

人類從小的時候必須擁有同等的學習機會，因此赫克曼呼籲國家應該投資（Invest）資金，盡可能保障貧窮兒童的受教權。他強調從孩子出生到五歲為止，我們要集中開發（Develop）他們的智能與社會能力，接著維持（Sustain）優良的教育計畫待他們長大成人為止。那麼，孩子們長大之後，成為下一代優秀的人才，也成為社會整體上的利益（Gain）。這就是赫克曼方程式的要點。

在人類的發展歷程中，嬰幼兒是終身學習的出發點，亦是塑造品性的初始期，因此國家和社會對嬰幼兒教育有非常重大的責任。如同赫克曼的主張，若嬰幼兒時期是人力資源投資與回收比率非常大的時期，這在效率性觀點上也是一項有意義的投資，許多國家因而擴大嬰幼兒教育的財政投資，解決成長初期的教育差距，並提供高品質的嬰幼兒教育服務。透過優質的人才培養來強化國家競爭力並非無意義的空談，問題出在教育 and 教師團隊是否優質。

如果你看過舉報托兒所保育問題的相關新聞，你可能也會對於嬰幼兒是否接受完善保育起了疑心；父母或托兒所老師缺乏人倫的養育行為，導致我們內心更加灰暗。為了開發未來的人力資源，解決低出生率問題，韓國正實施著比美國更另類的嬰幼兒保育政策。問題是，韓國的教育計畫內容與教育環境，是否有順利按照「進行帶有溫暖母

愛的嬰幼兒教育」的赫克曼主張運轉。國家有責任減少隨著社會、經濟背景而不同的幼兒教育、福利水準差距，這樣的政策主旨很好。預算很緊繃，但是國家必須凝聚智慧，擔保日後能持續下去；根據地方與機構類型差異，也需要進一步強化管理國家所提供的各式各樣幼兒教育。

## 逃離只記得贏家的壓抑社會

赫克曼認為在十五歲之前都是人類成長的重要時期，其中到八歲為止格外重要，他建議唸書給孩子聽，讓他們聽許多故事。大人如果說自己討生活就很累了，因而不關心與孩子的溝通，只把孩子放在國營的托兒所的話，就很難獲得赫克曼方程式的結果。赫克曼曾批判韓國的教育制度忽視了毅力、認真、誘發動機等非認知能力教育，很是令人惋惜。韓國學校的考試無法確實評價學生的品性，而最近的經濟、教育領域研究結果顯示，品性與經濟、社會行為相連，可提高社會的生產，赫克曼主張我們必須銘記這點。因為只愛我家孩子的錯誤母愛，而導致了嬰幼兒教育走向充滿競爭的非人性教育，不是嗎？

赫克曼特別強調要在嬰幼兒時期塑造正確的自我尊重與學習動機。韓國母親為了把子女送去好的大學，而讓孩子進行先修教育（Prerequisite Learning）的驚人教育風潮，這並不屬於馬歇爾所說的母親，也不是赫克曼所說的母親模樣。對於大學高錄取率的韓國教育現況，赫克曼曾謹慎地表示：「萬一大學所學的知識與增加生產無關的話，就沒有任何意義。」

電影《春風化雨》（Dead Poets Society）中，出現了許多位我們讚頌的文人，包括莎士比亞與愛倫坡。從孩子一致地默背已逝古人詩詞的模樣中，我們感覺到了什麼？千篇一律的教育、害怕變化的大人模樣，是我們現在該扔出車窗的死亡產物。電影名稱直譯「死亡詩人的社會」，意味著這是個欠缺多樣性、只記得贏家的壓抑社會。當然，教育是個人將來賺錢求生的重要條件，有許多驗證教育與經濟成

長關係的研究，發展經濟學裡重視教育也是源於此，赫克曼亦同意這點。

對弱勢家庭孩子的投資，彷彿是讓這社會更加溫暖的陽光。韓國也實施了滿五歲的共同教育課程「五歲社會化課程」，由身體運動與意見溝通、社會關係、藝術經驗、探究自然等五項領域中，有系統地建構早期品性教育，也增加了人們的期待。但是，在安排一天二十四小時時間表來管理孩子上，又可以看到另一個競爭的面貌。如果父母的心態不從容，所有事都用競爭的理論來說明，這樣的教育在社會上有什麼意義呢？

韓國社會怪罪著引誘人們去競爭一切的新自由主義，在這樣的社會中，我們要試著反問自己究竟是否確實瞭解新自由主義的意義。新自由主義是為了去除沒效率，而培養競爭精神、嚮往小政府的一連串思潮。即使說這變質成了競爭是萬能的，社會招致嚴重的疲勞，促成了兩極化，但是我們可以扭曲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崇高的自由精神嗎？我們心中過度的競爭心態與緊迫，會讓我們只用一隻眼睛看待新自由主義。

赫克曼很瞭解平衡與效率間的衝突關係。他偉大的地方，在於他比任何人都還要會說明嬰幼兒投資可提高平衡，也能帶來提高社會投資報酬率的效率性結果。孩子踩著別人往上爬，這種歪曲的競爭不是自由，必須鼓吹能讓他們擁有自信心與從容不迫的自由精神。如果父母與社會從孩子小的時候，就使他們失去從容生活的心靈，那麼全部人都會變得不幸，絕對不可以忘記這點。

### 【理論提出者】

詹姆士．赫克曼 James J. Heckman, 1944. 4～

他是芝加哥大學教授，在連結經濟學與統計學的個體計量經濟學領域上是先驅，他是分析研究男女薪資差距等勞動市場的世界級學者。高度關注幼兒教育的他，對於認知能力中僅重視 IQ 的主張持反

對意見。他主張本質上來看，人類的能力具有多重性與多元性，社會及情緒能力——即個性、健康、耐性、時間觀念、面對危險的態度、自我尊重、自制力等——上述非認知能力可以成為預測「社會成功可能性」的有力變數。

---

19 MAOA 遺傳基因 (Monoamine oxidase A, 單胺氧化酶 A 基因) 存在於 X 染色體上，研究顯示可能與暴力行為有關，但相關程度多寡與環境影響力仍有待爭議。

## 03 制度經濟學

### ——中國沒發生工業革命的原因

#### 屢屢面臨外債危機的阿根廷

住在義大利的馬可羅西一家很窮，所以媽媽離家去有錢人的國家阿根廷工作。有一天，馬可羅西非常想念媽媽，於是毫無計畫地踏上尋母之旅。雖然經歷了許多困難與危機，但是在許多人的幫助下，馬可羅西終於見到了媽媽。在我心裡，《萬里尋母》（母をたずねて三千里）是我小時候看過最感人的動畫。在這個故事裡，人稱阿根廷為「南美的珍珠」，且被選為世界七大強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為止，有許多人為了賺錢而移民到探戈之國阿根廷。發展如此順利的阿根廷，之後因為熱衷於罷工的勞工、比起經濟力更依靠官商勾結的企業家、只在乎自己利益的政治家與人民，而遭遇外債危機、陷入主權債務違約，並寫下了悲痛的歷史一頁。我一邊想著在長期的經濟危機歲月之中，因憤怒與挫折而流著血淚的阿根廷人們，一邊聽著〈阿根廷，別為我哭泣〉（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這首歌。

阿根廷的主權債務違約宣言導致國際債權人失去了本息，這是怎麼一回事？二〇一六年三月美國避險基金Bracebridge Capital與阿根廷政府簽下的債務償還和解協議，獲得了高達九百五十二%的報酬。二〇〇一年阿根廷宣布對高達一千億美金的對外債務違約，當時國際債權人對債務調整達成協議，可是避險基金們購買了一部份債權並提出償還本息的訴訟。經過十年的法庭攻防，二〇一二年避險基金們從美國紐約地方法院獲得了全額賠償的勝訴判決，後續再與阿根廷進行多年協商，終於獲得龐大報酬。



一想到是制度、政策及人民的情感，把阿根廷從強國變成外債危機國，我便覺得電影《阿根廷，別為我哭泣》主角所參考的實際人物伊娃·裴隆（Eva Perón）很可憐。伊娃·裴隆是阿根廷總統胡安·裴隆（Juan D. Perón）的妻子，年僅三十三歲便香消玉殞。世人對她的評價兩極，阿根廷停止發行印有她頭像的紙幣，並以面臨絕種的花鹿圖案代替。因為胡安·裴隆總統被視為左派民粹主義的代表人物，所以此作為亦被視為清算裴隆主義的措施。

## 制度是經濟成長的根源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學課本。個體經濟學裡面，最重要的部份是市場的原理，可是市場原理可以解釋所有的經濟嗎？我想是不可能。傳統上，經濟學專注於說明市場理論，但現實上如果沒有適合的制度，市場不可能順利運作。與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不同，現實市場是不完美的，也很難完全擁有與交易相關的資訊，成本費用也不小；縱然認同私有財產權，圍繞著財產權的個人紛爭依然發生。

在締結與交易相關的合約時，如果沒有做好可快速履行擔保的措施，我們就很難確保它的實效性；若是這種制度不完善，將導致市場經濟中的交易成本與非效率性增加。站在重視效率性的立場上來看，我們必須制定各種能降低成本的制度。經濟學把制度設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是，經濟學是一門有效率性的學問，而且人們相信效率性是促成經濟發展的基本。

工業革命後，人類達到了耀眼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是什麼呢？人們認為是眾多人口、勤勉地勞動、豐富的資本積蓄、技術創新、教育、有效率的政府、企業家的冒險精神、廣大的市場。這些都沒有說錯，只是一九九三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主張，我們應該要找到經濟成長的最根本來源，並且提出其來源是「有效率的制度」。他認為必須具備有效率的制度，才能提高生產、使社會體制穩定。人們普遍信任制度，所以建立信賴對國家發展很重要。為了盡可能讓國家政策反映出人民的要求，人民必須針對政治經

濟制度積極陳述意見，國家必須建構制度及計畫經濟發展、社會安全。諾思堅信，靈活的制度才是能以最有效的分配方式打造市場的工具。

## 區分中國和英國命運的制度之力

為了正確瞭解制度有多重要，請你思考一下。一七四八年，曾是全球經濟中心的中國，為什麼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呢？從十六世紀開始，西歐為了建設殖民地而到處航海，從殖民地調動本國欠缺的資源與勞動力。因為中國疆域遼闊，完全感受不到匱乏，並且他們採取接受藩屬國朝貢的模式，與西歐的掠奪關係甚遠。以儒家為根本理念的中國，比起「發展」更看重「維持體制」，但是西歐力求脫離缺乏諸多資源的環境，追求更加富饒的生活。西歐的這種「欲望」，成為比中國等亞洲國家要更加發達的重要原因。

藉由經營殖民地，歐洲商人族群的權力自然增大。他們進出政界，社會上商界的發言力道也越來越大，導致政治制度從君主制改變成君主立憲制或共和國。相反地，中國因為人口龐大可以形成巨大的市場，又因為擁有眾多廉價勞力而對機器投資不關心。明朝的商業蕭條、貿易受限，所有一切都在國家的掌握之中。因為國家有著最多的財富，所以可主導商業發達的資產階級、可製作符合人們喜好的手工業者們，全都欲振乏力。

儘管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口、資本也無法掀起工業革命的原因是，他們欠缺可以誘發新變化的制度。資產階級革命鞏固了保障個人財產與自由的制度，促成歐洲經濟快速成長。但中國因為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所以保障經濟自由與財產的制度不發達，跟不上歐洲的經濟成長速度。最終，比起曾經科學技術發達的中國，擁有可助長商人勢力（資產階級）制度的歐洲超越了中國。

諾思也對英國與西班牙經濟歷史的變化過程加以分析，判斷果真是受到制度影響。在由代表商人族群的人物組成議會的英國，王室特

權遭到限制，私有財產權與「個人的政治、經濟自由發展制度」紮根下來。相反地，受到君主專制牢牢統治，導致保障個人自由與私有財產權制度很難紮根的西班牙，經濟落後於英國。諾思的主張在近代以前是有效的。人類文明是從定居型的農業社會出發，因而產生了財產觀念；在中世紀成形的西方封建制度，也是為了保護財產的最佳選擇。

缺乏資源或技術是經濟發展中相較之下容易解決的問題，在看到資源缺乏的東北亞，發展速度卻比資源豐富的東南亞或南美更快的事實後，便可瞭解到這點。然而，正確的制度或意識卻不容易從外國引進。模仿制度的外型不難，可是與該社會一體化的制度是文化的產物，很難修改或改變。一個社會要具備有競爭力的制度，會比提高技術水準更困難。各國制度的歷史發展過程不同，且因為制度的差異，而使得有些國家達到長期的經濟繁榮，有些國家則不然。因此，諾思認為經濟制度的進化即意味著經濟發展。

## 光移植制度無法促進經濟

諾思主張制度不是依靠少數的菁英或政府來人為制定。他認為社會內的信賴與信念系統會形成制度，並強調出人們是如何看待與解析現實。

我們來看諾思在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他在書中分析政治、政府、經濟成就，發現如果人民無法徹底監督政治，便會使得糟糕的制度持續下去。諾思提出了「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概念來描述惡化、促使這些現象出現的行為，這意指法律或制度、習慣或文化、科學知識或技術等，人類社會裡一旦事物成形，即便之後受到外來衝擊，也會因為慣性而不容易產生變化。

人類有極高可能性會延續從古至今的內容或形態。路徑依賴經常引用的例子，是英文打字機的鍵盤排列位置。今日標準鍵盤的左上列字母是 Q W E R T Y 的順序，這是在打字機還是連動桿式的時期，為了不讓打活字的機械彼此擠壓在一起，故意設計成這樣讓打字速度慢一點。隨著技術進化，字母排列順序也是可以改得更有效率，可是消費者已習慣如此，便繼續這麼使用。

如果可以避開路徑依賴，大多能讓國家持續發展，但是突如其來改變制度，有時候也會招來反抗。我們來觀察 iPad、維基百科、能量飲料、迷你個人網站（Mini Homepage）、蒸氣吸塵器等等在國內、外備受歡迎的商品或技術。雖說是成功的商品，卻並非全是具備打破常規的技術與點子。在看似不會再有任何創新或發展的領域裡，還有很多商品藉由小小的創新帶給顧客感動，進而掌控市場。它們的共同點是什麼？當然技術或性能都很卓越，但是它們與「路徑依賴」的歷史對話且誘導變革，在做出變化的同時也為顧客著想，盡可能降低他們的不便與轉移成本。

諾思批判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開發中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所提供的援助，僅止於單純地移植已開發國家的制度。即便導入了一模一樣的制度，也因為每個國家建構成員的信賴與信念體系不同，所以經濟成果會不一樣。決定經濟成果的，不只是政府透過人為計畫制定的實證法型官方制度。在社會成員的相互作用下而自然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例如習慣、公共信賴與態度、道德等，是透過長期經驗形成的文化。諾思熱衷於分析非正式制度，因為這些已經與社會一體化的文化，對經濟成長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但它們變化的速度非常緩慢，也很難以人為改變。有些分析指出，因豐富的天然資源而招致許多人羨慕的中東與北非國家，其經濟力低的原因在於伊斯蘭宗教文化。

諾思認為人類擁有有限的理性，所以對事物信賴的結構可能被扭曲。最終，長期的經濟成長，取決於社會成員的信賴、規範、共同偏見、相同的非正式制度、反映這些的政治經濟制度等事物，有多靈活

又正確地隨著社會和經濟的變化而改變。他強調自然生長又漸進式的制度變化。當我們要拋棄既存標準、轉換成新標準時，如果相關利益很龐大，即使政府不介入，這個標準也會自行改變。主導改變標準的力量是市場競爭，最好的現實案例是推開類比訊號而登場的數位訊號，取代有線電話的行動手機也是類似的案例。市場競爭會依據進化論的自然淘汰與適者生存之原則選定標準。

諾思為了理解信賴如何成形、生活方式如何在制度制定的框架中形成，他將神經科學結合到自己的研究。這也是為了有系統地瞭解大腦神經構造在塑造信念體系、使之改變的過程是如何運作。

## 制度要與歷史、文化相結合

根據諾思所言，規章與租稅的負擔越少，經濟自由越多，就越能確實保障財產與公平的競爭，便能達到繁盛的經濟。接著因為人類受到影響，所以財產保護、勞動市場規範、租稅負擔體系等，各式各樣的指標被當作檢驗清單，用來預估一個社會未來經濟成長水準。諾思在書中將沉睡的歷史與數據結合，重新解析經濟史，因此也被人評價他藉此準備好了在與未來的經濟發展指南。在這之前，經濟史被認為只有與經濟學或實際經濟多少無關的歷史學家的研究資料。就這樣，他把無生命的資料放入電腦裡，與經濟計量相連結，恢復了過往歷史的生命力。他串連了經濟與政治、制度、歷史並從中啟發，填補漸趨複雜的經濟結構，建構可設定政策方向的基礎，他的功勞自然獲得充份認同。從諾思身上，流露出與其他經濟學者不同的「熱愛歷史又獨創性的香氣」。

有人可能會問，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在一九九〇年提出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意圖以美國式市場經濟體系來解決南美國家的經濟危機，為什麼會失敗？華盛頓共識包含稅制改革、貿易與投資自由化、解除管制，而失敗的原因與諾思的制度原理是一脈相通。將華盛頓共識移植到沒做準備的國家裡，招致了南美的外債危

機。也有批評表示，美國的資本與企業把全球經濟系統打造得容易讓自己進出，所以華盛頓共識是為了增加美國利益的技倆。雖然《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是在移植華盛頓共識之前出版，但是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這本書中，作者哭訴了中南美洲附屬他國的悲傷歷史，並強調為了切斷孤寂的連結，人民要扔掉「一切都是宿命」的思維。

因為諾思把經濟成長過程套用了一般化的原則，所以他的主張也遭人批評為太牽強。初期已開發國家可以達到高度經濟成長的因素不是自由貿易，而是多虧了以重商主義為基礎的貿易保護，所以有人主張把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視為絕對的善意是不合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與其說是依靠自由的市場經濟，更主要是藉由國家主導的工業政策，才有顯著的經濟成長。諾思的說法跟經濟學課本主張出現分歧。而經濟成長初期，民主主義與經濟成長是否一定會形成對立，這個問題也成為爭論的話題，因為韓國在民主化之前就由國家主導達到超高速經濟成長了。不過儘管有上述例外，一般還是很難否認誘發動機的自由與競爭、私有財產制度的發展，促進了人類在經濟、社會層面的高速發展。

## 信賴救活了經濟

在相互廝殺的全球市場裡，企業為了好好地活著，不應該當攻擊者，而是要當先驅者。可是有人會說：「我們的制度是否已經清楚意識到先驅者需要承擔風險，實在是令人懷疑。」社會的整體系統，包括法律、制度與習慣等等，都應該要保護先驅者。新技術與新產品需在法律規定的允許範圍內發展，所以我們需要努力建構不阻礙他們的規範環境。

韓國政府選定各地方可做好的策略產業，並量身訂造地廢除可能成為該產業成長絆腳石的核心規定，這才是正確的作法。很難在以全國為單位進行的放寬制度，單一方式也很難一體適用在全部產業上，

因此選定各地區的策略產業後並一次性放寬制度，可以刺激經濟活躍。

如果限制一定的地區，把該地區選定的策略產業作為放寬制度的對象，屬於該產業的企業們就會開拓新的產業版圖、提高經濟活力嗎？不管怎樣，為了國家的永續發展，以成熟的制度為基石，增進有競爭力的技術創新與社會資本的信賴，才是最重要的事。設置路徑、以創造制度做為出發點是個關鍵，撤除路徑依賴的舊體系，讓企業不再停留在保護與安定的框架底下，大膽邁向世界。

### 【理論提出者】

道格拉斯．諾思 Douglass C. North, 1920.11～

他於一九九三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以經濟理論分析過去的經濟現象，並與實際經濟連結、說明的經濟史研究家。他受到經濟大恐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濟混亂期很大影響，畢生投入於「什麼東西可創造富裕的經濟呢？」研究課題，計量分析經歷長期歷史的經濟發展過程與「制度」的相互作用。他的思想被稱作制度主義革命，不僅是經濟學，也影響了政治學、法學等。為了開發落後國家，他給人們灌輸了必須要改變制度或信念系統（Belief System）的認知。

## 04 公共選擇理論

### ——政府不是「天使」

#### 超越歷史的戲劇性投票

投票是詢問社會成員意見的決議行為，就算不是在雅典廣場進行集會，大多數團體都會為了選出誰最適合帶領眾人而進行投票。古希臘的投票行為是成功又令人滿意的嗎？我想並非如此。雅典是直接民主制蓬勃發展的城邦，而在雅典劇場裡上演的悲劇，都是為了啟蒙公民的手段。因為自我判斷能力不足的公民們，即使手握權力也多會淪落成眾愚政治（利用多數愚蠢民眾的政治），所以需要持續練習走向真正的民主主義。透過劇場表演教導公民正確的民主主義，讓表演成為另一種「學習教材」。

從那之後過了長久歲月，這段期間希臘也進行了決定經濟意見的重要公投，但「悲劇教學」可能沒有發揮其學習效果，希臘總是發生悲劇。一九九九年，希臘透過窗飾會計隱匿財政赤字與債務比率而加入了歐元區。一成為使用歐元的國家之後，希臘貨幣的價值便上升，信用評等也提高了，但這與賜死蘇格拉底的毒酒沒有不同。

之後，希臘實質上陷入債務違約狀態，於是針對是否接受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中央銀行提議的金援案進行公投。被視為歐債危機主嫌的希臘，最終以「沒錢所以沒什麼好怕」的形象玷污了雅典神殿的名譽。國家一旦缺錢，就會限制自動提款機的吐鈔量，使得人民無法盡情提款。接在二〇一五年公投後舉行的大選，由反對摶節方案的政權當選，但在與債權團體的協商中無法兌現競選承諾，接受了大部份的摶節要求。在這種情況中，希臘退出歐元區（Grexit）的火熱議題依然不減。



戲劇性的投票不只一場。二〇一六年六月，英國為了決定是否脫離歐盟進行了全民公投。出乎眾人預料，選舉結果是英國決定退出歐盟（Brexit）。啟動英國脫歐公投的卡麥隆（David Cameron）總理提出辭呈，他必須承擔分裂社會輿論的責任。希望英國留在歐盟的年輕人，則抗議老一輩為了獨善其身而踐踏年輕人的未來。有人評價這個結果是仇視外來移民的感性大於經濟實質利益的理性，也有人說這是工作被搶走的中產階級透過投票來表達抗議。這場效應是否會影響到其他歐洲國家，大家都拭目以待。

日本目前也有一股讓人深思的趨勢。安倍總理原本預計於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度調漲消費稅的計畫確定延期，理由是景氣惡化，很難再執著於原訂的「無條件調漲」計畫。在提高消費稅之後進行選舉，會對執政黨很不利，因此他們更需要利用延漲消費稅當作修憲的布局棋子。

主要大國的經濟決策多是透過投票決定，所以說許多經濟相關法案或決議是受到民選代表影響，一點也不為過。

## 多數決原則並非萬能

政府實施經濟政策時，通常會聽取輿論意見，問題是公民透過公開討論而對國家大事達成共同的協議，未必是最棒的解決方法。各種利害關係者歷經相互妥協的過程後得到的現實答案，我們當然要尊重，但是投票結果能正確地反映民意嗎？可能並非如此。請想像一下，我們要從A、B、C三名候選人中，投票選出一位總統。四十%的人民支持A，但是有六十%的人民絕對反對A；這六十%的人民認為只要不是A，B或C都可以。在這種情形下，如果這三位候選人要舉辦選舉，A會獲得四十%的票，B與C各自獲得三十%的票，依據多數決原則，可能會發生A當選總統的情況。

當候選人為兩名時，多數決原則的投票制度可發揮其功能，但是當候選人為三名以上時，就可能無法正確反映出人民的意思。實際

上，二〇〇〇年美國總統大選時，綠黨參選人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在最大的搖擺州佛羅里達州獲得了約九萬五千票，這成為決定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與艾伯特．高爾（Albert A. Gore）勝負的變數。在擁戴納德的選民之中，他們的次要支持人選多半是高爾，這導致納德削減了高爾的得票數，造成最後由布希勝出。類似的狀況也出現於有政策替代方案存在的情形。光是改變政策與提交議案的順序，就有可能造成投票悖論（Condorcet Paradox），出現完全不同的選擇結果。

主張「多數決原則不是萬能」的投票悖論，是由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政治家兼數學家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所提出。假設有A、B、C三名候選人並對他們進行民調，選民中有三分之一對候選人的偏好是A B C，另三分之一是B C A，剩下的三分之一是C A B。在這種情形下，A與B對決時，A獲得過半數的票（A B）；B與C對決時，B獲得過半數的票（B C）。那麼A與C對決時，又會怎樣呢？前面提到A B及B C，我們自然會以為是A C，可是實際上A與C對決時，C會獲得過半數的票。

隨著如何排列候選人順序投票，會發生結果也隨之改變的問題。如果問題是由過半數選民討厭的候選人勝出，那麼人們可能投向稍微不太滿意的候選人。重點在於當候選人很多的時候，必須進行多次投票，這種制度稱為兩輪決選制。當無法決定當選人時，由得票最高者的兩位再次選舉。

## 不是政客壞，而是政治制度出錯

詹姆士．布坎南是揭露民主主義投票制度存在矛盾的經濟學界代表性人物。根據他的想法，選民、政府都追求著自我利益、效用極大化；以受到所得、權力與名譽等自私心態驅使來看，政府也與市場參與者沒什麼不同。自由主義者的布坎南是個捏著自己鼻子，朝著政府警告「你散發一股肥胖患者的糟糕味道」的人物。

布坎南主張「政治失敗」是要比「市場失敗」更加可怕的东西。請回想一下我們都聽過的羅馬時代兩位歌手的故事。有兩位主張自己才是最會唱歌的歌手在吵架，吵到最後接受皇帝的審判。一位歌手先唱歌，聽了他的歌聲之後，皇帝連下一位歌手的歌聲都不聽，便把獎給了下一位歌手。這是因為先唱歌的歌手沒能讓皇帝滿意，但事實上，下一位歌手是近乎音痴的人。在這則寓言中，先唱歌的歌手是自由市場，另一位歌手是政治過程。布坎南以這則寓言，警告重視政府角色的經濟學者需冷靜地觀察政治現實，不應像這位皇帝做出愚蠢的事。

人們抨擊無視國民利益的政治人物，可是一到選舉時又會把票投給他們。這種行為是理性的嗎？布坎南主張，在責怪政治人物的錯之前，要認知到政治人物無法確實盡其本份是起因於政治制度；民主主義讓擁有投票權的選民不得不選出這種政治人物。布坎南認為人們只要是免費的都會很喜歡。人民大致上喜歡政府增加支出或降低稅金，但只要政府想從我口袋中多拿走一點錢，人民就會憤怒，例如韓國二〇一五年時的年終結算改革之亂。[20](#)

在必須獲得選民人氣、支持的政治圈裡，金錢等同是生命。因此布坎南發現，政府會為了吸引選票而爽快灑錢，立法院則會設立有利於權威集團的特惠法案、有差別待遇的制度，而非一體適用的法案。政治家明知這樣的政策不好，卻還是這麼行動。公民對這些的反應又是如何？全世界的公民們皆指責政治家這種偽善行為，表達出對政策的失望與不信賴。布坎南對這些公民提出忠告，他說政治人物做出偽善行為的原因不是品性差，而是因為政治制度有誤。他表示大部份先進國家之所以會受困於慢性財政赤字，是民主政治制度有問題，並創造了「赤字中的民主主義」（Democratic in Deficit）一詞。

## 選舉支票造就世代矛盾

義大利的人民非常不信任政治，當局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便隨意管理國家財政。政策制定者都認知到財政營運不可能這樣持續下去，

必須按照《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整合歐洲政治、經濟、貨幣的歐洲統一條約）的規定，努力將財政赤字規模維持在G D P的三％以內。於是在一九九〇代中期之後，義大利G D P中的政府負債規模慢慢減少。

問題是，義大利的財政健全化措施並未提升國家競爭力，負債規模縮小主要是透過政府收入增加而達到，其中多半來於自稅收增加，而且是大大依賴提高薪資稅率。此外，義大利也減少了支出，主要是削減用在社會基本建設上的費用。勞工因為承受過重的稅金壓力而降低工作意願，而因為公共投資減少，社會基本建設日漸老化，義大利經濟的競爭能力也隨之惡化，這讓義大利人很悲傷。

「如今政府說他們正在全力進行整體結構調整，人民必須承擔縮減年金。不過，沒變成像希臘那樣，我就該滿意了。至少我們不是隨著海洋漂泊的無錨船。聖塔露西亞～聖塔露西亞～」

布坎南提到的預算赤字是後代的負擔，他預測這將會招致日後世代之間產生矛盾。我們暫時來看一下點燃世代矛盾的法國某M V內容。[21](#)

年輕歌手們先是這麼攻擊老一輩：「你們擁有一切，和平、自由、全民就業等，我們卻遭受失業、暴力、愛滋之苦。」

老一輩歌手則反駁：「我們擁有的這一切，全是靠我們努力而來，你們也必須行動。」

這首由年輕人吶喊著「活在沒有未來的世界」歌曲真是令人起雞皮疙瘩，它是由經營食物銀行的公民團體製作，希望藉此籌措援助基金，但也點燃了法國的世代矛盾。年輕一輩的生計問題無從解決，便怪罪享有富饒經濟的老一輩，且透露出自己的不滿——「為什麼你們把社會搞成這副模樣？」反之，老一輩則是訓斥年輕一輩依賴成性與懦弱。

進入低成長時代，世代矛盾成為非常重要的社會問題；老一輩與年輕一輩之間缺乏溝通，阻礙了社會發展，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年輕一輩提出的原因之一，是政治人物為了選票而埋首於提出讓老人受惠的選舉承諾。有些年輕人從人口分佈來看，判斷自己無法贏過中年人與老年人，出現了自暴自棄的現象。對於年輕一輩擁有這樣的沮喪感，老一輩與政治界必須好好反省。

## 一起滾木立法的國會議員

布坎南的思想是二十世紀中期後的產物，那是政府因市場失敗而介入市場的旺盛期，當時主流經濟學家完全沒有警告政府介入市場會招致危險。財政赤字增加，布坎南定義這種情況為「因憲法混亂導致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狀態」（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布坎南所感歎的是，現代社會所有國家的憲法都欠缺有效限制政府恣意行使權力的機制，於是政府拋棄原則政治（Politics of Principle），依照政治上的利害關係來管理預算，也放寬貨幣、隨便立法。於歐洲再次經歷財政危機，各國負債持續增加的現今，試著品嚐布坎南的思想是有其價值的。

布坎南也提出投資制度中的滾木立法（Log-rolling）爭議。滾木立法是指政治人物在支持彼此的角度上，進行選票交易或選票互助的行為。這個用詞源自開墾者要搬運採伐的原木時，會相互合作幫忙滾木頭。例如，政治人物 A 和 B 達成協議，他們可能約定剛開始由 A 協助 B 的法案，下一次則由 B 協助 A 的法案，這是他們交叉著一起滾木頭的行為。或是 B 先幫 A 之後，B 期望以所謂的「副報償法」（Side Payments）獲益，例如下一次 A 要幫忙 B 競選，或讓 B 進入他屬意的委員會。國會多數黨的議員們聯手輪流通過有利於自己選區的政策，這便是滾木立法的目標。

透過滾木立法而通過的政策，若是比起國家利益更加代表地區利益的話，便扭曲了選舉的結果。藉滾木立法而聯手的國會議員多是屬於同一政黨，該選區選出國會多數黨的議員的話，其選區住民獲得福

利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人民會把票投給有很高可能性成為多數黨的該黨候選人，想獲得利益的欲望也變大。這也是為什麼只有到選舉時刻，才會到處出現政治人物積極關懷選區的現象。

## 中間選民造成的政策扭曲

當選舉最大的話題是就業問題與強化所得再分配機能之時，重視財政健全性的經濟學家主張要留意可能招致財政赤字擴大的「中間選民理論」（Median Voter Theorem）。如果低收入戶普遍對擴大公共支出很寬容，在多數決的投票制度中，將會反映出中間選民的喜好，這也是為什麼公共支出持續增加的原因。這裡所謂的中等所得層，是將所得從最高排到最低後位於中間值的人。

我們來看看兩黨體制的投票狀況吧！當人民對各式各樣的替代政策各有程度不同的偏好，兩黨為了獲得過半票數會傾向去爭取中間選民，而非提出固守基本盤的政策。國會選舉之所以會重視中間選民，是因為這麼做在一人一票的多數決投票制中有利於獲得選票。但如果政策焦點瞄準中間選民，黨內基進選民的意見將無法反映在政策上，所以他們會傾向拒絕投票。在民主主義國家裡，中間選民傾向選擇轉移有錢人財富、增加自己福利的政策，所以中間選民理論也能解釋福利支出的增加。

當然，在多黨制下能夠呈現出差別化的政策，因此中間選民理論所造成的扭曲可能不會那麼顯著。中間選民理論中重要的是「究竟選民是否具有代表性」。萬一大多數人有著極端的喜好，只有一個人站在中間值，這樣會如何呢？根據理論，將會選出只有一個人滿意的人事物，大多數人喜好排行榜中最高的人事物不被選上的可能性極大。在行使一人一票的民主主義裡，無論有錢人或窮人都同樣有著一票的行使權，因此位於所得分配的中間值的人很可能會掌控選舉結果。

最近因全球兩極化，所得集中於最高收入層，導致出現所得中間層的所得開始低於平均值的現象。接著出現主張各國政黨要關注所得



分配均衡的問題，而根據中間選民理論，這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議題。在民主主義的美名之下，依然存在被世人以恣意妄為來指責的民粹主義問題。吸引選票的選舉承諾，可能同時造成妨礙資源進行最適當分配的市場失敗，以及導致財政赤字的政府失敗，所以我們必須檢驗他們是否備齊實現宣言（選舉承諾）的資金。對於政治人物開的選舉支票，也有人主張必須賦予人民可以要求閱讀獨立機關的分析資料之權限。外部機構需要公開針對投入大規模預算的政策進行評價，政府部門或相關機關也應當客觀地計算選舉承諾的財政所需並公開出來，這樣才是正確之舉。

把持續性財政赤字視為惡事的布坎南思想，給各國憲法帶來不小的影響。瑞士憲法規定稅率調漲上限與支出限度，德國透過修憲實施預算赤字上限與競爭式聯邦主義，瑞典修憲以利於自由市場等，這些防止國家濫用權力而做出保護個人自由與財產的措施，皆是受到布坎南的影響。選舉就是這麼困難的經濟決策行為。

### 【理論提出者】

詹姆士·布坎南 James M. Buchanan, 1919.10～2013.1

他因整理了談論以經濟學分析政治決策的公共選擇理論結構，於一九八六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個理論是說政治人物、官僚、選民皆為了自身利益行動，因此容易發生政府失靈。以前的經濟學家們暗地裡認為政治決策過程是政府善意的行為，但是布坎南透過公共選擇理論分析指出這是錯誤的幻覺。他在一九六二年與戈登·圖洛克共同著作的《計算共識》（The Calculus of Consent）是公共選擇理論的經典，在這本書中，他提倡即便是政治選擇，也適用於經濟學方法論的效用極大化模型。

---

20 韓國於二〇一五年推出稅改方案，意圖解決韓國低生育率和老齡化等問題，涉及未婚人士、多子女家庭、生育和領養、養老金繳存比例等方面，但未婚職場人士的稅金不減反增。

21 歌名為〈Toute la vie〉，意思接近「整整一生」，歌詞被認為有抹黑青年之嫌。



# Chapter5

## 技術與創新造成的影響

Technology & Innovation

# 01 雙邊市場理論

## ——夜店和Google的共同點

### 在虛擬世界蓬勃發展的雙邊市場

有個地方聚集了許多擁有各自故事的人，有人被分離的不捨偷走眼淚，有人懷抱著上路的激動，這個地方是火車站的月台。把報紙比喻成月台的話如何呢？商人為了賣商品而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儘管新聞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報導給讀者，但是光靠訂閱、購買報紙的費用無法收支平衡，所以報社需要廣告收入。彼此目的不同的讀者與廣告商，到訪了提供報導內容的新聞月台。報紙市場像這樣設置了消費者可成為使用者、亦能成為供給者的服務場地，進行著所謂的平台商業（Platform Business）。這個市場做為讀者與廣告商兩個有差異的集團間之媒介，因為必須考量兩種客群彼此購買內容與廣告等不同商品的需求，所以這又稱為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

我們普遍知道的市場存在著需求者與供給者，並且是個可以購買、販賣單一商品的地方。通常市場不是彼此以消費不同產品為目標而使用平台，而是讓彼此接近單一商品或服務的單邊市場。最後，雙邊市場的定義是以一種平台為中心，存在兩種以上不同的客群，他們透過這個平台進行交易。讀者與廣告商透過報紙版面的平台相互連結。在平台上，讀者偶然接觸到廣告商的商品廣告，便成為廣告商的交易對象。兩種客群在平台上相遇，進行販賣、購買產品的行為，創造出新的附加價值。廣告商會為了擴展客源而找上擁有許多讀者的報紙。正如收視率很高的電視劇播出時間的廣告會全數賣光，報紙也必須以優良內容吸引、聚集到更多讀者，才能對上廣告商的口味。如果廣告商有機會向更多讀者推銷商品，他們會願意付更多錢買廣告；與之相呼應，這也成為報紙降低定價的誘因。

在這個層面上，雙邊市場是存在著收受補助金的集團（讀者）和出錢的集團（廣告商）的市場。除了報紙市場以外，還有哪些雙邊市場呢？另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是信用卡公司，它是特約商店與信用卡使用者的媒介。資訊傳播科技的發達，讓雙邊市場得以擴大到虛擬空間，平台商業在網路世界繁盛發展，誕生出無窮無盡的新商業模型。

美國股市裡，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和蘋果不相上下，爭奪著市價總額第一名寶座；臉書也對自身市價總額排名優異額感到自豪。他們都是以低成本創造出高收入又非常有效率的公司，之所以可以做到這種程度，是他們建構了非常成功的平台策略。平台理論不只應用在經濟學中，也能解釋企管系的市場行銷與經營策略中企業的價格政策與生產策略，它被廣泛地運用。

## 平台市場和夜店的網路效應

為了理解平台市場，我們來一趟回到幾十年前的時間之旅吧！回到二十幾歲的時候，真是令人開心啊！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首爾江南站的夜店為了留住客人，拉客競爭曾盛極一時。所謂夜店生意是提供男女聚集的場所，並主導他們即興聯誼藉此賺錢，不是嗎？假設有幾位和當時火紅的女藝人金喜善、金惠秀長得很像的女客人，那麼對那家夜店來說她們可是個驚喜。漂亮又身材纖細的女性當然可以免費入場，她們成為夜店的誘餌商品，所以在夜店裡可享有許多福利。許多男性客人為了看這些女客人而擠得夜店人山人海，託她們的福，夜店能數錢數到手軟。仔細觀察平台商業的話，會發現它其實有著和夜店相似的構造，因為可以藉由客人們擴大平台，吸引更多其他客群。追求報酬最大化，正是平台商業的本質。

奧多比公司（Adobe Systems）為什麼要免費提供程式呢？這正是為了讓出版社盡可能接受、使用他們的程式作為出版平台。此時，出版社就是夜店裡的漂亮女客人，讀者則是為了看她們而跑來的男客人。奧多比瞄準的是如果越來越多出版社使用他們的程式，便能確保更多客人上門的效應。

有多少人為了產品或服務本身的品質而來使用這個平台市場，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如果某些人對特定商品的需求影響到了周遭人等，會出現選擇該產品的客人增加現象，這稱之為「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網路效應使得生產規模擴大，生產者也因此獲益。越多人使用，生產者就越能因為規模經濟而降低成本費用，也會藉由網路效應更增加使用者數量。網路效應透過技術發展更加擴散，因為技術發展會減少生產費用，所以產品價格下降、性能提升，把消費者拉進市場的速度也提高。

某個外賣 A P P 的廣告台詞這麼說：「我們是什麼民族？我們是外賣的民族。」

外賣 A P P 減少了我們一一拿著外賣菜單，煩惱著要吃什麼的辛苦。在這個市場，存在著透過 A P P 下訂外賣食物的顧客，以及外送這些食物的餐廳。他們透過平台進行交易，平台則在中間收取手續費、獲取利益。啊！光是靠這樣的媒介就可以賺到錢，我好想知道其中的秘訣。Google或蘋果皆不是由公司內部工程師開發在自身平台（App Store）販售的程式，而是由第三方開發者處理。需要 A P P 的顧客使用（購買），產生的收入由他們與開發者分享。如果把幾十年前江南夜店賺的錢與現在全球化世代下的媒介所賺收入相比，你會覺得夜店賺的錢實在微不足道。

假設Google和蘋果發表了一項創新，夢想能夠功成名就的 A P P 開發工程師們會自發性地開發 A P P，想要登記上發行平台。結果是，只要蘋果或Google都持續朝創新方向前進，開發者們就會運用這個平台，或是以另一種創新方式回應平台，這便是平台市場的擴散秘訣。

## 競爭、壟斷與大數據

石油大王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經營的美國標準石油托拉斯（Standard Oil Trust）實施壟斷，造成當時老百姓的

生活疲累不堪。他在一八七〇年以一百萬美元創立了這家公司，幾乎負責了美國國內石油生產、加工、販賣與運送，於一八九〇年在美國市場占有率達到約九十%。洛克菲勒家族收買公權力、隱匿鎮壓勞工事件，還藉由捐款與回饋社會偽裝出良好形象。但是他們為了提高市場占有率，展開了沒血沒淚的價值競爭策略，社會對他們的壟斷型企業表達了憤怒。

接著在一八九〇年，俄亥俄州參議員約翰．薛曼（John Sherman）說：「如同我們不希望政治體制採用君主制，我們也不希望經濟體制採用壟斷。」並制定了休曼反壟斷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瞄準了壟斷型企業。洛克菲勒為了躲避休曼法案而把企業轉變成子公司體制，並與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進行了一場彷彿電影《龍爭虎鬥》中命運般的一決勝負。一九〇六年標準石油公司因涉嫌違反休曼法案遭到審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命令公司解散，該公司最後遭遇四分五裂成各家公司的悲傷下場。如果我說最近Google勢力威風凜凜的情況可與標準石油比較，這種話算誇張嗎？

有關搜尋引擎市場王子Google的壟斷紛爭正在持續延燒。歐盟執委會針對雄霸歐洲搜尋引擎市場九十%的Google與搜尋引擎廣告改善案，進行了好幾次激烈的唇槍舌戰。Google搜尋的最大問題，是總將自家產品放在搜尋結果第一位，包含微軟等其他競爭公司皆對Google搜尋結果的不正當行為提出訴訟。因Google強制在安卓系統手機上搭載自家地圖搜尋等軟體，俄國聯邦反壟斷局裁定其違反了反壟斷法。在韓國被NAVER與DAUM擠下去的Google，也於韓國手機搜尋引擎市場裡快速躍進，因為安卓系統的智慧手機預設就搭載了Google搜尋，使用者不斷攀升；Google收購的影音網站YouTube與Google地圖等服務，也都預設搭載在安卓系統的手機裡。韓國人如果想要使用NAVER或DAUM搜尋，必須從安卓商店下載軟體安裝，但是Google搜尋可以馬上使用，故有人主張這是對競爭對手的差別待遇。也有人指出，為了不讓Google濫用手機市場的支配力，國家必須制定對策。

不管怎樣，在全球市場裡擁有最強大占有率的Google，是雙邊市場最代表性的例子，現在它還進軍汽車業等市場，其勢力正威震四方。以Google的立場上來看，使用搜尋引擎的網友們是領取補助金的客群。Google向廣告商提供廣告服務，藉此籌措經營企業的資金。他們的高市占率以及對網友的強大影響力吸引了廣告商，所以一邊創造出利潤，一邊哼著歌。這就像是介紹Google企業文化的一本書名：Google的早晨是始於「賺錢的自由」。

Google或臉書等企業的競爭方式與傳統企業生產商品、提供給消費者的機制不同。「如何管理市場主導者」成為政策當局的問題，原因在於平台市場與傳統市場不同。客人們使用Google搜尋及臉書時，與在傳統的市場裡找商品、找朋友一樣不需付錢。對此有人可能會這麼說：「你傻瓜啊！你說使用臉書不用付錢？你不知道你使用臉書的瞬間，自己就成為臉書的商品嗎？問題在於雙邊市場的屬性！」

這是什麼意思？蘋果有相當多的收入來自A P P商店。A P P開發者會考量到iPhone使用者的喜好，而iPhone用戶也會考慮購買iPhone可搭載的許多A P P。在雙邊市場裡，獲得補助金的客群越多，平台企業的競爭能力就會因網路效應而更強化。Google與臉書分析客人提供的大數據（交易資訊）後，可以在廣告市場創造出新的附加價值。臉書放眼搜尋引擎相關的廣告市場為大好商機，於是向主導搜尋引擎市場的Google宣戰——大數據戰爭。說不定顧客們都在不知不覺之中，助了Google和臉書一臂之力。儘管使用平台不用錢，但它也不是全然免費。在雙邊市場中，企業不會為了擴大顧客基底而讓錢集中在單邊的市場，這便是屬於他們的策略。反正就算臉書使用書多增加一名，臉書必須支付的邊際成本還是零。

## 全球經濟的遊戲規則已經改變

讓·提霍勒於二〇一四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產業組織理論與賽局理論大師，畢生研究如何設計競爭與公平交易政策的規章，並提供理論框架讓政策當局處理壟斷市場問題。他主要的研究領域之一

是雙邊市場平台。在市場結構壟斷化再次成為全球重要問題的當下，他的研究值得大家關注。提霍勒提出理論框架讓政策當局得以處理企業市場集中度，我們試著把他的研究套用在雙邊市場上吧！

提霍勒明確地以理論提出，在雙邊市場裡形成價格的原理與完全競爭市場不同。他認為在雙邊市場中很難制定出正確的價格，因此他主張當政府判定有不正當或非法行為，像是雙邊市場企業濫用市場優勢地位、操縱價格、不公平交易行為等狀況時，必須套用與單邊市場不同的標準。這正是提霍勒被獲頒諾貝爾獎的理由，我們來聽一下瑞典諾貝爾委員會的想法。

「提霍勒解釋了在管控市場的壟斷上，什麼樣的政策在特定情況下運作順利，在別的情況下又會出現什麼缺點。他用理論證明了一般的管控原則在某些條件下有效果，但是在其他條件下是利大於弊。」

在單邊市場裡，大企業會使用一種稱為「掠奪性定價」的策略，把商品價格設定得比邊際成本更低廉，等到競爭企業被逼出市場之後，再重新提高價格、彌補損失。這種策略也可以套用在雙邊市場嗎？對於在雙邊市場裡低廉定價的行為，提霍勒說這不是掠奪性定價，給了這種行為免死金牌；他說這是企業為了利潤最大化而制定的正當價格。以結論來看，他像是跟Google這樣的平台企業站在同一方。雙邊市場的兩個客群中，當某一方提供的價格比邊際成本還低或免費，甚至可能是送錢給對方的賠本價格，這是因為他們可透過網路效應從另一方取得利益。

假設夜店在平安夜邀請了長得像韓國人氣女子偶像雪炫或子瑜的女性，她們當然不需要付入場費便可進入夜店。多虧了像雲海般湧入的男性，夜店狠賺了一筆。這家夜店把客人一掃而空、招攬進自家店裡，所以我們可以判斷這家店是需要被限制的對象嗎？根據提霍勒對雙邊市場的理論，我們不該管制這家夜店。縱然Google向消費者提供免費的服務，也可以獲得龐大的利潤；因為他們沒有向客人要一分錢，所以在價格層面上找不到他們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的行為。這個說

法仍有爭議，因為在提霍勒的論文中，他並未明確指出如何管制有關係這樣在雙邊市場中的市場主導行為。

在雙邊市場中，企業們可以採取各式各樣的策略。提霍勒主張政府在管制壟斷的行為時，比起標準的規範，更應該按照市場的多樣特性實施差別化政策。市場主導者為了阻擋新企業進入市場，也會提高進入障礙（Entry Barrier）。當有新的企業進到Google掌控的市場，Google為了阻止市占率流失而積極構築所需壁壘時，管制當局該如何規範Google呢？我們不能放任消費者選擇權受限而不管吧？

在提霍勒之後，許多經濟學家與企管學家開始研究雙面市場與平台的運作方式，我預期不久後將出現有關反壟斷的新觀點研究。過去這段期間，韓國的經濟成長奠基於電子、造船、汽車等傳統製造業。在討論如何管制雙邊市場之餘，全球經濟正在快速重組為以平台為基礎的經濟，平台商業的影響力逐漸擴大到足以威脅現存的製造業。遊戲規則已經改變，現在正是我們應該省思是否有辦法妥善應對的時刻。我們經常說大企業很難改變成平台式的商業模型，意思是既存大企業製造出來的傳統機制，不容易轉變成平台機制，但我認為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分工合作就充滿了無限可能。擁有成功平台模型的風險投資或創業公司與大企業分工合作越趨重要，這也是未來的宿命。很會創新的小企業應該與可以觸及全球市場的大企業合作，一同建設更好的平台商業模型。

### 【理論提出者】

讓·提霍勒 Jean Tirole, 1953.8～

他畢業於法國頂尖教育機構「高等專業學院」（Grandes Écoles）之一的巴黎綜合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一九八一年在麻省理工學院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於一九八四年開始在同校擔任教授。一九九一年轉到法國土魯斯大學（Université de Toulouse）工作後，他在金融、總體經濟、經濟與心理、賽局理論等經濟學各式各樣的領域中，發表了許多具有影響力的論文。做為產業



組織理論與賽局理論的大師，他針對各別市場主體的策略選擇會產生何種結果進行深度研究，因此在二〇一四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关注公众号“松鼠读东游”

回复“1”领取付费资料

## 02 創新與不平等爭論

### ——人工智慧能否帶來偉大的救援

#### 被機器人取代的社會

「我們比起過去的人要渴望更多事物，即便可能因此而改變自己也不退縮，但現實卻是沒有絲毫變化，這造成了我們不斷地不安，也是我們欲望的代價。」

在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對於「不安」的定義之中，這是最打動我的一段話。工業革命之後，人類以「必須不斷進步」的焦慮感為動力，接連地發展、進步。資本主義為了自我提升而促使技術進步，人類生活的許多環節也變得富足，但我們為何比任何時候都對未來更不安、更不確定呢？有人說，這是因為隨著數位革命高速進行，搭配技術層面的發展，就業縮減的可能性變大了。請試著想像一下，因為與人類能力旗鼓相當或更厲害的人工智慧與機器人增大了生產，所以我們可以過上一個禮拜只需工作四小時的生活。這究竟是不是好事？

美國汽車公司特斯拉汽車（Tesla Motors）的創辦人伊隆·馬斯克（Elon R. Musk），當他創立非營利公司OpenAI時這麼說：「我們的目標是開發出可以幫助全人類的數位智慧，我們不會執著於賺錢的部門。過去這段期間，人工智慧研究和召喚惡魔沒兩樣，在掙脫人類管制狀態下的技術開發十分令人擔心。我們不該專注在可以取代人類的功能，而是必須致力開發可以補充人類缺陷的技術。」

人工智慧是Google、IBM、蘋果、臉書等全球IT龍頭一直致力開發的領域，但是天才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W. Hawking）在二〇一四年曾提出「人工智慧開發會招致人類毀滅」的恐怖警告。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也預估在二〇二〇

年時，在十五個先進國家與新興國家會因為擴大使用機器人而導致七百萬個工作消失，但也創造出兩百萬個新工作。圍棋天才李世乭一輸給Google設計的AlphaGo，世人爭辯著人工智慧已經擁有超越人類的能力，機械開始進攻人類固有的領域——智力勞動的世界。若是機械的能力凌駕人類，人類該在變長的生命中做什麼、如何生活？

有人說，人工智慧只不過是在圍棋界贏了人類而已，不要無限上綱。可是當你看到不會懈怠、擁有龐大資訊的人工智慧贏了人類時，你能不感到驚訝嗎？推崇人工智慧優點的人們，反對「人工智慧的發達會減少人類工作」這樣的主張。如果隨著技術發展，未來的就業市場也跟著黯淡是真的話，那麼早該在工業革命開始就變成那樣才對。以過去歷史來看，短期間會在特定領域裡發生失業現象，但是長期來看，創新會創造出更多新工作。機器人擁護者們則主張，機器人雖然會取代一部份低技能需求的勞工，但是它們也會提高生產力，為其他勞工創造出新的工作。因此，他們說沒有證據可證明機器人會減少整體工作數量，這個主張很吸引人注意。

## 四十七%的現存職業會消失

即便如此，近來的人工智慧與自動化發展，與過去的技術創新有本質上的不同，這種說法更具說服力。有人主張它們將深刻影響未來的就業市場，這讓人感到害怕。牛津大學研究團隊預估四十七%的現存職業將會消失，花旗集團則警告將有英國三十五%、美國四十七%、經合組織會員國整體五十%、中國七十七%的工作有被機器人取代的危險。

想像一下我們訪問了位於法國巴黎的阿德巴蘭機器人公司（Aldebaran Robotics），參觀了身高五十八公分的機器人N A O，它甚至可以聽懂人類非常可愛的說話口氣。在英國，它成為孩子的朋友，幫助自閉兒的治療；在日本它則做為銀行服務人員被廣泛運用著。在看到N A O成為很難與人建立關係的自閉兒的朋友時，你可能會覺得N A O比勢利心重、愛比較、經常抱怨的人類要好。而在雇主

的立場上，它可以工作二十四小時，比人類還聽話，不需要組工會、生產性又高，它擁有許多吸引人使用機械人的誘因。請試著思考機器人替代韓國主力產業電子、汽車、造船業裡的人類的景象吧。現在仍因就業問題而痛苦的我們，無法再隱藏對未來不確定性增加的不祥預感。

最近引進機器人的成本大幅減少，全球由機器人替代工作的傾向加重。根據波士頓顧問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分析，如果韓國正式使用機械人進行自動化，到了二〇二五年勞動成本可以減少三十三%。不過這跟二〇一六年由經合組織所公布的《自動化所導致之經合組織國家工作危機分析》報告呈現相反的分析，該報告表示韓國整體工作中的九%面臨著自動化危機，與其他會員國相比並不危險。經合組織以此為根據，判定韓國自動化任務執行比率低，這是因為韓國人整體上學歷高，所以嚴重受到自動化威脅的工作較少。

無論如何，機器人與人工智慧、3D列印、大數據、物聯網、奈米科技、無人駕駛汽車、無人機（Drone）等不斷冒出來的新技術，機器可以取代人類勞動力的「技術失業的恐怖」像海嘯般朝我們襲捲而來。我們早已目睹過了因技術發達而消失的工作，如果是屬於制式化又不斷重複的工作類型，很有可能被熟練的機器人與人工智慧取代，因為這種勞力活的部門人事成本大、薪資水準高，所以導入人工智慧的話可以提高經濟效果。連很會賺錢的金融顧問，也被分類為危險職業，因為隨著自我學習演算法的進步，搭載大數據的機器人有能力取代律師、會計師、醫生等高階人力。

## 創新招來成長與不平等

二〇一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曾經這麼說：「歷史上，新的創新會造就新的不平等。」

蘋果把能讓人類生活更富足的許多機器帶到這個世界，也因此他們成為富裕到難以想像的企業。迪頓評價他們是挺不錯的不平等現象

類型。他主張創新——亦即創造性的破壞——會招致新的不平等，在過去是這樣，未來也會是這樣，這種不平等無法避免。我們來看一下迪頓說的內容。

「蘋果把能讓生活更好的許多機器帶到這世界上，使用蘋果的機器，即便是在別的國家也可以和孫子們對話、看孩子們的照片，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喜悅。我也可以接觸到全球所有的書籍與音樂，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

迪頓雖然像這樣很正向地看待有利文明的器具，但是他也不忘提到因此而產生的不平等黑暗面。只有幾位富翁獲利的財閥政治世界可能會到來，而這擁有經濟權力的少數富翁階層統領的世界，也可能會帶來糟糕的不平等現象。另外他說，忽視帶領世界發展的正面動機、只把焦點集中在不平等現象的極端左派，以及瘋狂於維持既得利益而故意不討論不平等現象的極端右派，我們必須丟掉這些偏頗又狹隘的眼光。我們必須改變看待不平等現象的觀點，以維持平衡的角度去看，才能期望有個更好的世界。

「如果想要這世界變好的話，如果我所渡過的一九七〇年代美國夢是海市蜃樓的話，現在國家該思考要為國民提供何種程度的社會安全網法案。」

若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當真是以與過去不同的方式威脅到我們的工作，政府與社會應該要參酌迪頓的想法，絞盡腦汁建立對策，例如對機器人、人工智慧以及需要與這兩者分工合作的其他產業增加教育投資，藉此減輕自動化與人工智慧對職缺的影響。我們可以在芬蘭的案例中找到這麼做的理由。

## 創新教育讓芬蘭東山再起

一提到「北歐福利國家」就會讓人想到芬蘭，其經濟從二〇一二年開始多半呈現負成長。疲累不堪的人民們對執政當進行經濟審判，

最後由芬蘭中間黨所屬、五十幾歲的政治新人兼 I T 百萬富翁的尤哈．比拉（Juha Sipilä）當選總理。芬蘭經濟變差的主因，來自代表性企業諾基亞（Nokia）的沒落。於蘋果智慧手機登場之後，諾基亞進軍新興市場的腳步大大落後，其衰退導致芬蘭經濟一同停滯不前。諾基亞在芬蘭經濟裡舉足輕重，二〇〇七年的芬蘭經濟成長有二十五%以上要歸功於諾基亞。當時諾基亞占了芬蘭總輸出的二十%、芬蘭全體研發投資的三十%、法人稅的二十三%。二〇一三年，微軟收購了諾基亞的手機部門。親商國家芬蘭的經濟惡化到失業率快要超過十%。

芬蘭經濟會如此漸趨困苦的原因，我們可以從諾基亞的失敗與依賴外銷的經濟結構中找到解答。全世界用紙量因為手機裝置發展而減少，芬蘭的主要產業製紙業也越來越萎縮。芬蘭的 I T 產業與林業兩大支柱都倒塌了——iPhone 把諾基亞逐出市場，iPad 則減少紙張需求，使得芬蘭林業走下坡。芬蘭前總理亞歷山大．史塔布（Alexander Stubb）埋怨賈伯斯的故事依然膾炙人口。在諾基亞的沒落之中，因為芬蘭對特定企業的經濟偏重、出口為重的產業結構、對外能源依存度、急劇攀升的高齡化等方面皆可與韓國經濟相比較，因此引起許多人關注。然而芬蘭並沒有因此受挫，諾基亞的沒落成為促發芬蘭創業潮的契機。諾基亞一沒落，人們對 I T 產業領域生存的迫切感與危機意識變強，這種氣氛掀起了芬蘭企業的風險投資精神。

赫爾辛基理工大學、赫爾辛基經濟學院、赫爾辛基藝術設計大學這三所學校，於二〇一〇年合併為阿爾托大學（Aalto University），並基於「點子是最重要的」之創校理念，建立了設計工廠、媒體工廠、服務工廠、健康工廠四項跨學科合作空間，學生在這裡緊密合作，進行新研究與開發教育方法。例如在設計工廠裡，學生、教授和企業家會在共用平台上一一起開發值得創業的計畫並打造原型品。他們每天會進行一、兩個小時的上課或討論，對創業的熱情好比在三溫暖裡流淌的汗水。現役執行長與高階主管親自擔任創業指導，協助打造能讓學生們建構創業計畫、設立創業公司的環境；他們

有時還會一起分享創業失敗、計畫構想失敗等經驗，累積通往成功的資產。為了因應高齡化趨勢、巴黎氣候協議、數位時代，阿爾托大學將健康系統改革、建設低碳家園、勞動的未來（中產階層應對就業壁壘的對策）等視為主要課題。芬蘭政府認為就業問題與產業界有密切關連，這個問題若沒有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便難以解決。他們強調需要透過政府與產學研的分工合作，建設出能支持創新與企業家精神的公共建設。

諾基亞衰退後的空窗期，由一款叫「憤怒鳥」的手機遊戲填補了一定程度的虧損。穿戴裝置（Wearable Device）產業被稱為芬蘭第二個憤怒鳥，正準備大幅躍進。於創業風潮崛起的二〇一六年，芬蘭的諾基亞重振聲勢——不是透過手機，而是網路設備。諾基亞燃起了想以新世代網路與物聯網、雲端運算（Clouding Computing）來改善人類生活與環境的意欲。諾基亞藉由去蕪存菁的結構調整、縝密的策略、策略型併購，一度奪回通訊設備領域的全球第一寶座。他們從失敗中獲得了更大的教訓。

## 弭平人工智慧與人類尊嚴間的隔閡

為了應對人工智慧時代，我們又該做什麼樣的準備呢？一九九七年，西洋棋世界冠軍加里．卡斯帕洛夫（Garri K. Kasparov）接到了來自IBM的「深藍」（Deep Blue）」挑戰。他誇下海口，說「任何一台電腦都贏不了我」，最後他卻輸了。從那之後過了二十幾年，二〇一六年Google的AlphaGo在與圍棋天才九段李世乭的大對決中勝出，Google從中享受了巨大的宣傳效果，也獲得了龐大的經濟利益。在這裡，我們有必要探討幾個問題。

安格斯．迪頓主張經濟成長使人類逃脫貧窮與疾病，過程中會發生不平等現象，但是這種不平等現象卻發展成資本主義的基礎了。他認為過度的不平等是不好的，為了促進福利、減少貧窮，我們該用心留意個人的消費選擇，再制定經濟政策。他將持續性經濟成長視為可使人類脫離貧窮的一項偉大救援（Great Escape），並強調在現今經

濟裡，最重要又偉大的救援力量是來自創新。如同迪頓所說，人工智慧如果想成為使人類無限進步的偉大救援，是不是應該要具備「酷炫的創新氣味」呢？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提到人工智慧有助於對付氣候變遷、疾病治療與節省勞力，也可使人類生活富裕，但他們也警告人工智慧模仿人腦的危險性，這可能引發諸如基因工程學面臨的倫理問題。也有人擔憂這會招致在科幻電影中出現的反烏托邦世界，屆時人類別說要控制機器，我們還有可能被機器統治。機器人（Robot）原本是捷克語，意思是「奴隸」。奴隸逆襲站在比主人更優越的位子上，可以讓這種事情成真嗎？就像我們制定了禁止核武開發與擴散的倫理規章，人工智慧的開發不也需要相關規範嗎？

人工智慧是否能模仿人類判斷複雜情況的能力仍有待商榷。即使在無法避開發生交通事故的瞬間，人類會為了降低受傷而努力或做出價值判斷，所以可能做出救下人命的決定。縱然開發了無人駕駛汽車技術，無人駕駛汽車技術本身也無法做到有關價值取向的思維。所以在人工智慧的時代，法律、制度上有關倫理問題的對應並非看起來那麼簡單。開發技術的企業們為了解決接踵而來的倫理問題，必須同時進行許多的研究。為了避免人類的價值取向活動變得衰廢、人性尊嚴受損，我們必須不停地反問自己究竟是為何開發人工智慧，以及要怎麼使用它。

圍繞著人類與機器人的就業爭論會持續下去，可替代行業的爭議也會接著出現，其中電腦已經開始替代與記憶相關的工作了。除了只有人類可以做的事、需要細膩的技巧或能力的創意型工作以外，勞工的未來並不光明。如果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不會促使人類均衡地成長，使得財富只集中在經營者、股東、高級專業技師等特定階層的話，會怎麼樣呢？大部份的人會不會被迫休假、遭受低薪之苦？創造出新工作的同時，失去工作的人們找到新工作的難度有多高？大家都需要針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與思考。在此同時，瑞士針對「無關勞動



與否，皆給予每個人固定基本所得」進行公投，人民考量了國家財政而否決了。看來這場爭論會延續下去。

整體來看，我們應該打造出減少工作時間的社會，並為此做好準備、補充必要的部份才是最重要的事。既存職業消失的地區，與新職業繁榮的地區差距逐漸增加，所得不平等的標誌性用詞是「一％對上九十九％」，這種狀況如果持續下去甚至擴大的話，就算人工智慧是再怎麼偉大的救援動力，也可能帶來迪頓所說的不平等現象，我們必須多加留意。因為儘管它的名字叫創新，但當它通往使人類情感受挫的方向時，它會讓人類變得不幸。難道我們要像電影內容一樣，發展到甚至必須要和機器人做愛嗎？冰冷的人工皮膚，怎麼能跟人類溫暖的肌膚相比呢？

### 【理論提出者】

安格斯．迪頓 Angus Deaton, 1945.10～

以英國的個體經濟學家身份，致力於消費者行為分析與經濟開發、貧困等研究。他研究各種家庭的攝食量、居住環境、使用各服務的消費型態，並開發了一套需求分析系統。經濟學家通常偏重於總體經濟指標，迪頓則被評價為將視線轉向分析各種家庭的先驅者，他所開發、用來測量貧困與福利水準的工具被廣泛運用。他以個體數據為基礎的實證研究促使經濟學的發展，其功勞獲得認可，於二〇一五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現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 03 經濟成長理論

——「如何去做」比「擁有什麼」更重要

### 被細懸浮微粒遮掩的中國危機

有個國家的經濟成長達到如同二億五千萬人口的印尼之經濟規模——它正是中國。再小的船隻在轉彎的時候，都必須細心注意周遭以確保安全，如果是像中國這樣巨大的航空母艦的話，該怎麼辦？一直以來高速成長的中國，如今把速度降為中速，並在全球金融海嘯之後大刀闊斧地削除沒有效率的產業，轉換政策方向往結構改革。在以出口與投資為主的經濟成長下，減少投資比重、擴大內需成為中國的「新常態」。

國家債務占GDP值最大的國家是日本，可是如果只看企業的部份，中國的負債也很驚人。金融業除外，中國企業的負債比重是世界最高的程度。二〇〇八年金融大海嘯之後，中國藉由增加負債而主導著全球經濟成長。國際結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認為新興國家企業所發行的公司債券，有一半規模來自於中國企業。世界經濟對中國的情勢敏感，是因為擔憂中國經濟成長變緩、無力償還債券的可能性。

中國政府認知到這些風險因素，決定與其人為扶持需求，不如調整供給過剩。接著，他們為了掃去不結實的國營企業，透過併購快馬加鞭地進行結構調整，藉由擴大企業的生產企圖促進經濟成長，這樣的努力會持續下去。中國別無他法，必須改革製造業技術、培育服務業，不斷利用高附加價值產業打開資金的大門。鋼鐵與煤炭產業過去因為中國的過度投資，導致供應過剩，獲利能力也不符合，成為無效率的代表性產業；在中國政府強硬地進行結構調整並切斷支援後，中國主要幾家鋼鐵公司的董事長甚至選擇自我了斷。中國鋼鐵業的過度

投資也衍生出全球的供應過剩，這在二〇一五年也造成韓國鋼鐵公司浦項鋼鐵的獲利結構惡化。

請你暫時將上海的細懸浮微粒拋諸腦後，試著想像一下：為了享受上海夜晚五光十色的氛圍，你正坐在君悅酒店的空中餐廳。東方明珠塔和上海環球金融中心近在眼前，你接連讚歎著上海夜景比世上任何一個地方還要華麗。在享受美麗夜晚風景的人們之間，在黃浦江的美麗曲線與絢麗多彩的建築物光線間，可以看到悠然而過的遊覽船。你一手握著伏特加，朝窗外看去。經濟學家羅伯特·梭羅一臉微笑地坐在露天座位。

你很開心地走向梭羅，他卻這麼說：「在這裡能同時感受到被細懸浮微粒遮蓋住的中國致命性危險，以及驕傲地從江上流過的經濟成長氣息呢！」

和悠悠自得地從江上開過的遊覽船一樣，全世界正關注著中國經濟是否正在穩定發展。韓國是繼智利、臺灣之後，最受中國經濟影響的國家，因為韓國二十五%的出口依賴中國。

梭羅於一九五六年撰寫的《對經濟成長理論的一個貢獻》論文開發出「經濟成長理論」，因其功勞獲得認同，所以在一九八七年得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有人問他：「你認為三十年前發表的論文現在才獲頒經濟學獎的原因是什麼？」

他這麼回答：「嗯，因為我字太醜，所以要看懂我寫的字大概要花很多時間。」

梭羅認為比起視消費為經濟發展的基石，消費反而可能是把所得水準往下拉的原因之一。他覺得比起消費，增加儲蓄、累積資本才是對經濟成長重要的事。全球經濟持續呈現低成長中，連中國的經濟成長也放緩了，接著因油價與原物料價格下跌，依賴進口的新興國家經

濟也一同變得不安穩。全球消費不足的情況下，也有人貶低梭羅的主張，說他關注在提高生產，並感覺都集中在供給層面上，所以效果受限、內容也很老舊。那麼，現在梭羅的經濟成長理論再也沒有用了嗎？

## 過度儲蓄和投資成為問題

梭羅認為勞動、資本與技術創新決定經濟成長，如果短期的勞動與技術水準固定不變，則會隨著資本的增加而決定經濟成長。中國的高度發展也是在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因資本增加而達成，中國充份符合梭羅的經濟成長理論。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經濟成長驚人，人民一邊想著「讓我們過上好日子吧」一邊儲蓄；儲蓄成為資本，便衍生成了投資。可是，藥效都發揮完了嗎？中國因為全球經濟成長放緩與過度投資而疲累不堪，償還完利息就資金所剩無幾的企業變多了，企業的高負債、不動產泡沫化可能性也被人指責為危險的因素之一。

我想也是，中國過去三十年間不斷奔跑了過來，累積了許多的疲勞。因此中國政府表示，「現在來轉換過度儲蓄與過度投資的中國經濟成長模型吧！」，並把經濟放到手術台上，意圖將生病的地方切除，讓它長出新肉。所以從二〇一五年開始，如何將過度投資的部門進行結構調整，成為了中國的課題之一。

那麼，我們現在應該要扔掉梭羅強調資本重要性的經濟成長理論嗎？不行，因為全球勞動生產力減少的主因之一是投資減少。中國的情形與此相反，是因為過度投資，所以利用增加資本拉抬經濟成長有限。梭羅果然也認同在某種程度的成熟經濟裡面，光靠資本的累積促進經濟成長有限，並認為技術進步越快，經濟成長越能持續下去。還有，他不曾忽視過人口決定勞動規模的重要性。

## 總要素生產力的全面強化

過去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秘訣，很難片面斷定僅是依靠人民儲蓄而投入的資本，以及從農村湧入都市的農民工廉價勞動力。那麼，除了擴大勞動與資本的投入以外，又要如何提高經濟成長率呢？透過擴大生產就行。勞動生產力、資本生產力有著以評價勞動或資本等生產要素影響生產力多寡的概念，與此有所區分的是總要素生產力，其概念是當投入全部生產要素時，計算生產變化了多少。生產力是指如何有效組合各個生產要素，以達到最佳的生產之概念。總要素生產力在狹義上是指藉由技術進步來擴大生產力，但是從廣義來看，它不只侷限在技術的發展，還包括了企管創新、勞資關係改善、機械設備改善、勞力品質改善。

提高包含技術創新在內的總要素生產力，對中國經濟有著明顯的貢獻，我們來看一下證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開始後，中國的總要素生產力每年平均增加約四％。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四年為止，中國GDP年平均成長九．九％，其間保守推算，總要素生產力也成長了三％以上。即使在日本的繁榮期，總要素生產力也沒有創下這種程度的紀錄。中國的總要素生產力為GDP成長貢獻了三十五％到四十％的程度，高於經濟曾耀眼地迅速發展而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香港、新加坡、韓國、臺灣的二十％到三十％。

這四國的共同點是皆使用了投入勞動或資本要素的模型，與使用技術創新模型的美國八十％相比來得低很多，所以用投入生產要素的經濟成長模型來看中國是不正確的。一想到美國GDP年成長二％到三％的期間，中國則以兩位數成長的事實，顯然反駁了「中國經濟只依靠投入的生產要素」這種主張。韓國某家民間研究所也認為中國的年均總要素生產力增加率，比韓國高出一％以上。雖然現在中國經濟無法再像過去一樣高成長，但是認為也沒理由要因此悲觀的論點便是根據於此。

## 越來越難追上的技術差距

假設梭羅時至今日依舊說「貧窮國家也儲蓄、累積資本的話，便可以趕上富裕國家」，應該會有人大發雷霆地怒喊「你說這什麼鬼話」；也會有人說，「聯合國從一九七一年開始使用低度開發國家概念以來，貧窮國家依然還是貧窮國家」，並可能針對梭羅這不像話的理論威脅要向他提告。首先，我們先靜下心來，聽聽梭羅的辯解吧！

每個勞工越是累積許多資本，生產力越是上升，國民生產毛額也會上升，這就是梭羅的主張。他相信熱衷儲蓄與投資的國家正走在通往富裕國家的道路上，所以他身上散發著節儉、儲蓄是美德的「古典經濟學之香氣」。梭羅知道雖然勞工們越是擁有機器或裝備等資本財，就越能增加生產力，但在超過一定的水準之後，所提高生產力也是有限度的。對要空手砍掉樹木的人而言，多一把鋸子便能增加龐大的生產力；可是後續如果受人鼓勵去拿好幾把鋸子輪流使用，生產力增加的程度也無法達到像一開始拿一把鋸子時那樣。考量到時間有限與肉體上的疲勞，這種結果是理所當然。如果有許多人來幫忙，或是開發了性能更好的電鋸的話，可能會獲得不一樣的結果，但若只是增加一個人所操作的鋸子數量，這樣的比例並不會增加生產力。這在經濟學裡稱之為「邊際報酬遞減法則」。

一般來說，缺乏資本的貧窮國家的邊際報酬相對較高，資本豐富的富裕國家的邊際報酬相對較低。這種情形時資本可以完全移動，故先進國家資本會為了尋找到更高的生產力，而移動到落後國家，所以能解決落後國家與先進國家間的經濟能力差距，這便是梭羅的主張。梭羅相信經濟成長的絕對收斂（Absolute Convergence），後進者也可以跟上先鋒者，他把「製造人類汗水的樂觀果實之味」視為真實而收下。然而，這個邏輯和最近情況不太吻合，所以梭羅理論中的侷限可能會受到批評。

之前因為中國的經濟成長而依賴中國的國家，其製造業都很發達。新興國家的都市化加速，也形成了可充份吸收農村閒置人力的條件。但是因為技術發展，所以製造業的僱傭人數正逐漸減少，雪上加霜的是先進科技產業發展加速了這種傾向。與過去不同，世界銀行主

張開發中國家想利用製造業創造高速成長，藉此追趕先進國家一事會更加困難。除了中國以外的新興國家，都很難計算他們需要多久才能趕上美國的國民生產毛額水準。依據先進國家的經濟規模或新技術、知識而產生的成本縮減效應，也是要考量的因素。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間的技術差距持續增加，落後國家為了提高總要素生產力，必須賭上自己的生死。

## 生產要素型經濟成長面臨極限

窗外的梭羅留下最後一句話後便消失了。「你似乎對我有些誤解，比起擁有什麼，要用什麼東西、如何去做才是最重要的。知識可以左右財富、生產力與競爭能力。如果勞力與資本設備的擴充有二十％效果，那麼勞動人口的教育水準有三十％、技術創新與資訊經驗有五十％的效果嗎？我會說在看不到的八十％經濟層面才是最重要的。」

梭羅消失的位置上，出現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保羅．克魯曼。克魯曼會說投入資本等生產要素的經濟成長只能獲得短期效果，他是會辛辣批判亞洲經濟成長的學者。他在所謂「亞洲四小龍」——韓國、臺灣、香港與新加坡——乘風破浪的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所發表的《亞洲奇蹟的神話》論文中，提到「派對馬上就會結束」，向亞洲政府主導的經濟成長模型潑了一盆冷水。他主張當集中在資本或勞力數量的生產要素型經濟成長達到極限之時，經濟便會馬上停滯不前。

當時韓國的儲蓄與投資達到全球史前無例之高水準，勞動力也呈現爆炸性的增加趨勢。因為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韓國大部份的勞力從事農業，農村的生產力幾近於零，<sup>22</sup>所以整體勞力的四十％到五十％實際上是處於失業狀態。進入一九九〇年代之後，二．五％失業率接近於充分就業，形成無須再增加投入勞動的情況。直到一九九〇年代為止，韓國經濟成長的八十％是來自投入大量的生產要素，可是利用生產力擴大而成長的經濟卻僅有二十％。先進國家約三分之二的經濟成長是透過生產力擴大而達成，所以韓國也要提高生產力，必須

走向能引領出高速成長的方向才行，這便是克魯曼的主張。克魯曼指責亞洲國家即便有著耀眼的經濟成長，但是生產力增加的水準與南美國家沒有太大差別；他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前，便預言了將有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 技術先驅是經濟成長的擔保

除了投入的生產要素以外，生產力增加也決定於可靠的科學技術、優質的教育、公民的信賴等各種因素，任何一項都不是短期能可獲得的，瓜熟自然會蒂落。如果克魯曼消失的位置上帶來的是經濟成長，那麼我又想像了一下接著出現的另一位人物。一直被視為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熱門人選的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保羅．羅默（Paul Romer），他在窗外的身影有些模糊。他對韓國經濟給出這樣的建議：

「光是靠降低利率或增加政府財政支出，對經濟成長的貢獻有限。韓國人口成長停滯，要達到三％到四％的經濟成長並非易事，關鍵在於有沒有促進新技術和創新。改善韓國的大學教育系統、開發新的點子等等，致力於促進技術進步，才是對經濟成長最重要的事。美國從一八六〇年代開始，不是建立以歐式學問為主的大學，而是建立能培養學生實際解決問題能力的大學。政府還免費提供土地呢！麻省理工學院和普渡大學也是其中之一。十九世紀製藥領域的全球強國是英國與德國，但在美國創立麻省理工學院、新設了化學工程課程之後，其研究成果最後使美國超越了英、德兩國。將國家補助金集中在工程學領域，應用與發展既有先進技術的策略，也對韓國有效。」

傳統經濟理論是關注在機器與土地等有形資源，因為隨著時間過去，資源會越來越少，所以我們必須透過不斷地發明與技術開發來創造價值，這便是羅默的新經濟成長理論。民間企業開發新的點子、產品化，並在市場獲得代價。那麼，無法馬上產品化，或是無法獲利的計畫，要擱置不管嗎？羅默主張不要這麼做，而是透過大學來開發計



畫，將結果分享給社會，培養出其有效性。為此，他認為政府補助金的角色才是最重要的。

比起由政府制定方針，羅默更重視企業自行競爭、開發技術；他也強調要藉由提高勞工純熟的技術、新產業的勞力重組、效率性的都市開發政策，來促進經濟成長。他斷定韓國、中國、日本的成長是經濟追趕式，並指出其侷限；唯有成為新技術發展的先驅者，才能獲得經濟持續成長的擔保。羅默解決了梭羅的經濟模型未能包含技術進步的問題。將技術進步包含在經濟模型中，進而解釋經濟成長理論，就這點上來看，羅默的模型獲得了更進一步的評價。

## 以創新連結產業突破低成長時代

沉迷於上海夜景後，我又再次想起梭羅。一九八七年，梭羅在某篇投稿論文中主張，「到處都可以確定電腦時代的來臨，唯有在生產力數據上無法看到」。這個稱為「梭羅悖論」（Solow Paradox）的現象是真的嗎？那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熱衷於融合資訊傳播科技與製造業呢？一九九〇年代，企業們大舉投資資訊傳播科技，卻沒有出現如同工業革命帶來的成果般的創新產物。看起來經營型式不良的企業，即便在資訊傳播科技上做了許多投資，也可能會因為品質低劣的設計與管理不善而無法誘導生產力增加。沒有其他的因素嗎？如果企業廣泛地使用資訊傳播科技系統，內部員工一定會非常不安。為了增進效率性，必須考量到組織內的人事關係，否則便會面臨內部員工的反彈。管理階層必須透過溝通與分工合作的方式，解決工程師們覺得「中央電腦管理系統說不定會剝奪自己工作量」的擔憂。

到頭來，利用資訊傳播科技而提高的生產力並不多元，也不會馬上出現效果。使用新技術當然不是增加生產力的因素，而是企業內部的哲學、文化、報酬結構、經營者能力、領導能力、知識水準等因素在影響生產力的增加。儘管仍存有異論，許多經濟學者同意現在以電腦為首的資訊傳播科技，在提高生產力上做出很大的貢獻。有分析指

出在一九九〇年代後期，美國非農業部門的全年勞動生產力提高，其中一半是依靠資訊傳播科技部門。

根據運用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尼可拉斯·卡夫茲（Nicholas Crafts）教授等的分析資料顯示，多數國家與產業比較的結果是，以使用機器人與否來劃分的自動化和資訊傳播科技，皆對勞動生產力及經濟成長有相當大的影響。掀起工業革命序幕的蒸汽機（一八五〇～一九一〇年）、機器人（一九九三～二〇〇七年）、資訊傳播科技（一九九五～二〇〇五年），對勞動生產力增加的年均貢獻率，是資訊傳播科技（〇．六％） 機器人（〇．三六％） 蒸汽機（〇．三四％）。機器人為年均勞動力生產性增加貢獻的比重是十六％。

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即使來臨，比起討論資訊傳播科技是否對生產力有所貢獻，更多視線反而是關注在資訊傳播科技能為生產力提高做出多少貢獻。對資訊傳播科技的投資，不只是投資在物質面的資訊傳播設備，而是需同時進行對組織、人類的投資。儘管能有多有效地運用研發投資很重要，尋找妨礙技術擴張的因素也很重要。

在全球經濟發出低成長之聲時，特斯拉汽車的老闆伊隆·馬斯克正作著讓人類移居到火星的夢想。現在成為世界級革新家的他，在他最困苦的時候，他曾經是一天靠一美元生活的固執之人。

「一美元計畫不是人人都做得來。但有時要把自己放在受限的情況下，才會得出答案。慶幸的是，我因此獲得了無論我在哪裡，只要是做想要做的事，我都一定能成功的信念呢！」

對受困於低成長之苦的我們而言，梭羅、羅默、馬斯克以對技術與知識之欲為基礎進行創新。他們這樣對創新的熱忱，難道不是我們最大的動力嗎？這便是最近成為話題的「產業改革精神」。資訊傳播科技與製造業、服務業需要相互連結，創造出確實的高附加價值產業。這樣提升的生產力也會連帶提高薪資，薪資上升自然會帶動全球

需求，所以供給層面的生產力提高與引領需求的包容性成長需相互連結，才能保證持續性的經濟成長。

### 【理論提出者】

羅伯特·梭羅 Robert M. Solow, 1924.8～

他是十六歲時便入讀哈佛大學的神童，二十四歲時獲得博士學位，其後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擔任研究員，二十五歲至麻省理工學院擔任教授。他於一九五六年發表了《對經濟成長理論的一個貢獻》（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論文，提出了新古典派經濟增長理論。在凱因斯之後，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Henry Harrod）與俄裔美籍學者多馬（Evsey David Domar）發表了經濟成長模型，他們假設勞動與資本不可能替代，但由於許多假設條件過於嚴峻，所以未能獲得許多關注。梭羅的經濟成長模型則以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李嘉圖（David Ricardo）、穆勒（John Mill）皆曾使用過的報酬遞減法則為基礎，他假設勞動與資本可能替代，並發現技術進步的重要性。他因研究經濟成長理論的功勞備受肯定，在一九八七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四十幾年間，他與保羅·薩姆爾遜一同累積了各式各樣的研究貢獻。

---

22 此處作者引用的是亞瑟·劉易斯（Arthur Lewis）的劉易斯轉折點（Lewisian Turning Point）論述。其中提到發展中國家因人力充裕但農地有限，此時農村勞力的邊際生產力為零，於是在國家轉型至現代工業的過程中，會歷經農村剩餘勞動力源源不絕供應工業化所需的階段。

## 04 公共經濟管理

### ——網路和共享經濟的公平正義與喜悲

#### 自私自利造成「公有地悲劇」

「天空的白雲，聚集了一群羊，靜悄悄地把牠們分散，又把牠們趕在一起。」牧童們在天空下哼著童謠，村人共同享有這片草原。剛開始人們把羊分散開來放牧，飼養牠們來討生活，沒有發生任何問題。某天有人起了貪欲，引進更多羊隻來放牧吃草；他一這麼做，其他人也趕緊再買一些羊來。大家放了更多的羊在草地上，讓牠們盡情吃草，結果草原變成瘠土。看著沒剩一根草的草原，村人們流下了眼淚。

這所謂的「公有地悲劇」現象，是一八三三年由英國經濟學家威廉·佛司特·洛伊（William Forster Lloyd）提出的理論，而美國加州大學的生物學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於一九六八年《科學》期刊介紹這個理論並將之廣傳出去。哈丁的論文引發經濟學界熱烈討論。

在公共財產（共享資源）方面，經常可見到「想讓自己的羊吃更多草」的個人貪欲，以及為了共同生存必須保護草地的勢力間的衝突等情況。公共財產的所有權不屬於特定人士，因為不可以排斥任何社會成員使用的權利，所以會產生搭便車問題。若是將地底資源、空氣、水等公共財產交到市場經濟中的話，便會因為人們的自私心，而導致公共財產生產與消費的非效率性及糟糕的結果，這便是公有地悲劇的結論。

端出福利政策牛肉卻沒有資金來源的問題，也是經常用來解釋消耗國家財庫的公有地悲劇例子。人民討厭繳納稅金，卻又想要享受用稅金打造出來的道路、醫療、治安等公共財產福利並最大化。不繳稅

金又搭便車，當這種想獲得更多優惠的人變多時，社會很容易發生矛盾。

## 市場與政府以外的選擇

公有地悲劇沒辦法阻擋嗎？就像英國在「圈地運動」（Enclosure Movement）時的狀況，公有地可以被土地原持有者收繳並化為私產；另一種方法是由國家收回土地並加以管理。可是，有一位女性並不贊成這種方法，她是印第安那大學政治系教授伊莉諾·歐斯壯，她在二〇〇九年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史上首位女性得主。她主張公有財產必須交給該地居民或共同體，而不是交給市場或政府，這樣才能有效率地管理、阻止資源枯竭，亦能避開市場萬能的危險及預防政府的非效率統治。

歐斯壯是從哪裡獲得的靈感呢？美國緬因州因為過度捕撈而面臨未來再也抓不到龍蝦的危機，所以她觀察著該州沿岸漁民的做法。漁民們建立了有關放置魚籠規則與順序的自治規範，以此維持漁場管理，這個案例吸引了她。她的「自治理論」如果要在現實世界成真，那必須附加上什麼條件呢？首先，共同體成員們的關係絕對不能鬆散，彼此需要認知到是共同生存的關係，建立大家相信且願意遵守的自律制度；也有人強調村民之間要彼此監察與管制。為了解決公有地悲劇問題，歐斯壯認為比起處罰或官方制裁，強化共同使用者的共同體意識更為重要。在看到同樣也是增進成員共同福利的韓國「營農法人」或「漁村契」時，[23](#)便能感受到歐斯壯的哲學令人尊敬的香味。她重視的團結意識與情感樞紐，像是被我們扔到記憶角落、遺忘已久的故鄉一樣，真是令人心痛。

事實上，以共同體來解決問題的方式沒有這麼簡單，因為大部份村落共同體缺乏自治的能力。歐斯壯曾在斯里蘭卡的灌溉開發事業中，分析出缺乏自治能力的原因。假設現在有一個村子要建造引水的灌溉設施，在達成協議的過程中，彼此意見相反的農夫可能會很多。農夫們很窮，對於灌溉事業的重要性認知不夠，也可能不怎麼愛護自

己的農田；共同體的成員之間，也可能存在人種、文化上的相異性；村長也可能貪腐成性，只在乎自己的利益，甚或離間村民。農耕地區的界線需要被明確畫分且進行監督，在違反規定時則施以處罰。制定共同體規範的過程裡，需達到參與式民主。

歐斯壯提議的方法隨著國家的不同，可能帶來好的結果，也可能不會，這是因為各國文化不同。就連在一個小村莊建設灌溉設施都很難達成協議了，更何況是全球性的問題呢？這不禁讓人懷疑地球環境這個公共財產，是否能像歐斯壯的主張這樣交給村莊共同體自治。我們以使用與管理公共資源「氣候」的制度為例，試著探討碳排放減量額度認證（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的問題。歐斯壯為了解決公共資源問題，非常重視「社會資本」的「信賴」。為了保證履行二氧化碳排放減量，即便個別國家的利益會有短期減少的風險，也要守護地球共同體的長期利益，這樣的信任必須擴散在國際社會上。究竟我們是否具備了應付氣候變遷的全球治理能力？我們必須明快地回答這個問題。

## 共享經濟的喜與悲

有分析說到了二〇三〇年時，全球將有八十％人口在使用網路，所以有人把網路比喻成公有地。對我們來說，網路世界是公有地的喜劇還是悲劇呢？網路發展初期的核心是分享與開放。我們在目前名為網路的數位公有地裡，種下了什麼樣的數位之花與樹呢？自二〇〇一年開始透過網路分享個人知識的維基百科，超越了曾經最厲害的百科全書（大英百科全書），成為目前最具影響力的百科全書。全球的「電子圖書館」、「書店咖啡館」、「公共數據入口網站」成為了溫暖我們內心的數位之樹，並在網路世界裡茁壯成長。歐斯壯看到這些案例時，可能會因為感覺不到公有地的悲劇而感到開心。

我們將視野放寬廣一點，轉談最近的熱門話題「共享經濟」上吧！二〇〇八年，哈佛大學的勞倫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教授首先使用共享經濟這個詞彙：「將個人擁有卻不經常使用的物品、

知識、經驗、時間等有無形資源，拿來交換、出借與交易，使參與者們互相獲得利益的一種經濟活動方式。」智慧型手機普及後，全球預期會出現共享經濟的爆發式成長。分享自己的房子當民宿的Airbnb、共享車子服務的Uber，皆因是共享經濟的代表公司而成為焦點。可是這種網路 I T 企業，真的取代了「公有地悲劇」，並以「分享與關懷」打造出「公有地喜劇」嗎？學者們對此評價不同。

首先，把自己的物品或服務分享給其他人的行為，可以做為補貼生計。於社會的觀點上來看，資本主義受困於低成長，也讓共享經濟躍升為一個不錯的對策。以「共同體分工合作」這樣的精神，成立諸如共享消費的消費者合作協會來擴大消費者福利的話，該有多好啊？共乘的精神是能幫助到生活困難的使用者，也在防止能源浪費上有所貢獻。要人擁有私有財物的市場交換價值，被合作式共享社會的交換價值替代，這在歐洲社會經常可見。

可是我們好像不能就此安心，共享經濟的發達也可能造成勞工的薪資、勞動的品質下降。令人害怕的是，共享經濟的果實有可能只餵飽了連結線下和線上的平台商業公司的肚子。Airbnb進軍韓國之後，將自家出租的家庭因違反旅館業申報義務而被判處罰鍰。雖然Uber增加了計程車的供給可促使車資下降，但也可能導致社會上發生計程車公司破產與就業問題。這就是即使我們將共享經濟理解為未來市場的趨勢，也必須注意其弊端的原因。如此一來，共享經濟才不會走向公有地悲劇。

## 各有道理的網路中立性爭議

經過首爾南山隧道的駕駛人，必須支付交通擁擠過路費。在人口密集地區有設施，或是旗下設施會引發大量交通流量的企業，每年需向政府繳納交通擁擠稅。那麼，如果有人導致網路出現過度運載量時，該支付擁擠成本嗎？又該由誰繳呢？二〇一六年二月，在缺乏基礎通訊建設的印度，臉書與當地的信實通訊公司（Reliance Communications）合作，想要推行提供免費網路連結服務的計畫



（Free Basics）。說要提供免費服務，不是很好嗎？問題是，臉書對於自家所提供的內容和服務，在（傳輸）品質與速度層面給予比其他公司的網路服務更多的優惠。以專業用語來說，臉書這樣是違背了「網路中立性」（Net Neutrality）原則。

提供通訊網路的公司（如韓國的S K電訊、K T、L G U +），所有的服務內容不得有任何差別待遇，需向顧客盡可能地共享，遵守網路中立性原則。根據該原則，無論是KakaoTalk或臉書提供的內容，不得遭受通訊業者的不當差別待遇。使用KakaoTalk或是臉書的消費者，因為同樣使用著網路，所以也必須受到同等待遇。

二〇一六年，Google主張美國市占率第三名的電信業者T-Mobile干涉了自家平台YouTube的流量傳送。根據一家數據分析機構研究顯示，YouTube佔了美國境內無線通訊流量的五分之一。Google宣稱T-Mobile故意限制YouTube的連線流量，並主張其違反了網路中立性原則。站在電信業者的立場上，他們其實不會覺得造成傳輸流量大的數位內容業者看起來順眼。在網路中立性的邏輯背後，到底存在什麼樣的原理呢？正是公有地的悲劇。有人主張因為這與通訊網使用成本有關，所以會有搭便車的人，於是現在發生相互轉嫁責任的爭議。

來聽聽影音串流服務業對電信業者施壓的言論吧！

「我們希望大型網路服務供應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能嚴格遵守網路中立性。行動通訊運營商絕對不可為了自身利益，而任意地向特定數位內容公司或使用數位內容的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流量速度，又或是相反地降低連線速度的穩定性。網路不是少數人的專屬品，而是必須成為每個人的『開放空間』。人類普世價值其中一項是『平等』。為什麼我們提供的數位內容服務必須因為電信業者自身的利益，而遭到差別待遇呢？」

然而，為什麼電信業者要批評數位內容業者的發言呢？他們認為網際網路也帶有公有地的特性。數位內容業者們為了吸引消費者，而在網路上提供很有魅力的服務；消費者為了使用服務而湧入他們的網



站，結果造成網路流量爆增、超過限制，引發伺服器負荷過重的問題，可能產生所有人都無法使用網路的情況。於是乎，公有地變成瘠土。

在網際網路發展的初期，會造成流量擁擠的服務有限，使用者也不多。可是最近情況改變許多，網路服務使用者大幅增加，而在影音串流或網路電話等流量大的服務變多之後，網路承載流量的負擔也變大了。在電信業者的立場上，為了高速處理增加的流量，得持續花錢擴充通訊網路設施，他們當然會看不順眼造成流量大增的主嫌——數位內容業。一想到數位內容業者在他們設置的通訊網路上搭便車，便感到很火大。

行動通訊運營商根據「使用者付費原則」，主張數位內容業者們也必須負擔擴充通訊網路設施的一定成本。數位內容業者們說這是電信業者要解決的問題，認為自己完全沒有該支付成本的原因。數位內容業者還表示，消費者繳交電信費用，電信業者卻將成本轉嫁給數位內容業者，實在是太自私自利了。他們主張消費者不是單純為了上網才支付電信費，而是為了連結網路、享受數位內容才繳交電信費用；他們也強調政府絕不應把壓力放在產業重要性逐漸擴大的數位內容市場，致使其失去活力。

## 以自律、共享與開放來維護網路世界

現在試著回到存放在我們記憶中的另一段往事吧！Kakaotalk的行動網路電話服務「VoiceTalk」對韓國人來說是非常有用的服務。當可以連結上WiFi的時候，就算人在國外也可以與親朋好友享受免費的服務。可是電信業者們反對VoiceTalk開通韓國服務，因為它會造成非常多的傳輸流量。消費者發出譴責，說電信業者之所以要限制VoiceTalk服務不是因為流量擁擠問題，而是為了保護自家公司的通話服務。韓國政府發表了「通訊網路的有效管理及使用基準」之後，卻沒有建立強制條項或進行具體的管制措施，只規定了當傳輸流量激增、通訊網路超過負荷時，可以限制通訊網路流量。

其他國家又如何呢？美國電信業者威訊無線（Verizon）向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提出「廢除網路中立性」的訴訟，美國華盛頓特區巡迴上訴法院舉起了威訊無線的手，判定勝訴。因為現行的美國通訊法並未把網路視為「普遍的通訊服務」，而是被歸類在「資訊服務」，所以強迫電信業者們遵守網路中立性是不公平的；萬一網路是提供給所有人的普遍服務，大概會出現別的判決。相反地，歐盟議會通過了網路服務供應商提供給各家網路公司的服務不得有差別待遇之法案。這已不是單純要求他們不得差別對待各網站公司，而是禁止因商業考量而對其他使用者造成差別待遇，歐盟實行著更嚴格的網路中立性條款。外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異呢？

通訊是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在評價生活品質時，通訊網路的觸及度成為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標。通訊是國家的關鍵產業，卻是由民間電信業者在管理；因為是民間公司，自然對收益與成本很敏感。有主張認為電信業者正做著具有利害衝突的生意行為：他們透過自家網路，推出網路電視服務或行動隨選視訊之類的影音串流服務，世人正以懷疑的眼光看著他們是否會給自家數位內容的服務優惠待遇。事實上，在訂閱網路電視服務時，行動通訊運營商還會一同搭售自家公司的寬頻網路服務，也會向已使用行動通訊或有線服務的老顧客提供打折優惠。所以這其中是否存在公平交易問題或其他法律問題，經常成為輿論的話題焦點。

電信業者與數據內容業者對於網路中立性針鋒相對，站在中間被拉扯的是消費者，所以網路中立性問題是任何一方都很難做出結論的主題。如果接受行動通訊運營商的主張，要獲利可觀的數位內容業繳交「網路流量擁擠稅」的話，又該繳多少？中小型企業又該如何處理呢？我們再回到歐斯壯的理論，請你試著想像一下她對於網路中立性問題會抱持何種立場。她應該會強調，與網路通訊使用者維持良好關係，認知到彼此是共同生存的關係，以及申明自律性制度的重要性，藉此取代政府的介入。然而在現實中，很難看到她說的這些。電信公

司、數位內容公司、消費者之間放著網路中立性的原則，因為各自的立場不同，所以矛盾的關係會持續下去。

當全球都具備網路基礎建設的情況下，建構一個完善的網路世界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必須把網路打造成「共享與開放」的市場。如果有人想把網路建造成華麗的秘密花園並獨享的話，我們必須果斷地打破那道牆。因此利用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而成長的維基百科，以及公開汽車主要技術專利權的特斯拉公司，充滿著人性之美。

### 【理論提出者】

伊莉諾·歐斯壯 Robert M. Solow, 1924.8～

她因研究非洲原住民的草原管理與尼泊爾西部省份地區的灌溉系統管理，在二〇〇九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首位獲得該獎項的女性。儘管一部份的試驗未能獲得成功，但是為了管理天然資源與防止生態界崩潰，所以她持續認真地思考社會該怎麼做才能開發出多元制度的嘗試。

她反對只有國家或市場才能解決人類與生態界間發生搭便車問題（Free Rider Problem）的觀點，並強調透過住民自治便可解決資源共享問題。

---

23 營農法人為至少五名農人以上組成、非公司性質的團體，除了經營農業，也可進行附加事業；農業公司則無法進行附加事業。漁村契為至少十名漁夫以上組成的團體，在生產過程上團結、分工合作，規模略小於協會形式。

## 05 自主創新論

——創意力是國家繁榮之鑰

### 鯉魚躍不了龍門的「大亨曲線」

假設你目前正住在美國，雖然美國的經濟與其他國家相比還不錯，但已不是過去那個能讓人做美國夢的國家了。美國是個尊重多元的社會，不過每個人想賺大錢、過上好日子的心態都一樣。當你說自己很成功的時候，這目標是什麼呢？有人會提議去矽谷利用技術創新來創業，也有人去華爾街，利用新金融工程技術開發各式各樣的創新商品，想藉此大大地提高自己的成就。

我再講個笑話好了。如果你去韓國的商業銀行借錢，銀行會說：「請用房子擔保，我們就會借錢給您。」可是你去矽谷借錢的話，你會聽到：「請告訴我們您的夢想，由我們來買下您的夢想。」沒錢的年輕人若是聽到有人這麼說話，該會有多幸福呢？因而寫下成功神話的大人物在美國不勝枚舉。

依照家庭收入為標準而分的低收入階層、中產階層、上流階層，請試著思考階層間的流動，以及頂端富裕層移動的可能性。這裡決定前者的是教育，即人力資本的培育；決定後者的，則是創業與在資本市場上的成功。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最確實又最快速成為最上層富翁的道路，是成為一名成功的企業家。於是有人喊出自己的夢想：「我們要去矽谷或華爾街。」

我們來思考一下「大亨曲線」（The Great Gatsby Curve），這個名稱取自小說《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的主角：貧窮農夫之子，後來成為富翁的年輕人蓋茨比。窮苦的蓋茨比憑著一股想再見到已為人婦的心愛女子的心情，不停地「往上再往上」、提高自身地位。儘管他成為富翁，他的結局卻是以遭到殺害而悲慘結束了。在

現代社會中，也有許多人像蓋茨比一樣，夢想著獲得財富、階層流動，可是在所得不平等現象固化的社會裡，階級上升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所得不平等現象惡化時，人們會自暴自棄；社會矛盾加深，所以社會成本擴大，也有礙經濟發展。社會因「努力也沒用」的無力感而失去活力，所以我們更需要努力復原可讓階層流動的梯子。無論如何，最近社會對於環境變成「鯉魚很難躍過龍門」已有一定程度的共識。

大亨曲線裡，X軸是顯示不平等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Y軸是顯示兩代間收入彈性，標記著根據父母所得而可能改變孩子所得的階層流動可能性。當X軸的吉尼係數數值越大，意味著財富的不平等越大；而因為Y軸是「繼承財富的彈性」，所以數值越大就表示越多人繼承到財富，使得階層流動困難。包括中國在內，越是開發中國家，X軸與Y軸相對越高，位於上層的人因為生對家庭而發展順利的傾向越明顯。反之，歐洲先進國家因為X軸與Y軸數值較小，相對上不太受到父母所得的影響。

大亨曲線顯示出全球主要國家的吉尼係數與所得彈性，我們來深入分析位於圖表中間位置的美國吧！分析美國的大亨曲線時，你會發現美國淨資產十億美元以上的大富翁中，白手起家的比重達到七十%以上。然而，如今藉由個人努力達到經濟身份上升，在美國也變得很困難了，可是這個數據令人無法拋棄白手起家的夢想。

各國億萬富翁的共同點是，多數人不是創業家，就是金融家或專業執行長。雖然人們說美國夢消失了，但是這也是人們認為相比之下矽谷或華爾街是個機會之地；又或者該說，全球唯一可以吃下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國家，就是美國了。熊彼得重視企業家利用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來進行創造性破壞行為。他認為企業家以技術創新方式打破舊有的秩序、建造新的經濟天堂，這個過程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

## 缺乏活力的長期停滯時代

韓國針對年均經濟成長率是否可以達到三%而討論了好一陣子。在對外條件不確定的情況下，如果調降利率或追加預算都無法保障可拉升實質經濟的話，我們說不定會很想把熊彼得從棺材中拉出來。在全球經濟停滯使得企業家動物本能消失的現今，我們期望有個充滿活力的韓國，是不可能實現的夢想嗎？每個人定義創新的方式皆不同，那可能是意外的幸運，也可能是有系統地長期實驗下的結果，又可能是試誤後不屈不撓的結果。不管怎樣，對大眾而言，創新就是一個新的東西出現。

熊彼得是覺得藍天之下沒有新的事物嗎？他認為重新組合舊的事物就是創新。這也沒錯，智慧型手機也是組合了許多技術所製。根據熊彼得所說，創造性破壞的創新領域是發現新供給管道、開發新技術或產品、開拓新市場、開發新組織等各式各樣。

不平等現象、缺乏需求、全球經濟不穩定因素增加，導致全球陷入低成長的泥沼之中。儘管主要國家以負利率在內的各種貨幣寬鬆政策為重心來對應低成長，經濟狀況卻很難看到好轉的氣息。因為經濟停滯不前、所得不平等加劇，所以全球經濟陷入長期的需求不振，處於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這種主張已經出現很久了。經濟達到成熟階段時，長期的需求不振會導致企業迴避投資，過度儲蓄可能成為全球經濟的長期停滯原因。這段期間累積債務、增加消費的家庭，變得在減少消費、償還債務與增加儲蓄。而主要先進國家們在金融大海嘯之後，轉變成通貨緊縮，消費與投資也萎縮。

企業對投資的關注很少，因此人們要求政府對機場、道路、鐵道等社會基本建設大膽地投資。這是在主張當民間陷入長期停滯，無法自行達到充份的就業與成長率時，政府應積極介入，進行人為的需求創造。但是許多先進國家被國債所困，無法理性地聽進這一主張。菲爾普斯認為國家積極扮演財政的角色，以救援投手身份登場，發揮拯救經濟的角色還是有限的。我們跟著菲爾普斯踏上尋找失去的動力的「創新之旅」如何？

## 眾多小創新可以帶來繁榮

在缺乏活力的時期，有個人大膽地喊「眾人們！去找回活力吧！」，談著自己的夢想的話，這算是煽動嗎？如果說這個人是經濟學界的老將艾德蒙·菲爾普斯的話，你會更驚訝嗎？他展現了以各種不同角度再次找回經濟成長動力的方法。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全球經濟的情況下，供給面（Supply-side）經濟學家們的減稅政策與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的福利支出，皆無法成為最根本的解決對策。為了結束長期停滯，他主張我們需要可以恢復「大眾的希望與夢想的精神」的東西，並且說答案是把「創新的夢」種在大眾內心的每個地方。

我們一起回到過去的歷史吧！近代經濟給歷史帶來什麼驚人的成就呢？西歐的歷史是抗爭的歷史。重視個人權力的近代價值觀與重視國家權力的傳統價值觀的抗爭裡，近代價值觀抓住了勝利，掀起了創新、促使社會發展。菲爾普斯主張繁榮的源泉是平凡人的無數個、許多的「小創新」，他認為小的東西很美。

為了更瞭解小創新，我們再聽聽菲爾普斯的主張吧！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的蒸汽機是改變世界的重要發明之一。蒸汽機掀起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隨著工業革命與科學革命而提高的生產力，也帶來了十九世紀初期驚人的經濟繁榮，這幾乎是全球認定的事實。然而讓人驚訝的是，菲爾普斯有著與此稍微不同的見解，他認為詹姆士·瓦特的蒸汽機實際上對經濟的影響是微乎其微。他降低改善工序（Process）以提高生產力的評價，說其功勞沒有大到成為促進繁榮的核心因素。

菲爾普斯認為，人類歷史上開出「繁華」之花的時期是從一八三〇年到一九一〇年為止，屬於這時期的國家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十八世紀時，平凡人都可以享有令人無法想像的高生活水準，其秘訣是什麼呢？利用有才之人的創新點子製成商品或服務，並放到市場上的話，便建構出所謂的「知識經濟」基礎，也可能為經濟帶來充

滿活力的繁榮。繁榮的源泉不是幾個卓越的創新，而是持續來自大部份平凡人之「小的自主創新」。聽完菲爾普斯這樣的主張後，我們現在會有什麼想法嗎？商業資本主義時代的創新，是一些貴族與資產階級的專屬物品。雖然國家富裕了，財富卻沒有普及至大眾，國家對此也不關心。

十九世紀初期，民主主義隨著人民參政權擴大而播下種子，強調挑戰與冒險、創新的文化獲得了力量，展開了大眾的繁榮時代（Mass Flourishing）。菲爾普斯說過，國家的繁榮不只意味著經濟上的富裕，還有多數個人的挑戰、冒險，並從中獲得滿足、得到正當的報酬，過上「好生活」。啊，這真是多麼令人內心澎湃的話語啊！我們現在正享受著這樣的大繁榮嗎？我們有真正享受著工作的價值和從中帶來的繁榮、喜悅嗎？近現代經濟的創新助長生產力增加與實質工資調漲，這給大眾帶來了更多的自由、減少貧窮及提高生產水準。

菲爾普斯主張，這不是資本與勞動的增加或商業與國家間貿易增加的結果，而是小創新的結果帶來了繁榮。他感歎這史無前例的繁榮只延續到二十世紀中期，今日的繁榮經歷了數十年的時間，正在持續惡化。他說在一九七二年到二〇一二年期間，美國的總要素生產力減少了一半，從二％掉到了一％，全世界潛在經濟成長率低迷造成問題。那麼，我們要怎樣才能再重新享有大繁榮呢？菲爾普斯認為最重要的是，營造可將草根創新（Grassroot Innovation）種子散播在社會各地的條件。

## 統合主義阻礙了經濟動力

然後，為什麼引領動力的自主創新會遭到妨礙呢？菲爾普斯主張這是因為傳統統合主義（Corporatism）再度崛起，成為近現代經濟基礎的價值觀。他發現這個主義重視共同體與國家勝過個人，落後者接受先驅者保護的傳統價值觀變強，同時讓近現代經濟無法前進。一九二〇年代首次在歐洲大陸登場的統合主義，比起冒險、挑戰、創新等近現代價值，更擁護安定、協調、秩序、團結等傳統價值。統合主義



的立場是必須在政治與企業團體、勞動團體間協商的基礎下運用經濟，他們批判個人主義或對金錢欲望等行為的擴散，不過他們推舉對弱者與既得權的保護。這種「社會保障」的主張，從補助金到福利扶助，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政策。菲爾普斯視這些為使自主力下降的弊端，並強調因為國家訂立規制而阻礙經濟動力，把經濟成長綁手綁腳了。在資本主義陷於危機，兩極化越趨嚴重，無法順利建構給貧窮人家的社會安全網的狀況下，可能有人會因此嘲笑重視自由與活力的菲爾普斯。

我們再深入探討一下菲爾普斯的主張根據吧！他與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利佛．威廉森相反，他認為企業規模越大，決策結構的效率性越會下降，容易損害經濟動力。另外，他很討厭大企業的官僚式決策。如果企業埋首於短期的成果主義、回饋給經營集團過多報酬，那麼企業的長期經營展望會變得黯淡無光、欠缺章法；沒有遠大的藍圖，只一心放在短期目標。他強調人對金錢的過度貪欲，也會造成資本主義衰退，尤其是藉由股市或不動產投機賺了數十億的人，這些人對錢的欲望是阻礙創新的一顆腫瘤；他認為這種錢進到了不生產附加價值、無生產性的地方，所以蠶食掉人們的創意又創新的思維。重要的是，我們要正確地瞭解並尊重具有創意的草根創新系統，並確實地獲得勞動結果的報酬。菲爾普斯覺得獎金制度也可以讓大鯨魚高興地跳起舞來。<sup>24</sup>他還認為統合主義強調的價值進入美國之後，讓曾象徵美國經濟動力的開拓精神被「依賴性」取代，而失去了動力。他指控這是因為國家介入，利用規範來保護既有權力，更加鞏固政治人物、官僚、獲利團體三方的銅牆鐵壁。

到這裡，我們再看一次菲爾普斯的公平公義觀念。他是一名對就業問題與美好生活有許多看法的經濟學家，一輩子憧憬著亞里斯多德與他的學生們討論著「美好生活的香氣」的景況。他總是思考「公平公義的經濟是什麼香味」，甚至果斷地拒絕金錢與利益問題的偏見。菲爾普斯熱愛由尊重社會弱者的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所撰寫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並主張多數利益的累積總和

才是最大化，所以不能強求少數人犧牲，他是一個真正的大人物。他經常思考「社會所得必須如何分配」，且強調帶來繁榮的「美好日子」必須公平公義地分配。

可是菲爾普斯為什麼把統合主義式的分配，歸類為討人厭的不公正呢？理由很簡單。對他來說，利用補貼基本工資來解決兩極化的分配方式，是可以讓更多人參與經濟活動，帶領他們往「美好生活」發展的公正制度。而他認為受到統合主義影響而擴大的「社會扶助」，是連不參與經濟的人們都包含在內，以「福利」的名義進行社會財富的分配。結果是，統合主義式的分配是把許多人從經濟之中分離出來，甚至給不工作的人優惠；因為這會嚴重阻礙社會動力，所以他視之為不公正。

## 中國創業熱潮告訴我們的事

現在一定還有不願同意菲爾普斯主張的福利論支持者，就算他是曾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不表示他的理論神聖不可侵犯，任何人都可以充份提出異議。我們來看看他的著作《中產階級要活下來，國家才能活》（Rewarding work）吧！他強調政府必須按照低薪勞工的生產能力差異，協助給予不同的補助金或稅制優惠，韓國引進的「勞動所得稅扣抵制」正是接納了他一部份理論的制度。因為不得剝奪勞工工作的價值，所以我們要減少僱主的聘用人才成本，讓勞工獲得正確的薪資，這是他一貫的思維。他主張政府應該向低薪勞工提供永久的薪資補貼、培育中產階級。給人民工作的機會，引領每個人的經濟活動參與和挑戰精神，他們的生活就會變好，最後國家也跟著繁榮，這便是他的核心理論。

在世界經濟論壇上，中國總理李克強曾說他很想坐在菲爾普斯的旁邊。現在中國的年輕人，比韓國或日本的年輕人更懷抱著創新創業的夢想，想在人口大國裡鼓吹草根創業精神的李克強總理，其野心來自菲爾普斯的精神。官方發表的韓國創新指數很亮眼，其中大半似乎要歸功於研發投資與高等教育瘋潮，我們卻感受不到草根創新的火熱

氣息。與之前的時代相比，最近年輕一代選擇穩定工作的傾向更為加重，不太願意冒險去發揮創意、發現新事物，許多年輕人拚命努力報考金融業、教師、公務員和大企業。一想到這是因為青年失業率高，所以他們不得不做出這種選擇，我感到惋惜的心情難以抹去。韓國中世紀曾存在特權意識、順從主義、死要面子等文化，令人十分懷疑韓國人是否有習慣這種文化的傾向。

世界不斷變化，自由與創意才能帶來動力。菲爾普斯大聲高喊：陷入危機的資本主義，必須克服因集體主義而枯竭的動力。「運作順暢的資本主義會帶來繁榮。若是能直視問題，再次拯救核心價值的話，資本主義將會再次繁榮。」

諷刺的是，中國身為共產主義國家，創業熱潮卻非常強勢。李克強總理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一番話激勵青年的創業，這是指中國必須再出現第二和第三個阿里巴巴、騰訊、小米來復興經濟。中國的這番模樣，讓人認真思考我們是不是嘴巴上說著創新，實際上卻只追求建立一個受安全網保護的生活。

### 【理論提出者】

艾德蒙·菲爾普斯 Edmund S. Phelps, 1933.7～

他擴大了總體經濟政策長短期效果的關係解析，因而在二〇〇六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菲利浦曲線可顯示通貨膨脹與失業率間穩定性衝突關係，曾是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主流經濟學的意見，而菲爾普斯對此提出反駁之後，在經濟學界獲得很大的迴響。另由於新技術與發展的擴散，他也是分析人力資源之重要性的先驅者。做為就業理論大師的他，因藉由就業主義「理性預期」揭露了非自主性失業的原因而受到矚目。

---

24 語出著作《鯨魚哲學》（Whale Done!），在韓國是暢銷書，經常被當作諺語使用。

# 後記——我們真的愛對方嗎

勁風吹拂、花草擺動，看著它們為了不掉落下來而努力擺動的模樣好可憐。我們的人生也像花草一樣齊花綻放，總有一天會枯萎，這就是自然的定律。然而找不到工作的青年，別說是齊花綻放了，連嘗試開花都沒辦法，只能死了這條心，很是令人惋惜。繞一圈世界看看，也很難找到可接納許多年輕人的就業寶庫。大部份的店家、企業、政府為債務所苦，而這也阻礙了健全的社會、經濟發展，這模樣真是令人心疼。

企業應該生產好的產品、生意昌隆，家庭應該作為健全的消費主體進行消費，政府利用稅收建立公正制度與提供品質優良的公共服務，可是我感覺這樣的循環並不順利。勞工的薪資差距、企業間的能力不均衡、國家間的所得差距，再加上世代矛盾，這些問題正撼動著全球。凱因斯好像夢想過一個金錢能順利流動的「就業穩定、中產階級穩定，國家穩定」理想社會，在真實世界中卻做不到。

我坐在餐桌前，陷入了各種思緒。不知從何時開始，許多人看到越來越無力的全球經濟，便說「我們是不是成為已逝經濟學者的奴隸」，透露出懷疑的心情。即便經濟成長，就業卻沒有增加；即便實施了負利率，物價卻沒有上漲。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的這番話聽起來也是有其道理。

透過本書收錄的二十二篇有關經濟的文章，我們可以瞭解到投入全球的臨時處方，並未讓經濟順利運轉。我也有想過，我們焦慮的心情會不會扭曲了學者的正確想法。把大眾的生活大大分類在餐桌上，經濟學家們正齊聲高唱著，「回到民有、民治、民享的『經世濟民』本質上吧！」這世界上都有各種不同的餐桌。有人的餐桌上是放了太多的食物，危險到快要傾倒，有人的餐桌則是空無一物。在這種不均衡現象之中，我們的生活還能持續美好下去嗎？經濟學家的聲音栩栩

如生地傳入我們耳中，他們警告餐桌上的傾斜現象越來越嚴重，可能我們所有人的餐桌都會崩塌。

曾談論均衡的工作與休閒生活的約翰．凱因斯，我感覺他的主張再次復興，化身為本書的沉重建議。他們所提出的「餐桌上的經濟學」與凱因斯相同，簡言之是調合人類與自然、有均衡的生活態度。我們活著時需遵守的品德、眼前的難關、絕不可放棄的倫理、建立穩鞏國家的努力、技術進步與創新等，透過這本書在整理各種想法的過程，我們可以反覆咀嚼中庸之道有多麼重要，不能太超過或做太少。請閉上眼睛，試著回想學者們字字珠璣的教誨。當現實越是沈重，我們越能感覺到《餐桌上的經濟學家》冷靜的診斷與分析的回音。他們訴說了最真實的生活故事，而為了打造更好的社會、為了人類的繁榮，這正是你我試著找回遺忘的價值、好好煩惱該做什麼的契機。

坐在餐桌前好一陣子，睏意湧上，我不知不覺地慢慢閉上眼睛。於遠在漢江中間的一座島上，我的父親在一棵聳立的大樹下來回徘徊。他說：「為了我們國家的工業化，我奉獻了這個身軀，讓本來一無所有的國家發展成這樣，請謹記在心。治癒戰爭遺留的傷痕、克服貧窮的痛苦，我這父親很想成為你真正的後盾。雖然我現在內心很寂寞，但是想到了統一後的祖國模樣就好多了。兒子啊！請記住這些話。我不可能照顧到你們所有兄弟，我們家不富裕，所以只能選一個可能會成功的傢伙。對不起，還有謝謝。」

一聽到父親說的這些，我眼眶中的淚水不斷地落下。我自言自語：「父親，我很尊敬您們在那個時代從無到有，還有在民主化的社會裡，您還能好好地照顧自己這一個身體，真的是太感謝了。無法經常去看您，真的對不起。我只想到自己的孩子，更是對不起。我不想自己的孩子被看不起，所以希望至少他能好好唸書。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好對付，但還算活得下去。只是，希望他能為了我，過得再快樂一點。我想起童年時期，我在緣廊下枕著您的手臂，數著天上的星星。那時的物質生活比不上現在，可是真的很幸福。父親，對不起，還有謝謝。」

我說完之後，接著我的兒子以稍微顫抖的聲音開口說：「爸爸，我有點依賴人吧！爸爸您給我的，比起爸爸您從爺爺那裡得到的要多更多。我居然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現在才終於知道，這一切都是多虧了爺爺世代完成的工業化，以及爸爸世代達到的民主化。我曾經有點不懂事，也非常感謝您。爸爸，我也知道自己的人生很珍貴。雖然有時候會覺得有點不安、生活喘不過氣來，但是不管怎樣我都會掃除一切的！我很討厭被關在鳥籠裡的生活，令人鬱悶、難以堅持下去，我想要大力拍動翅膀地飛出去。爸爸，請相信我，請為我祈禱這世界會盡可能地給我更多的機會。我愛您。」

一聽到兒子的聲音之後，我對於自己是否有尊重孩子、試著理解他，我也沒自信。我們都站在彼此對立的立場，若是稍微試著理解對方的話，國家間、世代間、人與人之間發生的距離是否能縮小呢？遠遠的那座島上發出一閃一閃的螢火蟲光芒，照亮黑暗的每一道光芒都帶有不同重要意義似的，互相說著悄悄話。它們面臨天一亮就會消失的命運，可是它們像用盡全身力氣地試著走向彼此。

安靜地試著問你自己，為了建立一起活得更美好的世界，我們是否能夠像這些螢光一樣，做好先伸出手的勇氣。我們真的愛對方嗎？希望你能反覆思考這份愛意，撥開黑暗會有耀眼的太陽升起。我想像凱因斯一樣，依然相信自己的後代會享有繁榮。我為在世界所有土地上守護著這信念的人加油。

# 參考書目

## 序言

John M.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1930

## 幸福方程式——如何測量幸福

Paul A. Samuelson & William D. Nordhaus, "Economics", McGraw-Hill/Irwin, 2009 (19th edition)

## 配對理論——市場是可以設計出來的

Alvin E. Roth, "The Redesign of the Matching Market for American Physicians: Some Engineering Aspects of Economic Design",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999

## 經濟發展與自由理論——暖心的經濟學

Amartya K.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丁伯根模型——經濟學中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Tiziano Squartini & Diego Garlaschelli, *Jan Tinbergen's legacy for economic networks: from the gravity model to quantum statistics*, 2013

## 搜尋摩擦理論——經濟再完美也不可能零失業率

*Markets with search frictions*, the Economic Sciences Prize Committee of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

直升機撒錢論——那麼多的錢都跑到哪裡去了

Milton Friedman, Reflections on A Monetary History, The Cato Journal Vol. 23, 2004

人口革新論——單身稅是否正當

Simon S. Kuznets 1901 - 1985: A Biographical Memoir, Robert W. Fogel 2001

賽局理論和囚徒困境——我獨活則無一倖免

Harold W. Kuhn及另四人, The Work of John Nash in Game Theory, Nobel Seminar, 1994

交易成本理論——良心企業會變得富有

Oliver E. 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1975

目標導向式投資——數學天才的投資夢

Robert C. Merton, The Crisis in Retirement Plann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4

非理性衝動——貪婪與恐怖如何撼動經濟

George A. Akerlof and Robert J. Shiller, "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損失規避傾向——利益的喜悅比不上損失的痛苦

Kahneman, D. & Slovic, P. & Tversky, A.,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釣魚經濟理論——中古車買貴的原因

George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1970

### 國家經營論點——企業家為何會成為失敗的國家領袖

Paul R. Krugman, "A country is not a compan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6

### 教育經濟學——報酬率最高的投資

Interview with James Heckman on the economic arguments for investing in the health of our children's learning

### 制度經濟學——中國沒發生工業革命的原因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公共選擇理論——政府不是「天使」

James M. Buchanan & Richard E. Wagner, "Democracy in Deficit: The Political Legacy of Lord Keynes",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Inc., Vol 8, 1999

### 雙邊市場理論——夜店和Google的共同點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3

### 創新與不平等爭論——人工智慧能否帶來偉大的救援

Angus Deaton, "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經濟成長理論——「如何去做」比「擁有什麼」更重要

Robert M. Solow,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公共經濟管理——網路和共享經濟的公平正義與喜悲

Elinor Ostrom, 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自主創新論——創意力是國家繁榮之鑰

Edmund S. Phelps, "The good life and the good economy: the humanist perspective of Aristotle, the pragmatists and the vitalists, and the economic justice of John Raw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